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新史学

 **E-BOOK**  
网络资源 非纸书

## 附录论新史学

### 巴恩斯

本文译自巴恩斯：《生活在二十世纪中》(Harry Elmer Barnes,《Liv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1928)，第十二章(第347—381页)。

#### (一) 导言

本书前面各章论述了前一世纪的一些重大历史变化，这些变化有助于说明有关“生活在二十世纪”的许多主要问题。在最后这一章，我们将就二十世纪状况对于历史写作本身的影响进行探射。换句话说，我们将研究这样的问题：把历史写作同当今文明所创造的知识 and 观点调谐起来，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人们所大夸特夸的“新史学”，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历史写作的方向与综合，它是用今日的知识与论点去仔细考察过去的阅历而得出来的，这种做法犹如奥罗修斯的出于迫切害怕地狱，便把基督教当作自己知识生活的轨道而撰写了《反对异教徒七部史书》一般。

现时在史学界中流行的各种术语，也许没有一个像“新历史学”这个名词那样容易引起尖锐的口舌争辩，或者使人们的思想平衡受到干扰。对于旧式的历史学家来说，“新历史学”这儿个字，等于请三K党的“神鹰”或“最高圣者”这些头目去吃一餐菜肉杂烩一锅煮的爱尔兰穷人饭。对于鲁宾逊教授的列障备战的门徒们来说，这个名词却使他们脉搏急跳、脊骨挺直，像十字架旗的张扬，激起了中世纪十字军人身体上的变化一般。另一些人则对这个离弃旧日叙述政治事件的历史的运动虽寄予同情，但他们却为“新历史学”这个术语感到烦恼，因为它使他们联想到好战的宣传，刺激他们敏感的神经，因为他们在汗牛充栋的图书馆中作隐士式的研究工作，环境肃静，习惯于美国学院式历史家的那种传统的文雅与安静的生活的缘故。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企图对“新史学”作出一种和解性的评价，略述其主张与愿望所包含的纲领，指出学习“新史学”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这样的一篇阐述尽管有缺点，但毕竟是有价值的，因为，要成功地学习“新史学”，就不能采取毫无目的或漠不关心的态度。我们应当明确自己要学习什么，和怎样去求得效果。

伯克教授评论了我的《新历史与社会科学》一书，评论发表在《星期六文学评论报》1925年8月15日刊上。他提出的精巧而有力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关于“新史学”的实质与范围，及其自称为“新”的确切性的问题。人们一般地认为，“新史学”是一种历史写作的类型，它放弃了历史的傅利门对于历史的概念，即满足于把历史看成是“已往的政治”，把一大串故事组织起来而加以说明。“新史学”传杭地被解释为一种表达历史的方法，它试图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对文明历史的总体进行重建，使它像鲁宾逊教授所说那样，包括“一切我们所知道的、人类曾经做过、想过、希望过或感觉过的事情。”就新史学的范围而论，这种说法大致是适当和正确的。但比这更根本的，是新史学的发展方向和斗争目标的胜利。历史学范围的扩大和任务的修

---

伯克(OarlBecker1873—1945)，美国当代历史家。——译者

见本书第8页注——译者

改，引出另一个根本性的要求或责任，即：要求有一种适宜的训练，使得对新史学有抱负的学者们能够满怀信心和成功地胜任对他们要求严格的职业任务。这种广博的驯练主要是要求对于人性和人与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了解。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有可能去对付重新建设文化史的各个方面和分析社会制度的进化的困难问题。制度的进化记录着人类逐渐征服他们的物质环境，以及人越来越成功地组织人类集体力量的事迹。换句话说，要从事于新史学工作的人，就得彻底熟悉生物学、人类地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他们还需要就自己所决定要进行研究的那些范围，接受特别驯练，掌握这些范围内所不可缺少的和密切联系着的某种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与美学部门的知识。

在本章后面的一段，我们将讨论要胜任新史学的开拓工作所必须具有的预备条件。我们有必要从一开始就坚持这一事实：我们对于历史学的新概念，不仅要求我们要大力开扩历史学者的兴趣领域和负担的范围，而且对于研究新史学所必需的预备条件，只要是能激发人们的信心，或是具有永久价值的，就同样要予以大幅度的扩张。有人曾说，新史学写作所需要的只是思想上的转变——只须把头脑转变一下，使它能够从叙述神圣同盟的起源或辉格党的解散，转而去分析古代阶级斗争，或研究中世纪自然科学史，或对伏尔泰进行心理分析，或研究（拿破仑的）大陆制度的经济情况、现代法学的演变、或希波格拉底 技术衰亡以后医学上的进步，这样做就行了。据说，《圣经》上有这样一句话：思想无法使人长高一尺。我们可以申辩说，单凭思想，就更难把自己从一个因袭的叙事家变成一个文化史或社会制度史学家。因为，新史学既是关于历史内容的新纲领，又是对于历史实践的新要求。

关于新史学的范围，就讲到这里。那末，关于它的那个自称为“革新”的夸张的形容词的合法性呢？就其作为一种比政治和外交更要广泛的历史兴趣领域而论，它不能有效地自称为绝对或独特的革新。第一部综合历史著作，即希罗多德的《波斯战争史》，便对文化史的许多方面作出了贡献。此后每个时代总有一些著者，他们对过去的兴趣超越了军事战争和党派斗争的范围，即使他们的兴趣被消耗在某一圣人的大腿骨所显现的奇迹，或是女巫的肆虐。新史学对于自己的题材范围之所以能够自称为革新的，主要在于这种观点在现时被人们接受的程度。在已往的世代里，文化史的写作者是孤单的，而且往往被人鄙视。今天，压倒多数的青年史学家大声疾呼地拥护新史学的计划，而许多旧式的传统历史写作的代表人物或者投降了，或者是意气消沉。这种情况，要比第九十九个活泼的青年改信新史学更有意义、更加可喜。进化的观点和生长的态度的胜利，乃是真正的革新，是独特的事情，它引导历史家首先把注意力集中于说明：现时的秩序是怎样形成的。这便是最完善意义上的真正新史学。

在提倡历史研究和写作需要具备一定的初步预备条件的主张上，新史学的观念也无疑地是革新的。到兰克时代为止，以前的史学家尽管有极少数人像波里比阿和焉比伦那样坚持历史学者的专门训练和资格条件，但大家一般地都认为，无论何人，只要他有文学的志愿和流畅的文笔，就有资格对历史进行严肃的工作。兰克和他的继承者主张，历史工作需要预备条件，就是说，要在文件批评和史料学上接受严格训练。关于历史学者必须具有渊博的社会

---

希波格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357年），古希腊名医，号称医学之父。——译者

科学知识的论点，则是到了最近才流行的。社会科学只是在近时才到达这样的境界：它们的题材的可靠性，足以为历史见解和历史分析提供稳妥的基础。历史必须依靠社会科学，正如它必须依靠档案学和古文字学一样。这种看法的确是到了晚近才出现的。人们也许终归会承认，鲁宾逊教授的具有革命性的著作《新史学》——这是新史学派的宣言——它的最有创造性和最革新的一段，是“历史的同盟者”那一章。可见新史学之成其为新，是在于多数的西方历史学者普通地承认历史研究的兴趣应该是广阔的，而其革新，则是在于它主张发展的方向，和承认广泛的预备训练，作为执行其计划与方法的先决条件。

## （二）新史学取得胜利的若干方面

促进新史学发展的因素与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有许多作者不但对于过去饶有兴味，而且他们的眼界远远超出政治、外交和军事战略的范围。如威廉·利尔具有浪漫故事的讲说者对于中世纪的浓厚兴趣。福来塔哥是个戏剧家，他把自己的创造性的见解伸入到自己国家已往的历史；博哈德是个美学家，他善于欣赏意大利伟大艺术时代的艺术成就；瑞南、特莱伯、和怀特是唯理主义者，他们对于一切有关种族智力解放的事物，莫不穷理尽性地进行研究；敏感和有修养的格林渴望能对祖国的伟大作出适当的解释；麦克马斯特用实用工程师的眼光去欣赏那以一切阶级生活和利益为基础的吸引人的美国民族进化史。

另外一个强有力的影响是来自进化论的基本假定，特别是生物学家对于生物的成长和发展的兴趣。诚如鲁宾逊教授所经常指出，是生物学家首先用成长和发展的态度看待一切事物的方法传授给历史学家的。这是新史学的每个重要方面的基石。属于现代流派的历史学家们所以把研究事物的由来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主要是由于进化论的哲学反映在思想比较活跃的和比较易于感受的历史学家的思想中。在过去三千年中，历史学家失去了历史观点，终于由自然科学家来把它提出，虽然休谟和图格特在十八世纪似曾预见到一点社会变迁史。

运用发生发展的态度探索事物起源的兴趣是产生在这样的一个时期：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巨大变化引起了人类文化的彻底变革，使得人们探溯文化及社会制度的发展，不能再局限于宪法史、政党发展史、外交的纠缠或王朝的世系。它必须意味着这样的事物的起源，如：发电机、外科麻醉药、国际汇兑、无线电活动、梅毒治疗、心理卫生、工厂制度、内燃引擎、柏塞麦炼钢法、机械发明、印刷机和无数的其他发明。这些东西，从未惊扰过传利门恬静的酣睡。换句话说，探索现时秩序起源的冲动，产生在这样的一个时期：现存文明不再是最引人注意和戏剧性的形式去表现为一小撮上等人争夺经济特权、政治特权、或以玩弄一班可怜傀儡的生命为乐的特权，这些傀儡构成了或多或少是开明的专制统治者的雇佣常备军。如是，人们就被迫地必须对文明历史发生兴趣了。

探索事物成长的方法把善于思索的学者们引导到新史学演变的下一阶段，亦即最后阶段。这就是致力于历史的解释，其目的在于发现那些文明的

变化和社会制度的起源具有何种意义。虽然较为新式的历史学者不再希望能从过去的纪录中发现上帝的意旨或人类的最终命运，像那些习惯于把历史看成是用经验来进行教育的哲学的人们那样做，但是，必须承认，过往的唯一有意义的事件，只是那些能够启发现代或后代人的事件。而且，历史的唯一现实价值，在于它有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去了解 and 掌握我们自己的文明。在把这种种的冲动力结合在一起、去构成和建立新史学的工作中，首要人物是兰普瑞赫特、柏尔、鲁宾逊、泰卡特、和马尔温。

兰普瑞赫特体系的产生，是基于他本人对于文化人类学的兴趣，和冯德的心理学方法，孔德关于人类进步的心理解释，以及兰普瑞赫特自己的广泛文化兴趣，从经济进化直至音乐史。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兰普瑞赫特的体系和历史公式，他的著作是最先提出了争论的，争论的结果使新史学取得了明显的胜利。柏尔不仅就综合历史学的理论写出了渊博的论著，而且还计划了一部规模宏大的《人类的进化》丛书，企图真实地完成历史综合的工作。他的理论背景是制度进化的社会学观点。他企图对历史因果提出一个科学的解释，即把所谓历史综合的逻辑精密化，并用世界眼光使他的历史综合的概念真正能和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全面研究相适应。

鲁宾逊和兰普瑞赫特、柏尔、泰卡特等不同，他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历史理论的体系。他对发展的历史观的信仰，是逐渐的、经验的。作者认为，鲁宾逊史学主张的心理起源是在于他从前是、现在仍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的、在学术上好提问题的人，而新史学也不过是运用思考的历史而已，鲁宾逊脱离传统历史学是从他以成长的态度对待法国革命开始的。这种态度使他一步一步地追溯，直到人类的起源。根据他自己的述说，从他开始工作，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助教起以后的二十年中，他把历史一直往后推，从断头台一直回溯到史前期的拳斧。此外，他又受到生物学家和他们的进化论与成长的方法的深刻影响。当他对思想和文化的发展过程具有较深的理解时，他就对历史进程更加重视，这就使他相信，历史资料的解释是头等重要的工作。在美国传播新史学的运动中，鲁宾逊的首要地位是无可争辩的。这是由于他的教科书的风行；由于他成功地充任了国内最大一个研究院的教授；由于在宣传历史研究的新态度时，他是如此温雅与和蔼可亲、如此有说服力；由于他的阴徒人数众多，态度忠诚而坚定。

在历史新方法与新态度的重要作者中，没有一个人像泰卡特教授那样受委屈，他的影响同他的功绩是完全不相称的。无可置疑，他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优秀的新史学理论家，是把历史看作社会变迁的科学的 strongest 有力的宣传家。然而，在寥寥无几的学生们的小圈子以外，他几乎是不被人认识和没有影响的。这是由于他情愿单干，他否认别人所作出的成绩，而且对于那些担负了创立新史学工作的人们，他又拒绝同他们取得积极的联系。

马尔温不是个职业历史家，但是在英国唤起人们对新史学的兴趣，提倡新历史学的研究等方面，他所作出的努力比谁都要多。他极力主张进步的现实性，坚决相信科学与技术促进社会变化和人类福利上的潜力。在世界大战中民族主义的矛盾与分裂所导致的祸害给他极深刻的印象。为了抵销这些祸害，他发表了一系列的讲演和书刊，希望通过对文化的共同了解和欣赏来提倡世界统一。他自己所撰写的三部曲，和由他计划并担任编辑的“统一丛刊”，是英国新历史学最显著的成就新史学近来在意大利获得惊人的支持。它滥觞于费雷罗的《罗马的伟大与衰落》一书，该书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新史学还得到了大哲学家克罗齐的大力支持。意大利的进步历史学者是以巴尔巴加罗为首。他们的机关杂志是著名的“Nuova Revista Storica”，1917年创刊。

### （三）新史学计划书

曾经有人这样主张：任何人只须有一支笔和一瓶墨水，就可以做历史家，只要他愿意到当地的一个教堂墓地里去把石碑上一些铭文抄录下来，或是预备好一篇关于克利奥佩特拉女王的论文，去向当地的缝级组宣读就行。直至今日，也仍有细心的进步历史学者，他们反对确定历史学的领域，反对给它划定界线；他们只是鼓励那些企图这样做的人们，如果他们对历史问题发生兴趣，那么，直接钻进去，竭尽力量去钻研就是了。作者认为，很难承认这样的态度是正确的，除非人们能够同意：每个调制沸腾散的人都是医生，每个拿起锐利屠刀跃跃欲试的人都应当被鼓励去当外科大夫。即使是那些旧式的、简单得多的，只是讲些插话及轶事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历史，也往往因缺乏统一的和经过熟思的方法和工作纲领而陷于困难。新史学对于它的纲领和对于实现它的企图所需要的训练若无一致的意见，就将遭受损失。新史学要求意见一致、统一和协作的程度，并不亚于医学、法律学或工程学等专门职业。

按照定义，新史学的纲领，就其兴趣范围而论应该是无所不包的。它记录过去曾经发生的一切事物。按照严格的或文字上的意义，所有过去发生的事物，没有一项可以被指为是非历史的，而可加以排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散漫的漠不关心或是萌芽的无政府状态。新型的历史学者承认一切过去发生的事物都具有历史性质，从原始的萨曼教徒的咒语，到所罗门王第七百三十一个妃子的化妆品的化学方剂，蒸汽机的发明，以及华盛顿从弗吉尼亚州赴麻萨诸塞州一路睡眠时所用床垫的材料及其构造。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新型历史学者对于这一切的事物抱有同等的兴趣，或是认为这些事物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诚然，一个人很可能只是在他最有兴趣的研究范围内做出优异的成绩。

如果一个人要立志作一个历史家，而且酷好研究瑞士的海军战术的演变，他的研究工作应当受到鼓励。但他也应该知道，他所研究的问题，绝不会和英国产业革命或现代技术史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在这些地方，应该坚持一种常识的态度。历史资料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它的时代所决定的，另外一方面是由它对于现代生活的意义所决定；但是，最重要的是由历史家所抱的研究目的所决定。显然，中世纪的科学史绝不如中世纪的宗教史那样重要；而现代的宗教绝不及现代科学的发展重要。从哥伯尼以来，星象学绝没有天文学那样重要；而自1800年以来，医学史比巫术史更加重要。

新史学的主要任务有二：（1）把过去重要时代的文化整体重新复原；（2）研究现代文化与制度的起源。关于第一个问题，人类文化各方面的重要性应该取决于它对于我们要研究的时代的意义。

在试图研究培来克理斯时代的文化，我们衡量这个时代一个事件或一个方面的重要性的标准应该是当时的标准，而不是写历史人的时代的标准。正是这个事实使得一位天真的、虔诚的、枯燥的、没有审美观念的、独身的，

在堪萨斯州教会大学任教的历史教授在描写亚历山大或奥古斯丁时代的文化时感到极为困难。他必然对当时社会竟有饮酒的聚会，和吸引人的妓女，而感觉不满；他必然又对这时代竟没有主日学校，反对吸烟的法律和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等事而感到惊奇。这就是基督教历史家对于非基督教文化大加歪曲的原因。一个建立在教育人民如何活得快乐的哲学基础之上的文化很难被一个费尽心机来准备如何死得安全与成功的时代来正确地理解与欣赏。

当一个历史家从事于新史学的第二个任务，即探索现代制度与现代文化的特点时，我们必须以它对于现代生活的影响作为衡量某一方面的重要性的标准。对中世纪说来，科学显然不及宗教重要，但对现代说来，研究中世纪的科学史就比宗教史更有意义。

假使一个人要对希腊文化作一个全面研究，那么星象学家应比天文学家占着更重要的地位。但是他若要探究现代文化的起源，那么亚里斯塔克斯与希巴尔卡斯的成就就要比整个古代希腊所有星象学家的全部成就更加重要。如果我们要对宗教改革时代的学术思想作出一个忠实的描写，那么我们应着重研究的问题是“通过信仰而得救”等问题，而不是路德、喀尔文及其他领袖的经济思想。但是，从现代文化的来源的角度看来，新教领袖对天主教经济思想与经济实践的批判就比一切神学问题更加重要。从中世纪史家的角度来看，罗哲尔·培根的性格与活动，主要地是一个中世纪人物；但对一个新史学家说来，培根的现代观点，和他偶尔提到的归纳法和试验法就更加重要。

从以上几个例子看来，一个历史事件，一个文化的表现，它的重要性都不是单一的，绝对的；而是二元的，或多元的。每一历史事件的重要性都是相对的：（1）对于它自己的时代的意义；（2）对于现代文化的起源的意义。凡是对于历史问题有正确理解，而且力能胜任的历史家，都是从这两方面来衡量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一般人都认为，一个历史家在一部著作中可以达到两个目的：（1）把一旧文化复原；（2）说明这个文化对现代的影响。但是，我怀疑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因为一个历史家从两种不同角度来衡量一个历史事件的结果，他必致偏于一个角度而歪曲历史；有时两目的都没有作到。

十分明显，如果一个人的兴趣是在探溯一个不是自己所属的文明的来源，那么评论他的史料价值的标准，应该是按照这件史料对于他所进行深溯的那个文明的重要性。例如，在探索古希腊文明的起源时，某一特种类型的埃及历史事实的重要性，必须是决定于这历史事实对古希腊文化的特殊贡献，而不是决定于这件历史事实在埃及文明中的相对地位与意义，或是它对于探索者本人的时代的重要性。

有人或者要埋怨说，这样对历史材料的重要性的测验，是相对的和实用主义的。难道没有绝对的和超范畴的标准吗？显然是没有的，除开这一事实；在最终的分析中，历史资料对于解释我们现代文明的价值，远远超越该资料所具有的任何其他意义。

---

堪萨斯州（Kansas）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州，地方蔽塞，文化水平较低。故本书作者对此州的历史教师加以讥笑。——译者

基督教会用星期日为儿童宣讲教义，名为主日学校。——译者

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1920年1月26日），禁止制造、转运、出卖酒类，此法令在1933年12月5日同为第二十一条修正案所取消。——译者

上面简短的讨论，即关于新史学工作者的眼界和兴趣的无所不包的范  
围，和关于历史资料重要性的双重标准，自然而然地引起另外一个问题：即  
如何从新概念和新态度的角度来组织历史资料。在旧日，情况很简单。人们  
总是把政治和军事历史的轮廓描绘出来，总是认为，拿它作为架子，来建立  
起人类的全部史诗，就足够了。新史学的概念对于旧史学这种原始的简单纯  
朴是起毁灭性的作用的，正如现代的天文物理学、进化生物学和圣经学批判，  
对于比我们老一辈的人们的简单信仰和安慰人的教条起了毁灭性的作用。我  
们不但必须承认，政治舞台完全不足以建筑全部的历史大厦；而且还必须承  
认，任何单独一种的历史事实都不足以充当组织历史材料的基础。历史的因  
果律不是只用一把钥匙就能打开的。有的时候，某一个或某一个因素可能  
上升到极端重要的地位，但是，没有任何单一的“原因”或“影响”，能够  
贯穿全部人类历史。

粗略地和初步地说，历史因果的链索大致如下：历史的两个相对不变  
的因素是人的天性和地理环境，但是不能说它们是绝对静止的。它们是如此  
同其他附有条件的影响交织在一起，以致它们的相互作用的性质和广度不断  
地在发生变化。人的天性对于特定形态的地理刺激的反应，就产生一种特殊  
的人生观。这个人生观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科学技术的出现与发展范围。科学  
技术的状况相当深刻地限制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经济生活的性质。经济制  
度则强有力地限制、有时乃至决定其他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即社会、政治、  
法律、宗教、道德、教育和文学制度等因素。

其实，这是对于历史进程的过于简单化的陈述。因和果是继续不断地  
相互作用和相互反作用的。几件机械的发明，像印刷术或是传递消息新方  
法，就可能如此改变人类的生活，以致引起某一时期人们的主导心理的全  
面转变。又如，某些心理和文化因素，有时也可能有足够的力量阻碍经济利  
益和物质繁荣的明显发展。历史发展的结束是错综复杂的，只有学问渊博  
的历史家，才能解决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因果问题，更勿论能够试图提出  
某种普遍有效的应用定则，对人类历史作全面的解释了。

政治的架子曾经支持着辛勤活动的历史家，但这棚架已经坍塌了。一  
些敏锐地注意到这种情况的人，会企图用这样一种想法来安慰自己说：如  
果我们不能用政治事件来作为历史工作的架子，至少我们可以依赖民族共  
同体，以从事于法国文化、意大利文化、西班牙文化等等进化史的著述。  
但这样做仍然是要使人失望的。因为民族史的概念，整个是同政治拜物教  
和政治因果的假设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的。人们只要从文化及制度进  
化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就能立即明显地看出民族史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  
朝代改换、党派政治、外交阴谋可能在定义上被说成是严格的民族事务，  
尽管在实践上它们很少完全是这样。但是文化和制度的发展现在不是、从  
来也不是、永远不会是民族的事物。关于汽车、印刷机、或显微镜在某一  
国发展的历史，和法国或德国文化史一样，都是不可想像的。研究文化  
的一些具有国际渊源和国际条件的各个方面，在某一国家范围之内是怎样  
特别发展起来和受到欢迎、或是特别受到限制和谴责，这对于学者来说，  
可能是有趣和令人满意的事情。但是，任何民族的文化与制度史都不能  
不是人为的和琐碎的，只要拿它去和另一种研究比较，即关于制度与文  
化起源的研究，这种发展进程，是不受任何由朝代野心或经济贪欲所造  
作出来的界线所局限的。我们可以继续研究文化的民族条件，但绝不能  
研究文化的民族进化。在新史学面前，民族历史一定



要被人遗忘而衰落下去，如同那个被当作是组织与说明历史事实的基础的政治历史要衰落下去一样。民族曾趣被人看成是一种政治共同体。后来瑞南、曾威尔、济姆门等又否认民族的政治基础而把它描绘成一种文化统一体。我们或许应该再迈进一步，指出民族是一种危险的文化幻觉——一种文化的心理病态或文化的神经错乱。对于研究历史写作和历史讲授是如何影响了民族主义、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学者来说，上述的意见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但我们不能在本章中讨论这些问题。

从前的历史家惯于以政治史为骨干，以民族史为范围。现在这种方法已经陈旧不堪了。被迫放弃这种旧式方法的历史家弄得进退失据，狼狈不堪。但他至少仍可以争辩说，他还能在传统的历史年代中间，即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中给自己掘出藏身之所。但是，无情的新史学宣传者既然不让他躲避在政治因果论和民族主义的避难所中，更不会让他钻进年代学的防空洞中。人类学家教导我们说，从纯粹的年代学排列的观点看来，旧的年代学是完全不适用的，而且它歪曲历史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就时间的距离和文化成就而论，全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包括在旧式的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范畴之内，实际上都是极端近代的历史。其实，古代史应该是指原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阶段；中古史应指新石器时代文化；近代史应该是指从金属时代开始时，至少是公元前三千年起，至十八世纪中叶发生科学与产业革命止；现代史应该是恰当地描述由于近时科学和工业变革而产生的革新文明。对于旧的年代学进行文化的与制度的批判的结果，其破坏性要比从人类发展的新的时间透视所进行的批评厉害得多。旧的年代学是建筑在这样的一种概念之上的，即它认为能够把人类进化过程截然划分为明确的几个阶段。这是基于一系列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全都是错误的。划分阶段的原始基础几乎纯是年代排列，是从年代上而不是从文化上考虑的。年代的划分的标志尽是在历史上居于次要地位的事件。在他们看来，战役就是战役，一个在公元前 561 年发生的战役，同一个在公元 827 年发生的战役的差异，仅是在于前者发生在公元前 561 年，而后者发生在公元 827 年。当一个文化史学者使用传统的年代学时，他就必须有意识地假定，文明在公元 324 年和公元 326 年之间、或在公元 1452 年和公元 1454 年之间，是存在着实实在在的鸿沟。他还必须假定，整个文化的复杂体是一个同一性质的共同体，如希腊伦理学同希腊科学技术一样的古老，近代伦理学同近代科学一样的新近，文化的各个方面是同时地调谐地发展起来的。旧式年代学还根据这样的一个荒谬的假设：即认为文化必须是在全世界同时发生和一律相同的——假定在公元前 500 年，世界各地都存在着同一种古代异教文化，而在公元 1300 年，世界各地完全是属于中世纪性质的；在 1850 年，世界各地都变成基本上是近代的。

这样，人们可以看出，以基本年代的顺序为基础的年代学没有任何重要意义可言。历史的连续性证明时代的明确划分是徒劳无益的。不但如此，在人类学理论和文化史看来，复杂的文化的各个因素有着迥然相异的发展比例，而文化的美学方面，则是不服从任何可以表述的演变或发展规律，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如果“现代”是指社会的富裕和科学的应用，那末希

---

原文为 Zangwill。——译者

原文为 Zimmern。——译者

腊的伦理学就要比苏姆纳 或柯立治 的伦理学更要近代化。同样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生活要比今日的更加丰富和广阔得多。非常明显，如果假定一切类型的文化和制度的发展比例都是一律相同的，以此作为年代学的基础，那末，年代学就不可能是科学的了。再则，文化进化率在地球上各个不同区域内是相差很远的。能够想像：在“古代文明”标题之下描述公元前一千年的中国、斯堪的纳维亚、南美洲、高卢、美索不达米和印度的文化，或是在“现代文明”标题之下描述公元 1890 年的中国、英国、德国、俄国和巴西的文化吗？看来唯一能够具有科学价值的年代学类型，只能是高度专门化的，只能是基于并且描述在一个性质相当统一的文化区域范围内的文化之某些特定方面或某一特定制度的发展。传统的历史学者或者要反驳说，那干脆不用年代学好了。他说得对啊！

那个历史学者在绝望中也许要咆哮说：这是不能容忍的混乱、无政府的复杂状态。我们必须坦率承认，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但这不能归咎于新史学的提倡者。这只能说明，历史学者们正在开始觉醒过来，在正视着今日我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所面临的状况。这只能说明，历史观是在朝向现代化转变，在开始认识那些早已为宗教学者、哲学者、社会学者和伦理学者所认识的事物。这只能说明，那象征性的历史鸵鸟，终于从中世纪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沙堆里抬起头来，对二十世纪世界重新观察一遍。我们的鸵鸟所看见的，已不再是简陋的、世世代代无甚变化的生活条件，也不再是毫无批判地依靠原始宇宙学和几条质朴的宗教教条而产生了幻觉的安全感。他所看见的，是大工业时代的动力和急剧变化的机械力的城市文明，是令人不安的大幅度的宇宙学，是关于人怎样解释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在肉体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的安全感的问题，是对于这些问题的一切有关的假设提出严肃的疑问。这些历史事件和形势的惊人变化正在迫使历史概念、目的、与方法发生相应的变化。莫怪那历史鸵鸟的初次感情冲动是再一次把头插进沙堆里去。

换句话说，历史学家所面临的问题，只是如何按照二十世纪知识与方法的要求，去执行他的职业的问题，犹如我们所有的人都面临着应鼓如何按照真正生活在现今时代的要求、去强使自己实行必要的重新调整的问题一样。在五十年前，一个有文化的美国公民只须相信（基督教）赎罪论、保护关税和共和党，就能感到十分够足和安全。在今日，那同一个美国公民就要面对困惑的疑难和伤脑筋的踌躇，由于那动人的现代天文物理学证明了我们星球的渺小，从而证明了人的自身的渺小；由于关税制度所依为基础的整个社会经济复杂性引起了人们的疑惑；还由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现今时代的复杂性面前，共和党也罢，民主党也罢，它们都是完全无能为力的，甚至连人类本身在实际政治上也是无能的。已往五十年的变化，对于美国大学里一个活泼敏感的历史教授在方向上和方法上所激起的变化，是同等深刻、同等丰富的。

如果有人认为，仅有少数智慧超群的人才能按照以上所说的担负历史学者的新职责与义务，那末，我们可以回答：现代家庭主妇已不能再行医了，理发匠不能再充当外科大夫了；然而自从人们承认行医人员必须加以限制并强制实施这种限制以后，医学的内科外科，却都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

苏姆纳（John S. Sumner）。——译者

柯立治（Calvin Coolidge，1872—1933 年），美国第 30 任总统（1923—1927 年）。——译者

在结束这个对于新史学的范围与纲领的讨论之前，我们应研究新历史学两项主要任务的相对重要性：（一）重新研究已往各个文明，恢复其原来的面貌；（二）研究现时秩序之所由来。必须承认，后者较前者更为重要。老实说，研究已往文明，除了那些经过研究而组织起来的事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说明现代文明的来源以外，便没有其他重要性了。试使伯里克理的时代或者查士丁尼的法庭复活，试一试我们能够这样做到什么地步，当然是很有趣的工作。但是，这种练习，就其本身孤立地来看，只能是牵强附会的历史纵横组字游戏，或者更恰切地说，是历史纵横截面游戏。去考察希腊人怎样生活，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的，除非这项研究能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在现时怎样生活或应当怎样生活的。因此，从任何严肃的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已往文化的重新研究，其重要性仅仅是在于它能促使我们更好地去理解今日的文明，其必要性别决定于其能否达到此目的。当然，要是有人感觉到，进行关于古代赫提民族生活方式的研究和推测，比任何其他娱乐都更要有乐趣的话，那末，全然应该容许他去作这样的消遣。但是，必须教导他去把这种消遣看成是和形而上学的推测、吸烟、高尔夫球、打桥牌等相类同。然而，如果这个人所以研究赫提文明是为了从它的冶铁工业的起源去发现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城现时繁荣的遥远背景，那么这项研究就具有较高的价值。

由此可见，那些认为新史学的唯一与最终目的在于创造一种包括一切时代一切文明的宏伟历史的人们，他们对于动的和综合的历史的根本宗旨的看法是极不全面的。奥格登教授所计划和主编的《文明历史丛书》，大大扩张了柏尔的《人文进化丛书》。自从希罗多德阐述上帝怎样拯救了雅典人以后，这是最高深和最有意义的一项历史计划，为其他历史计划所不及。但是，它却没有达到新史学的最终目标。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更为宏大的丛书来补充它和利用它，来探索像这样的一些事物的起源，如熔矿炉、印刷机、私有财产、贞操概念、古典文学在儿童教学法的理论和技术中的地位、保护关税、党派政府、汽车、放射作用、精神分析、民主理论、工厂制度、一夫一妻制家庭、陪审制度、性病预防法、外科麻醉药、国际汇兑、现代改良公路、收割机、禁酒、以及亿万其他用具、制度和实践，这一切，都是构成我们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所叫做“生活”的东西。作者认为，这样的一部丛书便构成有思想性的和实际有用的历史的最终目标，便要比去研究西塞罗在他猛烈攻击加达莱因的前一晚上吃了什么饭的目标高明得多。作者丝毫不反对人们花功夫去准确而生动地刻划我们祖先的生活。作者只是要强调地指出，那些从事于这样的工作的人们应该明白，他们所进行的并不是极端重要的学术活动，而是高超的消遣和行乐。

我们强调对现代社会起源从它的成长过程进行分析的头等重要性，因为在这里我们接触到历史给予人类的唯一真正的教训。对于一切善于思考的人们来说，十分明显，过去的社会与文化形势是如此不同于二十世纪，我们从遥远历史时期所吸取的经验对我们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然而，如果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制度追溯到遥远历史的肇端，我们就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的时代，而且还能够破除对于过去的崇拜与轻信之心，这种崇拜与轻信，是社会与知识进步的主要障碍，是对于社会的最危险威胁。这里顺便指出，

---

奥格登（O.K.Ogden）当代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家。——译者

见本书第 184 页注。

如果把历史的工作主要放在追溯现代文化与制度的起源上，许多上述有关一般历史材料的组织、有关历史因果的学说争论和有关历史年代学的复杂争端等问题，就会自行消失，因为，这里的每一项问题，就都会变为某一制度或文化形态的起源与发展的问題，尽管它的历史会同文化的各个有关方面的历史牵连在一起。这样，人们就不必去处理整个文明的阶段问题，或者历史因果的一般问题。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提及历史学的作为社会变迁的一门科学的问题，像特加特教授所极力主张和精巧阐明的那样。作者认为，这问题与其说是属于历史的正当范围，莫如说是属于历史社会学，虽然作者并不想去向那些把它纳入新史学范围的人们展开争辩。如果人们愿意把断定社会因果规律与过程看成是历史科学的最终阶段和史学家的基本目标，那么，十分明显，新史学的双重任务，即：（一）重新研究过去的文明，（二）探溯现代文明的起源——就会对研究社会因果关系或研究社会变迁科学的学者们提供参考黄料，供他们进行研究与思想。

#### （四）新史学所需要的训练

新史学要获得成功的话，十分明显，它就必须在这个研究范围内培养越来越多的热心工作者，使他们能够胜任研究与综合工作。如果说，旧历史学由于它的信徒们缺乏足够的副练而遭受了损失，那末，新史学就会更加是如此，因为新史学所要求的预修课程的范围是更要广泛得多的。当然可以这样说，特出的天才没有经过大力培养，也许也就能够出色地完成这种工作，但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不是天才人物。新史学像旧史学一样，必须从专心和热诚的学者中间来招募它的大部分队伍，虽然新兵要取得成就是更加困难的。他们需要通过彻底的技术训练，来得到加强、支持和指导。

一定要坚持新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研究文化与制度起源的科学，而不是一种艺术。当然应当承认，新史学派的出色的史学家将是这样的人：他们既掌握科学的准确性和渊博的学识，又具备特种艺术性的创造能力；只有特种艺术性，才能精巧地使过去的文明复原，并熟练地探溯观念与制度的起源。这是十分明显的道理，正如医学上的伟大诊断家是超出熟练技术科学家的本领的，但要成为一个驰名的诊断家，他非首先具备熟练医学家的本领不可。我们尤其是不能把历史家的本领同文学家和辞藻混淆起来。善于写文章的聪明才子本身并不是历史家，犹如一个能画一幅酷似圣彼得或查理一世的杰出的画像的油画家并不是历史家一样。凡·戴克和喀莱尔一样，不能称为历史家。霍卡瑟和麦皋莱一样，才是真正的历史家。

有人争辩说，历史对公众生活与舆论所以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近来历史写作者缺乏优美的文笔。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在于，近时极大部分历史作品的内容陷于神秘、无生气、文不对题和萎靡不振的境地。如果要指出有什么恶劣因素败坏了近时历史著作的名誉的话，那就是：以陈腐的观念对待历史著作的性质、范围与目的；学究式的卖弄学问渊博；专门选择冷门题材；扶输社式的趣味观点；就是利用历史写作当做在学术界里谋求升级和拉拢著名学者的手段，而不以提倡人道主义和促进人类福利为目的。即使是桑巴特或凡勃仑，也能够吸引大群热心的读者，只要辛苦钻研他们的晦涩的文章的结果能够个人得到收获。优美的文笔的价值和需要是无可

置疑的，但好文章必须是由好的历史家来写；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的是好的历史文章，要从这个名词的最好的意义来理解它。

我们特别反对关于历史事件和历史形势的独特性与神秘性的说法。所谓历史的戏剧只不过是关于一种生物化学共同体对于地球刺激的反应的记录。人类的反应比较其他动物的行为或者在试验室里研究的有机组织与无机物质的反应，并没有什么更为神秘或独特的地方。法国革命时制宪会议的辩论，同布隆斯公园里跳跃着的猩猩一样，都纯然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历史形势并不比在豚鼠身上进行的特殊生物试验更要独特，尽管前者无疑地是一种复杂得多的事物。必须特别强调指出，历史形势的那些独特的方面，都是根本上无关紧要的事情。历史现象要成为可以理解的东西，必须通过有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对它们进行确切的科学分析。

要准备承担历史家的任务，不能仅仅进行古董式的研究，或仅仅掌握大批陈陈相因的历史事实。一个人搜罗和编辑大量的碑文，并不就成为历史家，不管他的工作对于学同和历史有多大的贡献，正如一个人给艺术博物馆搜集古董家具和进行分类工作，并不就成为历史家一样的道理。一个人不能单靠能背诵普乐特兹所编的《世界历史手册》的最新版，而取得历史家的资格，正如一个人熟习了阿耶历书上关于 1870 年的葡萄酒酿造期，并不就能在纽约城贝勒维乌医院充当一个聪明的实习医生。

新史学一切培养的基础，仍然是关于档案研究技术的传统训练。初学的历史工作者，仍然需要和从前一样，必须在档案、石刻、和碑文的研究原则受到严格的训练。甚至在这方面需要受比从前更加广博的训练。在今天研究古代史，不仅需要熟悉铭文的搜集，而且还需要精通史前考古学和纸草学，这些都是从前库尔提阿斯和蒙森所不闻不问的。研究近代史，又比研究中古文件需要具备更渊博的专门知识。初学的中古史学者，只要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和阿拉伯文以及档案批判所需要的辅助科学，再加上一本宗教辞汇集注和一本杜·刚兹字典来指导他的中世纪用语，就可以开始工作。研究现代史的学者却面临着多得无限量的先决条件。他需要熟习簿记学和会计学、技术学的原理、法人团体的财政，现代政治学专用术语、运输学原理、和无数的其他关于现代文明的著作，如果他要读通那些构成他的专业原料的文件史料的话。一个现代史学者要是不能辨别车床和挥发器的不同、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的不同，那他就会走到悲惨的境地，像一个中古史学家把圣母的“清静妊娠”当作是一种卫生箴规那样。

熟习了研究档案的基本技术之后，第二步就要把握真正的历史观点，这要通过紧紧掌握住进化的即成长观点来获得。历史学家必须完全以发生、发展的观点作为主导思想，犹如医生从辨症静断和病症预后着手工作一样。他必须精通有关宇宙、生物、文化与制度的进化过程的基本理论，并且习惯于用进化论的术语和进化的过程来考察人。进化论对于历史家的重要性，犹如力学之于物理学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凡是要当历史学学者的人，一开始就要有历史头脑。

其次，历史学者需要精通人类地理学的基本事实和原理，熟习最新的区

域地理家的学说,这些学说是从人类地理学的角度出发的。像费弗尔 所著《历史的地理导言》这样一本书,就能说明我们的意思。历史学者尤其要精通自己所希图成为专家的那个地区的自然地理与社会地理。新史学工作者从一开始就必须认清:以往的所谓历史地理,只不过是熟悉政治疆界和战争地点,其实并不是什么历史地理,尽管这种知识是有用的。他必须习惯于从历史地理条件的三大阶段来思考问题。这三大阶段就是:河、海和洋,如同米兹尼可夫 所略述的。他还需要熟悉世界范围的文化交往的伟大意义,像谢伯特教授 研究欧洲扩张的历史意义时所生动阐明的。

新史学者又必须透彻熟悉人和他的行为,包括正常与非正常的。他需要先精通人体化学与内分泌学的原理。不熟知人类行为的腺质基础就不能够理解和说明人的行动,已往的或现时的。必须熟悉肾上腺的活动,像熟悉坡特海斯特或伯恩海姆那样。当沙佐挪夫在 1914 年 7 月决定进行战争时,肾素所起的作用也静并不亚于泛斯拉夫主义。同样的,要做一个通达事理和合格的历史学者,就需要了解与人类病理学有关的各种主要的比较普通的不正常行为形态。政治家、外交家和最高法院法官通常都是老年人,而人们如果不熟识与动脉硬化症和衰老神经错乱有关的行为样式,就完全无法理解老年人的行为。很明显,人们不熟识梅毒的影响,是不能确切地解释许多的欧洲著名国王、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行为的。要解说某一人的举止,慢性肾脏炎往往比他的政治活动、教育、宗教或经济投资更能剖明问题。了解与主要的精神病和癫痫病有关的行为样式,也同样是不可缺少的。

人类的行为,如果同其他动物、特别是同猩猩的行为严格分隔开来,就成为不可理解的。因此,必须完全掌握比较心理学的知识。对于任何试图对人类行为进行现实解释的人来说,像耶尔基斯所著《几乎是人》这本书是不可缺少的。这本书是关于猩猩心理学的最好和最可靠的通俗著作。初学的人们,假如他们幸而具有幽默感的话,还应该再补充学习达依的著作《这个猩猩世界》。对于一个明达的历史学者来说,“人类仅是稍微高于猿人”这个真实事实的意义,要比认为“人类仅次于天使”这个可疑的说法的意义重大得多。行为心理学这门十分重视社会条件的科学,对于历史学者是极端重要的,只要他有意从早期生活和社会环境来说明某一个人的性格。此外,还需要增添精神分析心理学,因为这门科学深刻地说明行为的不自觉动机,并且坚持对日常生活和个人历史的深邃进行调查与了解,这是理解任何个人行为内幕根源所必需的。最后,应当适当掌握社会心理的事实,以便澄清群众心理对于个人的影响,和说明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各式各样的相互反应。

必须学习人类学,不仅是因为它强调人和各种人的制度的进化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阐明文化发展的规律与过程。关于历史发展的根本原理,学习像奥格本 的《社会变迁》、威斯勒 的《人和文化》和克罗柏尔 的《人

---

费弗尔 (LucienFebvre1878—1956)。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译者

原文为 LeonMetchnikoff.——译者

谢伯特 (WilliamRobertShepherd, 1881—1956), 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家, 长期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译者

奥格本 (W.F.Ogburn, 1886—), 美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译者

原文为 Wisslef, ——译者

原文为 Kroeber。——译者

类学》这样的著作，要比去学习十几本正式的历史方法的书本更有益。人类学比任何其他新的辅助科学都更加真正是历史的门槛，无论从年代学或是方法学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

要真正能够胜任新史学的工作，必须彻底精通作为一切社会科学入门的基础与初阶的社会学，以及各个专门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等等。历史是关于人在社会环境条件下发展的记录。因而，如果不是具备由社会学和专门社会科学所阐明的关于集体生活的事实和进程的科学知识，就不可能对这种纪录作出合理的解释。倘若要进行某项工作，而它是要求具有某种专门社会科学的中等水平以上的知识的，那末，就要彻底地掌握这些专门社会科学。例如，没有在现代经济学的各个主要部门和经济统计学中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就休想要从事于经济史的细节工作。如果要从事于科学史或美学史范围内的著作，则除了上述社会科学以外，还必须具备自然科学或美术的专门知识。关于新史学预备条件的这样宏大而苛求的一个纲领，有许多人会承认它的重要性，但却要反驳说，一个人要具备这么多的条件，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作者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是似是而非的和不确切的。只要人们充分认识新史学预备条件的必要性，达到了他们认识医学和工程学的专门预备条件的程度，那末一切的预备就都会是容易做到的。我们在大学里设有医学预科课程，在修完这些的基础上再进修医学专业课程。到了适当时机，我们也会毁置历史预科课程以及历史专业学院和社会科学专业学院，使上述历史教育纲领能全部实现，所需要的时间，不会超过现在各大学和学院的课程在无计划状态和教学互不通气所浪费的时固。以一个历史系学生一般用以获得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七年时间来用于新史学学生所必修的一切课程，便是掉有余裕的。经过这样的预备训练之后，就可以超过一个像密歇根大学校长李德尔所指出那样的老学究、心胸狭窄、比任何活着的人都要熟悉亨利七世的吊裤带、但却不相知道任何其他事物的专家。

好争辩的人也许会说，在目前新史学的宣扬者中间，就很少乃至无人能作到上述新史学者预备条件的要求。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无疑的，鲁宾孙教授第一个就会承认，就我们描述的关于新史学者的预备条件而论，无论在那一方面，他自己只是一个愿意学习的谦逊的练习生而已，但他也产还会答称，假如他能重新再活过一生的话，那他是会进行充分预备的。鲁宾孙教授还能够理直气壮地答称，他以不充分的预备条件所完成的工作质量，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证，说明将来的学者在经过严格训练的条件下，一定能够获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 （五）结束语

本章所试图说明的要点如下：

（一）新史学不仅仅是对于历史的范围与目的的新观念。它还要求要作一个历史学者必须进行比旧历史学家远为深奥和复杂的预备工作。

（二）新史学所以新在于它较传统史学具有更广阔的历史观，承认社会科学对于历史学者训练的重要性，运用生物学和进化论者的生长观点来征服历史。

（三）到目前为止，新史学的宣扬者一直进行强烈的宣传教育运动，这个运动，是和兰普利赫特、柏尔、鲁宾孙、特卡特、和马尔温的名字联系着

的。他们已经获得了胜利。今后，他们将集中精神，致力于完善新史学的基本概念与纲领，并为未来新史学工作者提供充分培训的机会。

（四）新史学的两项主要任务，是尽力完整地重新研究已往的文明，和探溯现代文化及主要社会制度的各个重要方面的起源。这两项任务，后者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前者。其主要、乃至唯一的历史贡献，在于它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自身的历史时代。有人愿意增添第三项任务，即建立一种社会因果学或一般地研究社会变化，但这种探讨似应纳入历史社会学的范围，较为妥善。

（五）任何单独一类历史事件，都不足以构成全面组织人类文化进化史的骨架，政治事件尤其是不适用。随着文化史与制度史的出现，不但是以前的按照政治分成段落的历史，而且连传统的民族历史和历史年代学，全都要被人遗忘。

（六）任何单一的原因，都不能决定历史事件的进程。历史学者对历史因果关系必须采取一种试探的和经验的态度，并且要接受多元的观点。

（七）旧历史学对于事物的无知的简单化和教条式的肯定必须摈弃，因为这些都是幻想和引人误入于歧途的东西。今日，活跃的历史学家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不肯定性、混乱性和爆炸性，只不过是当今整个时代的象征，是历史学家发现自己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八）对未来新史学工作者进行训练时，必须从一开始就消除这样的一种观念：把历史看成是一种文学艺术或者一种玩赏古董的消遣。偶尔涉猎历史资料的文学艺术家并不就是历史学家，正如绘制历史图景的画家不是历史学家一样。历史是关于重新研究过去文明和关于现代文化起源的科学。因此，要以历史为职业的人就需要掌握一切有关研究人类的过去和探溯现时人类发展的各种类型的知识。这就要求对大学本科的课程进行详细的规划，如同对医科和工程学科那样要求的有远见和专门化的预备条件一般。简言之，我们不考虑人的本性和人的行动，就不能再从事于历史著作和历史教学。



## 出版说明

“新史学派”是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之一。鲁滨孙的《新史学》一书则是阐述这个学派史学主张的基本著作。

詹姆斯·哈成·鲁滨孙（1863—1936）是美国“新史学派”的倡导人。他1863年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布鲁明顿市。父亲是当地银行的创办人，家境富裕。他1884年入哈佛大学，1888年获文学硕士，同年进德国弗赖堡大学，在德国教授的研究班中，接受研究方法的训练。他的研究范围是欧洲中古和近代初期史。回国后，1891—1895年间他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执教。1895年被聘任为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欧洲史教授。到1919年为止，他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了二十五年。

他的主要著作《西欧史》（1903年初版）、《近代欧洲的发展》（与比尔德合编，1907年初版）、《欧洲通史》（与布累斯提德合编，上下两册，1916年初版）和《欧洲近代史资料集》（两册，1908年初版）都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时编写的；他的新史学派也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因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意见不合，又因继承了大笔遗产，便退出该大学，与比尔德一起在纽约创办“社会研究新学院”，自任管理委员会主席。后因该校发起人之间意见分歧，遂辞职。1929年他当选为美国历史学协会主席，1936年去世。

他的代表作《新史学》，出版于1911年。书中汇编了他历年发表的论文和演说，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观点。鲁滨孙对历史学的基本主张有以下几点：一、把历史的范围扩大到包括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二、用综合的观点来解释和分析历史事实。三、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把人类历史看成为一个“继续不断的”成长过程。四、研究历史的功用在于帮助人们了解现状和推测未来。五、利用历史知识来为社会造福。鲁滨孙的这些观点，风行一时，对美国史学界的影响很大。

新史学派之所以在美国能发生巨大影响，主要原因在于：一、他长期在美国学生最多的大学担任欧洲史的主讲教师，培养出上万的学生，在美国各地大学、中学教授历史，他的同事和学生，如比尔德、绍特威尔、海士、史来生格尔、蒙恩、巴恩斯、桑戴克、福克斯、沙皮罗等后来都成了美国史学界的名人。学生替老师鼓吹，扩大了他的影响。二、他写的许多历史教本，风行美国，有的多次重版，印故多达八十余万册。这些教本大都经过多次增订再版，广泛发行，使教师和学生都熟悉他的名字。三、鲁滨孙提倡的历史学说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这位他的著作受到资产阶级的赏识，被广泛采用，历久不衰。这样就使新史学成为美国一个有势力的史学流派。

此书我馆解放前曾出版过何炳松先生的译本。1963年经齐思和教授据原书1922年版本重译。附录的巴恩斯的《论新史学》是除芳芝同志译的。这次再版是用1963年版纸型重印的。

1988年12月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86年先后分四辑印行了名著二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 新史学

## 第一章 新史学

—

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比如瑟利地方的石斧和今天早晨的报纸，都是史料来源。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无论解释亚述泥板上的契约，估计金钢石项圈的价值，或叙述查理五世的御膳都是历史范围以内。伊丽的儿媳当她知道了她所统治的伊本塞人民的困苦，因而产生一种悲伤的感想，这是历史。英国大宪章的条文，变质原理的来历，圣地亚哥城的失陷，黑衣僧同白衣僧的区别，以及今年2月1日纽约《世界报》销售数目，也是历史。每件事情都有它的关系和重要性，都被明白地记载下来。

当一个著作家着手翻阅那些书厚字密的过去记载，预备写出一份纲要，为那些无暇阅读原始资料的人们阅读，那时候他立刻要问他自己，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材料去引起读者注意。他一定觉得过去人们所遗留下来的史料，是非常杂乱的。因为这是那些时代不同和思想不同的人们，如希罗多德、马基雅弗利、尤西比阿斯、圣西蒙、佛莱辛的俄图、皮普斯、圣路加、阿普兰提斯女公爵、撒路斯提息斯、卡吞·玛塞等人所写出来的。有的非

---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1754—1793年）在位时代，巴黎珠宝商某有金钢石项圈一，以金钢石五百颗缀成，价值八万金镑。一个名叫莫特的妇女，假装替他介绍给王后玛丽·安东奈特，实际上她偷着携往英京伦敦，拆开出售。以后珠宝商向王后索价，王后矢口否认，始知被骗。此后迁延了九个月，莫特夫妇均受重刑，王后的声誉也因之大减。——译者

德国皇帝，在位年代（1519—1556年）。——译者

古代以色列的法官和祭司，见《旧约》。——译者

1215年英王约翰被贵族所迫而签署的文件，为英国宪法史中的重要文件。——译者

基督教之变质原理，由来甚古。1545—1563年在特伦特宗教大会上始有明文规定，共意义如下：凡行圣餐礼时所用之面包与葡萄酒，一经教士奉献，即变为耶稣的肉和血。把它饮食之后，可以入圣。——译者

古巴的重要城市，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战争时，被美国占领。——译者

十三世纪的托钵僧，多米尼克派称黑衣僧，卡梅立特派称白衣僧。两派服装颜色不同。——译者

纪元前五世纪时期希腊历史求，西方称他为“史学之父”。——译者

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政治家兼历史家（1469—1580年）。著有《君主论》、《佛罗伦萨史》等书。——译者

有名之基督教著作家，约264年生于犹太，340年卒，著有《世界史》，叙至纪元后328年止。——译者

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之廷臣兼外交家（1676—1755年）。著有记载当时事迹的笔记。——译者

佛莱辛主教，是十二世纪的著名历史家，著有《世界史》。——译者

英国人（1633—1703年）。著有自1660—1669年间的日记。——译者

古代基督教创立人之一，希腊人，于纪元后一世的中叶，著《路加福音》是《新约》中的一部分。——译者

法国名将阿普兰提公乔诺之妻（1784—1838年）。著有自1831—1835年间的笔记。——译者

古罗马历史家（公元前86—35年）。著有《卡提里那阴谋》、《优古尔塔战记》是《新约》中的一部份等书。——译者

常谨严，有的好像漫谈。有的对于一个放纵的宫廷官吏详详细细说了一大章，而对于民族的灭亡，反而置之不理。照此看来，要写一部历史，以供普通人阅读，如何选择材料和支配材料，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看看所有普通历史的著作，对于反复研究如何选择材料的必要性，似乎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他们显然是被传统束缚住了。他们似乎不知道有大量可备采择的材料。因而对于选择材料，不知不觉地向那条老路上走去。假使我们想到人类兴趣范围的广大，我们的普通历史著作对于过去事迹的叙述，实在太不完备，而且把读者引入了歧途。我们便感觉好像史学家合在一种阴谋里面，故意地把史学的范围和目的，弄成非常狭隘，非常肤浅。这种情形非常明显，试取任何一种普通人所读的旧式历史著作来审察一下，就知道了。

下面的一段文章，是从最近各专门学校通用的一本历史纲要中摘录出来的。

“继查理二世为那不勒斯国王者为罗安茹族的智者罗伯特（1309—1343年）。他属于归于夫党，因而不得逞志于西西里。当时西西里王为阿拉岗的彼得之子费迪南二世（1296—1337年）。

罗伯特的孙女姚安一世度过了艰苦和罪恶的一生，终于被意大利安茹王室的最后男嗣查理·杜拉佐（1414—1435年）较死在狱中，而杜拉佐遂取得政权。杜拉佐的后人姚安二世先把阿拉岗族的阿尔芳梭五世作为继子，后来又把路易三世作为嗣子，最后又把路易三世的弟弟雷内作为嗣子。阿尔芳梭继承西西里王位后，于1453年，战胜雷内和米兰的君主，遂统一两国。”

上面这段文章，并不是仅是作为一种参考材料，以备偶然检阅之用，而不希望我们作一部“对数表”去读的。这段文章是从一个名著作家专述但丁、培特拉克和光辉的路伦梭时代的意大利史中六更书里面抄出来的。据作者自叙，他这本书的目的，是提供高级学员和普通读者的一种指导。他自己写道：“本书企图将重要史事写得有条有理，并且说明一个时代和其他时代，或某一件事和其他事之间相互的关系。并且由于从历史的连贯性和那些简单的事例所激起的兴趣，可能免除使读者感到干燥无味的毛病。”在这部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著作中，著书的人仅仅提了“佛罗伦斯科·培特拉克”的名字，却把十二分之一的篇幅用来写南部意大利继续不断的朝代粉事。照这样看起来，我们可以假定这就是他所说的“将重要史事写得有条有理”的观念。但是，就上面摘出的那段看来，实在很难做到他所说的免除“干燥无味的毛病”。我翻开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叙述十八世纪法兰西大革命前夕的欧洲。著书的人应该知道用批评的方法去选择材料和分配材料的必要性，把启蒙时期的新精神和时代背景明白地叙述下来以便读者易于理解。但是他首先插入下面几句话：“辛仁道夫死于1742年；斯塔伦堡死于1745年；金斯基死于1745年。扁尔菲德继辛仁道夫而为有名无实的内阁总理。巴登斯坦自1740年至1753年任外交部长，他在秘密国务会议席上极占势力”。这些事实一点也不绪。但是在这个不易明白的世纪中难道没有比奥地利内阁大目的生死年代较有价值的事情可以叙说么？

---

美国教士（1663—1728年）。深信巫术，主张杀害被指控行巫的老妇，造成新英伦大残杀案。——译者

意大利著名诗人（1265—1321年）。著有《神曲》。为文艺复兴先驱人物。——译者

意大利诗人（1304—1374年）。为文艺复兴时代著名诗人与古代典籍的研究者。——译者

佛罗伦萨的统治者（1448—1492年）。奖励学术，提倡文化，——译者

有一个研究法兰西革命的历史专家，他在书中并没有向我们交代革命因何发生，偏喜欢把下面的一类事情津津乐道地写了好几段。

“奥尼斯封邑自称并不属于散通日，而尼韦尔内皇室领邑力争其领土应包有公国采邑；因此上奥佛尼与下奥佛尼之争端又起。瑞芒与克勒蒙菲朗两城，因争为下奥佛尼之首都，也起争端。克勒蒙·恩阿尔贡及瓦伞尼也然。沙托尼夫·恩·迪未来斯扬言非沙尔特之属土，乃皇家属邑”。

历史学家专门罗列人名和地名的趋向实在太普通。其实这种名字与读者毫无关系，为篇幅的经济起见，简直可以把他们当作未解决的方程式里的“未知数”来看。既然普通都是这样，不由得我们要问，为什么一般历史学家定要把那种毫无关系的琐碎事件写在里面？有时只是由于他们没有深加考虑。有时作者认为人名和地名是重要的，有了这些就可以说明一切了。或者他们以为写名词可以增加文章的气势；或者是想用人名和地名做中心，为将未知知识附丽的根据。其实名字只用一回，很难增加历史的趣味，恐怕反要使它模糊。我认为，只提杜拉佐、克勒蒙菲朗、金斯基、瑞尼等名字，不见得会引起人们要进一步研究的兴趣，恐怕反要增加混乱。

但是，常常有人说：就是极草率、极干燥的重大事件，在世界史里面，也可以算是好东西——因为我们至少可以有一个编年的大纲，作为我们的指导，为我们将来的历史知识提供一个轮廓。我们知道了重要的年代，将来便能够了解事实。这些事实，我们在学校中只见到一些名称。我们准备把我们在文学史上的、哲学史上的、制度上的和美术上的知识，安排在一个“历史背景”之中。但是，现在我们有许多人怀疑这编年大纲，觉得它并没有多大的价值。不过大家喜欢使用这种东西也非偶然，因为它不需要思想，只要求记忆。这是一种最容易教授的东西。我有一回遇到一位博学的教授，他在东方注过几年。我问他伊斯兰教教祖出亡的日期，这个日期和马拉松之战、克勒西之战的日期一样，一般人认为凡属读书的人都应该知道的。不料他和我一样的不记得，所以我们就去查词典。倘使我们破口说出，实在可以省掉一、二分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因此而觉得缺乏什么。

一个聪明的木匠总不常随身带着斧锯；修水管的人也不常背着铅管，以备“不时之需”，到了要用的时候，他尽可回店去取他的器械和材料。在现在，参考书价贱而且易买的时代，当然无需多记些历史事实作为进行研究的预备。当然所有一切学问，包括被忘掉的在内，可以培养产生准确的习惯，和权衡轻重的观念；但是必须和数学教科书一样，先有知识，后有公式；而在普迈史学讲授里面，我们却往往先给人公式。

所以急于要教读者注意阿拉岗王彼得的儿子和辛仁道夫以及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沙托尼夫·恩·迪米莱斯的根本理由，就是自古相传，如今还存在的那种偏重政治事件和人物的习惯。

卡莱尔曾经提出警告：离开议会、战堤和王宫远远的地方，“那种强有力的思想和行为的巨流，仍是滚滚向前奔流”。但是这句名言因为历史学家

---

公元 622 年，伊斯兰教祖穆罕默德由麦加逃到麦地那，史称此次逃亡为希志来，为回历纪元。——译者  
公元前 490 年，希腊人大败波斯人于此。——译者

1346 年，英法百年战争中，英王爱德华三世大败法国精锐军队于此。——译者

英国著作家（1795—1881 年）。著有《法兰西革命》、《英雄与英雄崇拜》、《奥立佛·克伦威尔的信札及讲演集》、《普鲁士王夫累德烈二世传》等书。——译者

听不进去，很久以来，就有人想出许多理由来辩护这种对政治和军事史的偏向。傅利门 简直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兰克 认为历史学的目的，在于使我们对于国家的起源和性质具有明确的概念。因为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另外有一个德国学者说：数千年来，国家这种东西——政治的组织，为历史研究的中心问题，他还说这是永远应该如此的。

我们不能在此处讨论国家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个复杂问题，而且也没有讨论的必要；因为没有人不认为国家的重要性，也没有人主张历史书中可以不讲到国家。我们此地应该研究的问题，就是我们对政治史的偏心引导着我们专去叙述那些无关紧要的朝代史和军事史中的琐碎事实。它们所占的宝贵地位，是不是应该拿来叙述那些向来被人轻视的重大问题？什么一个路易或者一个弗里德烈 得失了一块土地；什么惨淡经营集合了的一个小公国，在开萨·包吉亚 战败后就加快瓦解；什么两个王族间的战争，少年国王的王叔们的野心；一千年前敌人左右翼的回转。这些事情，难道是应该大书特书，占着不应得的重要地位么？人类的活动不仅是当兵，做臣民，或做君主；国家也决不是人类唯一关心的事情。在中世纪时期，人类组织了一个教会，无论从哪一方面观察它，比起政治机关更加具有永久性，拥有更大的势力，就是罗扁帝国也远不及它。自古至今，人类的活动包括海上保险、开拓商业、建筑城市、设立大学、建筑宏伟的大礼拜堂、著书、绘画，并且还发明了许多东西。我们在历史里面应该包括这些人类活动，大家渐渐承认了；但是直到现今政治史仍然保持着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人仍然把过去的政治事件，看作是历史的主要内容。

还有一种趋向，好像和上文所说偏重政治事件和伟大人物的习惯相矛盾的，那就是普通历史书里面往往好写动人听闻的事实。

有种历史书并不记载人类过去的正常状态和重要事业，而是像刺激性的戏剧一样，故意选择那些情节离奇的事情。一位现代著作家曾对我们说：法国史总能常常激起我们的注意，因为“近世没有一个国家比法国经过更多的，更激烈的，更突然的，流血更多的，更加富于戏剧性的大变革”，“没有一个地方比法国出现过更伟大的，更勇敢的，更坏的人物。没有哪一个民族比法国人得过更大的胜利，受过更大的失败”。简言之，就是“法国提供了一篇近代史中的叙事诗”。这位先生是要我们相信愈讲得离奇愈是好的历史。有位著名的化学家曾很平心地对我说：历史的正确性同我们的历史知识适成反比例。我以为还可以加上一句，就是历史有时好像警察公报一样，它的趣味和它的案情离奇适成正比例。

假如没有纯粹的小说可以满足好奇的欲望，或者把历史看作戏剧的人不给我们一种极不全面而且错误的观念，那么主张以叙述英雄人物、浪漫事迹为史学的正轨，我们也许可以不必加以反对。但是除了历史以外，没有另外一种学问是以奇闻怪事为研究的对象的。教化学的教师决不是只限于奇怪的实验，一定要精心地选择那些最典型的、最富于教育意义的东西。钾素和液

---

英国历史家（1823—1892年）。著有《诺曼人征服英国史》。——译者

十九世纪德国著名历史家（1795—1886年）。著有《罗马教皇史》、《宗教改革时代德国史》等书。——译者

法国国王常用路易为名；德国国王常用弗里德烈为名，两国常彼此交战。——译者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第四子，于1507年卒。——译者

体空气这类东西在实验上当然没有水、石灰、硫酸等那样普通。假使有位医学教师，因为恐怕学生厌听疹子、肠热这类病症，就专门去讲演麻疯和腺鼠疫，你对他的意见怎么样？除了历史学家以外，各种科学家都是尽心竭力地弄清楚那些重要而普通的事情。所有一切力量都用在这一点上面。他们的目的是研究公例，而不是研究例外。

假使记载现在的状况，只叙述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对的。浪漫的婚姻与惨死；对人下毒药的事实；犯私通罪行者与疯人；以及吞下了针过了几年忽然无意之中出来，或者误饮鸦片酊当作止痛药水，或者被啤酒大车压坏了等案情，即使一丝不漏地记载下来也不过是现代城市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上面提过的那本法国史对封建制度的叙述，只是述说了一些牢狱——“呵！如何潮湿、黑暗、凄凉呀！”——和脚镣手铐。它似乎要我们可以推想出，中古时代的教会，不过是一些恶人的诡计，来满足他们自己的贪婪和淫欲，里面充满了“欺骗、诈伪和假造的神迹”。说些真人真事并不等于讲真实。我们可以像“黄色报刊”新闻记者那样在叙述事实时，一味要聳动读者的听闻，而不管事实的背景，读这种历史反不如去读未加修饰的小说好。又有一个著作家，不说明教堂的内部如何宏伟，而只说：“圣油是丰富的，真正的十字架 残余的部分是很多的，圣安尼的本梳和圣玛利的裙子这类东西，虔诚的人们皆能看到”。虽然事实不误，但实在是并未给读者一个正确的印象。

我们不能因为普通历史学家偏重某类历史事实，就可以证明我们不必使读者去注意其他有关的事情。他们叙述一事实，或者因为它有趣，或者因为它离奇，或者认为二个受教育的人应该知道。1180年斐利·奥古斯都即位，1690年有保恩战事。但是历史学家如果抱着这种目的去选择材料，结果他的书一定包括一些著名的轶闻和动人的趣事，另外掺杂着一些干燥无味、传统相沿的历史事实。

普通历史学家又以为人类社会经常是处在混乱的状况之中。历史学家故意抹杀人类和平时代的重要性，但是人类大部分的进展是发生于和平时期。他们叙述了这一次骚乱，就跳过去叙述那一次骚乱。譬如讲到法国大革命这件事实时，他们没有工夫去说明旧制度，而其实只有研究旧制度，才可能了解革命。他们都随便引了拉·布鲁叶尔所说的“那些太阳晒黑的野兽”和重复了“吾辈之后必有洪水”这句话，马上去叙述那个恐怖时代，好像这就是法国革命的全部。他们把这个法国和全欧规模最大、最和平的变革看作了第二个圣·巴梭罗缪节日，其实一个革命的真正意义在于它能不能改变一般的状况，能不能使新的事物去代替旧的事物。因此必须把旧的事物和新的事物都要研究清楚，而对于旧的事物尤其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的同情往往

---

相传当年耶稣基督被钉死于此十字架上。——译者

法国国王（1165—1223年）。——译者

爱尔兰河名。英王威廉三世曾击败拥护詹姆士二世的军队于此。——译者

法国著作家（1645—1696年）。——译者

相传为法国革命前夕，法王路易十五及其佞臣之言，述法国革命史者，多引用之。——译者

在法国革命中，自1793年9月至1794年7月，革命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压，故名。——译者

法国宗教战争中，1572年圣·巴梭罗缪节日（8月24日），巴黎旧教党残杀新教徒，全国各地旧教党亦多响应，被残杀达万人。——译者



偏于新的方面；

而且我们对于近时的知识总比古时丰富，所以我们必须用心去研究何以当时的法国施行非法逮捕、又有行会、卖官鬻爵等旧制，而且竟有许多有思想的和怀着好心肠的人们为这些制度去进行辩护。这要比空费时间任意去谩骂这种制度，好得多了。

我知道，关于这一点一定有人要反对说，制度和历史的逐渐发展，虽然应当是研究历史的正当目的，但是唯有大学生或具有耐心的普通读者才有研究它们的能力，至于普通的人就不行了。普通人认为，唯有奇特的事件和动人的危机，才能引起人们的自然兴趣。他们又认为，历史上个人的影响必须故意夸大一些，因为一般的发展和进步的趋势，过于抽象，不是普通读者所易领会的。因此我们用人造的连续性来代替历史的继续性，把事实系在君主的系统上，如玛格纳六世（1263—1281年）之后，就是埃里克二世（1281—1299年），接下去就是哈克洪五世（1299—1320年），再下去就是玛格纳七世（1320—1365年）。但是那使是最著名的朝代名字，始终只是一些名字而已。即使我们不知道皇帝克鲁夫是个博学之士，是一个天文学家；和他同时的法王亨利四世是一个贪好酒色的懦夫。这种知识也断不能帮助我们去领会历史所能教导我们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历史的连续性。

倘使我们想出一种方法，能够把社会的状况和制度写得津津有味而且易于了解，并用真正的联系来替代君主世系的联系，如果我们能写出这样的历史，那么那些反对从根本上改变现在流行作史方法的人们，也许就会取消他们的反对态度。现在我深信：“制度”（它不过是一种民族习惯）能够使人发生兴趣。我所说的“制度”，是就极广义而说的，它包括过去人类思想和活动的方法，以及政治以外的各种成就和风向。历史上的事实，无非就是这些制度的表现。假使我们将历史事实选择适当，就可以使“制度”明白异常。

以前的著述家还有一种习惯，这就是为事实而去记载事实；我们仔细考虑一下，就知道应该删除例外的和偶然的变故，而详述那种可以阐明历史真理的事情。有一种极简单的原理可以决定哪种事实是有关系的，有用的，应该记载的；哪种是没有关系，应该删除的。我们首先应该考虑：这件事实是否能够帮助读者领会人类进化的某个时代的意义或某种制度的意义么？假使能够的话，我们就应该把这种事实作为一个达到目的的工具，愈详尽愈好。它的本身具有的趣味一定可以便利我们的工作，而不会妨碍我们的工作。假使那件事情是一件偶然的、孤立的和异常的事情，如利恩西的故事、九月屠杀或玛拉特被刺等等，我们就应该考虑一下，是否要包括在一部简明历史

---

挪威国王名。——译者

德意志皇帝（在位年代 1575—1612 年）。——译者

法王亨利四世（在位年代 1574—1589 年）。——译者

利恩西（约 1313—1354 年），罗马政治家。于 1347 年推翻罗马城中贵族统治，任罗马保民官，后被反对派所杀。——译者

1792 年 9 月，法国革命人民武装把被监禁在巴黎各修道院的反革命分子处死一批，因而巩固了巴黎的后方。——译者

法国革命中雅各宾派领袖之一，于 1793 年被刺。——译者

纲要之中，因为无论这些事迹的本身怎么样有趣或可怕，他们会把读者引入歧途，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对于人类一般的利害、成见、同永久的事业以外去了。

假如我们上面所述的对于目前史学界的通病，没有不公平的地方，我们将它的特点综合为以下几点：

(1) 随便罗列人名、地名，对读者毫无意义，它不但不能激起读者的思想和兴趣，反而使他没有精神。

(2) 不讲别的重要事情，专偏重政治事实的记载。

(3) 好叙述非常特殊的事件，不是因为这些故事可以说明一般事物的进展，或某时代的情况；而只是因为它们在编年史中很突出。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失去了历史的眼光，把一个疯狂的新闻记者像玛拉特这种人，说得比最有影响的著作家伊拉斯谟斯还要重要。

## 二

下面我要就欧洲史学史来作一个梗概的叙述，特别要对从前历史观念的变迁来做一个比较充分的说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史学观念是常常在变化的，因而将来会有一种新的观念发生，这是十分可能的。历史无疑的是“一个果园，这个园子里面种着不同的树木，而且结出各种味道不同的果子”。

历史可以满足我们的幻想，可以满足我们急切的或闲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检验我们的记忆力，用布林勃劳克的话来说，那就是它能提供一种“可信的无知”。但是历史还有一件应做而尚未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们所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这种最大效用。

的确，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人们可以从过去的事情中汲取教训，如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先例，道德的指导以及使一般人得到安慰的那种天道的干与。但是，现在一般的历史学家都日益怀疑这些功用，认为这纯粹是一种幻想。我本人就很不愿意被认为是主张历史研究是具有这些功用的人。这些功用的价值，其所依据的假设是：认为自古至今人类的情况是始终一致不变的，因而它就能提供永久先例的价值。事实上，人类的情况，至少在我们现代，是变化得如此迅速，以致人们如果要想利用过去的经验来解决现代问题，那是极其危险的。再说我们对于我们所假定的相同的过去情况很难能得到十分可靠的材料，以供我们满足当前的需要。由此看来，所谓“历史教导我们”这句廉价的夸张语句就是这种假定的类比，实际上它是经不起我们仔细研究的。当我说历史可以使我们懂得我们自己和人类的问题与前景时，我含有另一种意义，我的用意是要叫读者把注意力集中到对于他们自己历史的应用上面来。

我们若要理解我们自己所处的某一个时期的情况，我们几乎完全依靠我们对我们自己过去的思想和经验的记忆。举一个最近便的例子来说吧。一个读者如果要明白他现在为什么要读这一页书时，他就得要回忆一下他自己的历史。假使他睡得很熟，忽然惊醒起来，那时，他的记忆力就会暂时失去效

---

荷兰学者，著名人文主义者（1467—1536年）。著《愚颂》等书，讽刺当时社会的黑暗。

英国政治家兼著作家（1678—1751年）。——译者

用，他会惊奇地环顾四周，弄不清他的处境。那时，尽管平日常用的器具都——在他的眼前，但是在他的记忆力还没有给他提供帮助，使他想起一部分过去的往事之前，他就不会有处身于家的感觉。当记忆力暂时停顿时，如当人们在昏倒初醒时，或如麻药刚退，记忆力暂时失去效用时，有时会难受得几乎成为一种智力上的痛苦。我们的头脑若在正常的情况下，记忆力就会自动地从我们许多记忆里面择取一些东西，来帮助我们理解自己所处的现在。记忆力的这种作用十分迅速，十分有效，以致我们并不感到它在发生作用，以及我们对它的依赖关系。由于记忆力能够如此迅速，如此正确通过我们的过去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帮助我们明白现状，因而我们就把“现在”误解为是可以不解自明的东西，而把“过去”看成是死的、没有关系的东西，除非我们故意要去记住某些易忘的事件。

我们所说的“历史”和我们个人的“记忆”，初看起来好像有所不同，实际上它们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头脑里所记的许多东西，并不纯粹是我们个人的经验，它还包括许多听来的东西或从书本上得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我们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假使读这更书的读者停下来想一想，他就会想起许多前事，一直想到他现在在这间房子里坐着，能够阅读英文，能够百忙之中抽闲来读这本书，能够集中注意力来关心历史的功用和价值的讨论。假使他忘了这些前事，他就会迷惑不解。帮助他解除迷惑的一部分的记忆确实是他自己的经验，但是他许多的记忆却是来自历史领域，那就是听来的东西，或者是从书本上得来的东西。

假使读者只是把自己局限于当时的直接印象或个人的经验上面，那么我上面所说的话就对他一点也不发生影响了。使人们感到惊奇的是，我俩头脑中所有的指导信念真正同我们自己个人经验相联系的实在是很少的。我们自己的生日其实同阿塔佛尼斯的生日或英诺森三世的生日都是纯粹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对于后面两个历史人物的生日的知识却依靠别人的记载。

由此看来，我们自己的记忆便不知不觉地同平常所谓的历史融为一体了。从这个观点看来，历史就是记忆力的人为的扩大，它可以被用来解除对于各种生疏不明情况的迷惑。假使我们能够赋有像上帝那样对全部人类历史的完备的知识，具有比自古以来所有历史著作远为完备的知识，那么我们就不会像上帝那样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就会像上帝那样洞悉人类的痛苦，洞悉摆脱这些痛苦的种种有效方法。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过去会给我们提供行动的先例，而是因为我们充分理解了过去，便可以充分理解现状，我们的行动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面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当我们探讨过去时，还不能像我们解决个人问题那样，把阐明关于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和教育的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法作为我们的目的，例如：我们该不该访问某些人，该不该进行某种投资，该不该读某一本书，无意识地依靠我们记忆的帮助来判断现状。历史学家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些改良人类现状的原则当作自己的任务。以前的历史家对于他们自己任务都抱有别种见解。假使有一个关心现代问题的人请他们来解答现在的种种问题，他们就会一致提出种种理由来推托。有的认为历史学家的职务是在于专门研

---

古代波斯将军，公元前 490 年率波斯军队侵略希腊，无功而还。——译者

中世纪时期著名罗马教皇（在位年代，1198—1216 年），在他任教皇时期，罗马教廷达到了极盛时代。  
——译者

究君王、议会、宪法、战争、条约和领土的变动；有的认为无法写一部完备的现代史，因而我们决不能希望把过去同现在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在历史同现状中间必须留有一个适当的空间。第三人认为假使抱着一个目的去研究历史，那就违背客观态度的原则，而一切科学的，有价值的历史研究工作，都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由于上述种种情况，我们现在所有的历史著作都好像是一个记忆力很差的头脑，它所记得的事实都不足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因此，历史的实用价值迄今未曾弄清。

为了说明我们理解现状有赖于明了过去的这个道理，读者就得记住：我们现在的制度大部分都是从古代传下来的，而且也唯有过去才能够说明它们的来历。过去的罗马教会、陪审官制度、内阁制、法学博士的学位、《普通祈祷书》和七艺的产生背景，都是同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的。现代人们所有的宗教的、教育的和法律的思想并不是现代环境的直接产物，而是从过去发展起来的，当时人们的知识比现在少得多。最奇怪的事情是，我们思想习惯的变化要比我们环境的变化慢得多，而且往往差得很远。我们对于某种礼俗的尊重也往往完全出于守旧的习惯，并不是因为它对现状具有多大的价值。我们常常不免用陈旧过时的眼光来观察新问题，或是用陈旧过时的推理来解决新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始终不能适应我们的环境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对于教会以及其社会上的作用、资本家、自由教育、纳税、遵守礼拜日、贫困、战争等问题的观念，很少是同根据现在的情况来决定的。比如我所接受的关于礼拜日的信念，即上帝在西奈山上的云中规定了这种制度，这决不是十九世纪的美国自发产生的；但是这个信念现在还在影响着许多人的行为。当我们交纳税款时，显出十分不愿意，好像我们在忍受封建诸侯或专制君主的勒索，而忘记了这是由我们自己的代表所规定下来提供共同开支的经费。许多人还是更多地把战争同个人的勇敢威武联在一起，而很少把战争同钢铁公司的关系联在一起。保守的大学校长们觉得有为学校里设置“自由艺术”和“人文学科”进行辩护，但他们却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竟负有这个责任。至于要对那些保守的经济学和法律的陈腐理论进行辩护，那就要用一巨大篇幅才能说清。

现在的社会正在用空前巨大的力量在多方面地进行它自身的改良，人们对于世界的和人类的知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丰富，人类的善良愿望和社会

---

在基督教会初期，有五个中心，即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俄克、耶路撒冷。以后罗马渐成为教会的主要中心。——译者

陪审制始于中世纪时期的英国。当英王亨利二世时期（在位年代 1154—1189 年），已开始出现，至今为英美法系之特点。——译者

英国的内阁制渊源甚早，至十八世纪初年，乔治一世自德人英，充任国王，因不谙英语，乃指定大臣一人，主持重臣会议。1721 年罗勃特·华波尔任首相，责任内阁制逐渐成立。——译者

英美所用的祈祷书，系 1549 年国王爱德华六世任命大主教克兰麦根据罗马旧教的祈祷书编订而成。——译者

欧洲中古大学，称文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学等学科为七艺，以区别于法科、医科。当时统治阶级轻视劳动，认为实用技术，乃是下等人的事；而高尚人士（自由人）应研究纯学术，遂称文学、哲学等科目为自由学科，即自由人应具有的知识。——译者

红海北端半岛上的一座山，据基督教传说，当年摩西曾受耶和华十诫于此。——译者

活动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多。我们每个人在促进改良社会的事业中所起的作用都是取决于我们对于现状和舆论的理解，而我们要理解现状和舆论就多少得明白产生这种情况和思想的过程。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应该大大地发展我们的“历史头脑”，因为历史头脑可以补充我们知识中的缺点，而且它还可以促进合理的进步。从来现状一直是过去的心甘情愿的奴隶，现在我们要扳转过来，要利用过去来谋取福利的时候了。

“新史学”正在摆脱从前那些对研究历史的种种限制。历史研究将来总会有意识地来满足我们的日常需要。它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所做的与人类相关的种种发现。最近五十年来这些发现曾经帮助我们对于人类的起源、发展和前景等观念发生了巨大革命。在这最近的半个世纪中，没有一门有机科学，或无机科学不发生过变化的，而且还增添了许多新的科学，这些科学的名字都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学家所不知道的。根据上述情况，历史这门科学也就必然已被卷入这个革命潮流中去。但是我们还得承认：现在有许多历史家还不知道历史也需要一个革命。这就无怪乎现在一般人所持有对于历史的范围和性质的见解还是十分陈腐的。

本书之所以命名为《新史学》，也就是要特别强调：我俩不应该把历史学看作是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它只有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搜集、批评和融化新的资料才能获得发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历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应该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而且历史这门学问将来在我们学术生活里应该占有比从前更加重要的地位。

## 第二章 史学史

—

“历史学”这个名词的意义非常含混，在过去的二千五百年中，它的性质和目的曾经历过许多巨大的变化。所以人们如果要了解现在流行着的有关历史学的意义和研究方法的各种不同的说法，那就不能不对历史学本身的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如果我们对史学史从米利都的黑卡提阿斯和希罗多德一直到最近的博士论文回顾一番，那么就可以知道历代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历史，它始终是既受着常规惯例的摆布，又受着临时情状的影响。现在历史学不得不抛弃它以前的某些野心，由于我们逐步地意识到对于许多事情的愚昧无知，因而抛弃了许乡不正确的想法。但是这些屈辱却因为下述情况得到补偿。那就是，晚近以来，史学的范围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大大扩充了。半个世纪以前，人类的过去被人假设为只有六千年的历史，而到了现在，我们已知道它实在有几十万年的历史。而且，不但人类有历史，就是动物、植物、岩石、星辰，甚至连原子都有它们自己的历史。因此，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地质学家、天文学家，甚至连化学家都来崇拜历史。

由此看来，历史观念的发展也许是现代知识界的主要特点。历史观念不仅对社会科学，还对有机世界和无机世界的一般概念发生深厚影响。但是，历史学在最初时期，并没有甚么严肃目的。毫无疑问，最初出现的历史学家是讲故事的人，讲故事的目的通常是在于讲述一件事情，而不一定在于贡献一套很有系统的科学知识。因此，自古至今的历史只是文学的一部分，它的目的在于用艺术手法来描述过去的事实，以满足人们对于古代伟大人物的功精遭遇，王朝的兴衰，历代的天灾人祸等事的好奇心。

尽管这种原始的历史概念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不必再加以说明；但是，读一读下面这段文字倒是很有趣的。在1820年的时候，有一个法国有名的历史学家叫道诺，当他在法兰西学院讲授历史研究的课程时，他说要做一个未来的历史学家，他首先应该读一些史诗名著，因为叙述的艺术正是诗人创造的。其次，他可以从近代的小说中学习对他所描述的人物与事实赋予艺术的形态，并且学习如何连贯叙述的线索，如何将叙述中断，如何又继续叙述，如何维持读者的注意力和激起读者的兴趣。将诗和小说读完后，再去读那些优秀历史学家的著作，其目的在于获得它们的文学风格的秘密，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波里比乌斯、普鲁塔克、凯撒、撒路斯提乌斯、李维、塔西陀、马基雅弗利、归查提尼、西安侏、休谟、罗伯特逊、吉本、伏尔泰等。有了优美的文笔之后，可以再把优秀著作读一遍，不是要注意它们的形式，而是要注意它们的内容。因为，正如明智的道诺所说的，在写历史之前，“显然先要知道历史”。道诺所说学习历史的方法步骤，和他所开列的历史学家名单——无疑地这些都是多少世纪以来最有名的历史学家——都可以证明文学传统的势力在历史学家中间是很大的。

但是，大家都承认，历史和其他文学部门是有区别的。波里比乌斯在他于公元前二世纪所写的书中曾经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历史学家的目的不应该用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轶事去引起读者的赞叹，也不应该杜撰许多演说

词备人引用；而是应该像悲剧作者那样，逐渐把故事引向高潮。恰恰相反，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任务，首先在于忠实地记载古人确实做过的事情和确实说过的话，不管这些是怎样平常的言行”。

但是，古代的历史学家对于波里比乌斯的这些警告通常是不加注意的，因为他们的目的是用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和非常事件来激起读者的兴趣，或是通过描述和分析过去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政策，给读者进行政治教育，作为他们担任政治职务的准备；或是通过讲述古人所遭遇的灾祸，来教育读者忍受逆境，维护尊严。显然，那些供人消遣、给人教育，提高道德等目的，这一切都是可以用文学的手法来达到，而不一定需要对历史进行艰苦的研究。

在修昔底德、波里比扁斯和塔西陀看来，历史纯粹是人类的、世俗的事情。历史的意义只以这个世界为限。他们并不把历史看作是神或上天所起的影响。但是，随着基督教教会的成立，历史就开始具有宗教的和神学的意义。

## 二

在早期的基督教徒看来，《旧约全书》里所述的希伯来史，很可以用以证明和体现他们那个耶稣最后下凡救世的主张。他们借用比喻的解释，往往可把古代的一件十分偶然事件，说成同现在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因此，基督教徒们可以说是第一个认为历史中有伟大意义的人，他们把历史看成是叙述从创造人类到最后善恶分明为止的一篇史诗。

但是，这种神学的统一和历史意义都是大大抛弃了一切世俗的观点和正确性的情况下取得的。他们把亚摩利人说得比迦太基人还要重要。他们对于以诺和罗特看成极有关系。至于培里克里斯是一个甚么人，他们则一无所知。这种比喻的解释，使得文学的批评同历史的批评全无用处，即使不是对于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发生怀疑。后来，奥古斯丁又提出一个苦心创立和好像言之成理的“双城理论”。一个是从开初就存在的《上帝之城》，它的存在可以从《旧约全书》一直叙述到《新约全书》；另一个是为堕落的天使所建立的“魔鬼之城”，它以国王伸路斯和塞密拉密斯王后为典型的，它的丑恶的历史可以从远古一直叙述到他所生活的罗马帝国时代为止。历史从此分为神圣的和非神圣的历史。

他们先讲用幻想解释的犹太史，再讲基督教士的殉道和神迹，构成了完美无缺的历史。

到了奥古斯丁的弟子奥罗修斯，他抹煞了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的一切伟大成就。把这些国家的历史看作是崇信异教的人们的罪恶史。他奉师命，著了七卷《反对异教徒的历史》。他的目的在于驳斥那不信基督教的人们的说法，即自从罗马人放弃了古代的神道，他们所受的苦痛，比其他人们更为深重。奥罗修斯勇敢地起来宣称：与此相反，在基督教没有出现以前真正的灾难早已降临人间。他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就把古代史中的战争、瘟疫、饥

---

基督教会初期著名神学家（354—430年），曾任北非希波城主教，著有《忏悔录》、《上帝之城》等书。

——译者

相传为古代亚述国王，他的后嗣建立了古代吕底亚和古波斯王朝。——译者

古代亚述女神。相传她曾任亚述女王，死后化为鸽子，飞去为神。——译者

罗马帝国末年历史学家，生于公元后五世纪时。——译者

谨、地震、水灾、火山爆裂、雷电、风雹以及由罪恶而生的种种可怕的灾害的实例，集成一部著作。从此以后，他这部书被用来作为当时世界通史的标准教科书，达千年之久。中世纪时期的教徒们很喜欢读它，而且受到教会最高领袖的赞扬。所以对于奥罗修斯和他的无数读者来说，历史就成为上帝惩罚人类最初罪恶而给整个人世带来灾难痛苦的记载。

但是，我们不必深究奥罗修斯的雄辩就可以看出，他对于历史目的和效用的观念，和希腊人、罗马人的观念是显然不同的。在上古时代，历史有一种仿效诗和戏剧，以及借用它们的华丽的辞藻的危险。到了此时，历史就听任文学的劲敌神学蒙蔽住眼睛而被牵着走。中古时代的人把希腊的历史学家俩和罗马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陀全都遗忘。这样奥罗修斯的历史书把欧洲人的历史观引入歧途达千年之久，一直到中世纪晚期修昔底德和波里比乌斯的学说又重新受到重视。

但是，即使在文艺复兴之后，历史上神意的观念，还是没有消灭。布须埃所著的《世界通史》里面对这一点，有很明白的说明。他认为自古以来，所有的大事，隐隐之中都寓有秘密的天命。

“上帝握有世界各国最高之权；全世界之心都由他掌握着。他对于人类的情欲，或予以控制，或予以放纵，从而操纵全体人类的命运。上帝若要造就英雄，他就用恫吓来激励他们，并使军队鼓起百折不挠的精神。上帝昔要造就立法家，他就赋与智慧与远见，去除政治的弊害，确立安宁的基础。上帝知道人类的知识是有限的，他或启发他们，开扩他们的眼界，抛弃他俩的愚昧；或使他们愚昧无知，不辨是非，使他们陷于困境而不能自拔。通过这些方法上帝就能根据公道的规则对人类掌握生杀予夺之权。”

不幸的是，上帝的安排既如此玄妙，遂给许多针锋相对的观点大开方便之门。在布须埃看来，所有的历史都证明上帝爱护旧教，而痛恶那些叛离由彼得所传下来的旧教的人们。但是，路德却认为历史是可以帮助他攻击那个“栖居于罗马的那个魔鬼”。他死后不久，又有一批新教徒编了一部篇幅巨大的教会史，书名叫做《梅格德堡世纪》。在这部书里面，他们企图证明罗马教皇和旧教教会都来自魔鬼。后来，巴罗尼阿斯枢机主教自信在圣玛利直接的支持下，著了十二卷书，书中列举了上帝对于那些“胆敢反对天帝教会的傲慢之徒所降的惩罚”。在后三百年间，新教徒和旧教徒都继续不断地利用历史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就是到了现在，许多历史研究者还存在着宗教偏见。尽管这些宗教上的争论进行得十分激烈，十分盲目；但是他们却大大激起近代的许多历史方面的学术研究。假使没有这种具有党争性质的著作，如果诺杜斯继续了巴罗尼阿斯的著作，和现代詹孙的《德国人民史》，那么，我们历史的著作恐怕就会十分贫乏了。

在《梅格德堡世纪》作者们和巴罗尼阿斯看来，以及在新教和旧教历史家们看来，历史上最大的、最显著的、起决定作用的势力就是神和鬼。但是，自从十六世纪以来，我们上帝的观念和历史观念已经大大地改变了。现在难得还会有这样的历史学家，他自信能够探讨上帝的意思和上帝赏善罚恶的历

---

法国摩沃地方的主教（1627—1704年），著有《世界史》。——译者

路德（1483—1546年），德国宗教家。他代表市民阶层的利益，发动宗教改革。——译者

意大利那下勒撒地方人（1538—1607年），曾任枢机主教与梵蒂冈图书馆主任。著有《最初十二世纪之教会史》。——译者



史事实。至于魔鬼这样东西，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很少可以归功于他了。

### 三

当十六世纪之时，以马基雅弗利和归查提尼为代表的一批人把历史的观念转到世俗的方面去。这种情形，到了十八世纪更加显著。吉本、伏尔泰、体谟、罗伯特逊等人，不但把历史世俗化，而且竭力采用古代优美的文体来叙政治事件。

布林勃劳克勋爵在他约于 1737 年写成的《论历史研究》一篇书札里说道：“无论哪种学问，倘若不能使我们成为善良的人，或善良的公民，那么这种学问至多也不过是一种有名无实的东西，和懒惰的借口而已。而我们由此得到的知识，只不过是一种可敬的无知。这种可敬的无知，在我看来，就是我们普通人，甚至是最有学问的人从研究历史所得的全部利益。但是研究历史却是培育我们私德和公德的最正确手段”。他又说：“历史这样东西，大部分人们把它当作是一种消遣，正好像他们打牌一样。有些人研究历史是为了要使他们的说话富于历史引喻。现在还流行着这种说法：认为人们必须知道足够的过去历史，才能明白文献上所提到的伟人巨勋。布林勃劳克又说：“缺乏想像力的学者只是满足于整理难读的抄本资料，和解释难懂的字句来替人们服务，或是根据不可靠的材料来编纂离奇的编年史”。他说：“也有与此相反的人们，他们认为历史毕竟只是一种‘用实例进行教育的哲学’”。他认为人们在“历史中所找到的实例都是经过历史学家用生动的文笔加以描述，再加上公正的解释或批评”的。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当然比空洞的辩论或干燥无味的哲学优美而且持久。尤其是，若把他的这些话加以小结的话，那么通过研究历史，我俩可以在别人付出代价而我们自己不用冒险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利用人家的大量经验。历史可以使我们“同以前的人生活在一起，而且可以在我们没有到过的地方居住。地域加广了，时间增长了。因此，我们假使及早地研究历史的话，那么或在几年之内，或在我们还没有出去应世以前，我们不但可以获得广阔的人类知识，而且还可以获得比任何一个先辈所经历还多上数百年的经验。”我们个人的经验，就有两个缺点：由于我们生得太迟，不能看见许多事物的开端。由于我们死得太早，不能看见许多事物的结局，而历史这样东西却可以在很大的范围内弥补这两个缺点。

布林勃劳克关于历史具有使我们成为更聪明，更好的人的作用的说法，并无新奇之处。波里比乌斯早就把历史看做是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指针。古代许多历史学家著书的理由就在于希望以过去道德上的成败来扬善抑恶。但是，到了现在，几乎难得有一个历史学者还敢于劝导政治家、军事家和道德家去相信历史上的前例和教训；因为所谓前例，仔细研究一下，原来都是一种幻想；所谓教训，原来就是毫不相关的东西。拿破仑有没有在他历次战事中利用过亚力山大和凯撒的经验，我们且不去管它。但是，东乡大将却没有利用过纳尔逊在亚力山大里亚和特拉法尔加的战术，那是可以断定的。我俩的情况变化得这样日新月异，以致一百年前的政治前例和军事前例，到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至于梅德林克所谓“渴望的道德”，古代萨达那塔路斯和尼罗的荒淫无度，阿里斯蒂德斯和荷拉希伊的公正无私，显然都无助于它的倡导。

到了十八世纪，大批的历史哲学著作的出现，并且受到大众的欢迎。这

些著作都是想要了解和解释人类过去历史总趋向。奥古斯丁和布须埃的目的当然也是如此。但是，伏尔泰却于 1765 年写了一部《历史哲学》，专门攻击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宗教。他没有提出任何特殊的历史理论，他只不过选出许多所谓“有用的真理”。他在他的《各国民族风俗与精神》一文的开卷语中向夏特莱夫人说道：“在这本书里，您可以找出您所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各个重要民族的精神、风俗和习惯，都是有事实为证的。对于这些事实，我们不能不加以注意。这部书的目的，并不在于要人们知道哪一年在一个野蛮国家有一个野蛮的君主去承继一个无能的君主。假使人们不幸地将历代的年表装进脑袋，那么人们所知道的只是一些名字罢了。我们应该知道君主的不利人民的种种丰功伟绩，而不应该将无关紧要的君主装进我们的脑袋。历史的材料是广大无边的，人们不能兼收并蓄，只能加以限制和有所选择。我这本书好像一个大货栈，你可以拿取对你有用的东西。”

伏尔泰对过去的反应可以从他对于他所处时代的态度中见出，他从“大货栈”里拿取了为他的反对现状的运动所需要的东西。尽管在我们现在看来，他的著作里面并没有批评的精神，但是他的这种做法还是可行的。

赫德于 1774 年中，大骂伏尔泰和其他同时代人学问的肤浅，和著作的漫不经心；认为他们这些人妄图把人类和宇宙的历史，压缩到狭小的哲学范围中去。过了十年，他又写了一部巨大著作，叫做《对于人类历史的观念》。在这部书里，他想给予历史以某种理想的统一和秩序，从地球在天体里的位置和人类与动植物的关系说起。他说：“假使自然界有一个上帝的话，那么历史也应该有一个上帝。因为人类本来是造物主所造的一部分。人类的情欲，无论如何复杂，但都不能不服从于同一种同天体运行一样完美的自然法则。现在我深信：人类是具有获得知识的能力，而且他一定要取得他应鼓知道的一切；所以我就满怀信心地想在很杂乱的人类过去当中，探射支配人类的那些美好的、崇高的自然法则”。他认为人类天性的终点是人道。人类要经历各种不同的文明阶段。但是，人类持久的幸福只能建立在理智和公道的基础之上。而且这是一条自然法则：即“假使一个生物或一类生物被迫离开其真善美的永久位置的时候，它一定会用它自己内在的力量，或由震动，或由渐近线返回到它原来的位置。因为离开了它原有的位置，它就失去了稳定的境界”。赫特从混乱的过去中，概括出许多“法则”。这些“法则”不管是错，对于当时哲学的尖锐批评，和对于历史深湛的观察，使近代读者感到惊奇。他显然是“浪漫派”的先驱。这一派到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便达到顶峰。

#### 四

从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在史学方面，人们在文学的、政治的、军事的、道德的、神学的兴趣之外，又有一些新的兴趣在不断发展。这些新的兴趣对于历史研究很有影响，它使历史研究的精神和目的引起了根本变化，并使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了。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孟德斯鸠所写的《法律的精神》一

---

德国哲学家（1744—1803 年）。——译者

德国著名哲学家（1770—1831 年）。——译者

法国法学家（1689—1755 年）。——译者

书（于 1748 年出版）。在这部书里，他叙述了过去的历史，为的是要建立一种纯粹科学的理论，那就是人类各种制度——社会的、政治的、教育的、经济的、法律的、军事的——都具有相对性。法国于 1789 年至 1791 年间起草的第一个共和国宪法的时候所展开的许多讨论，曾促使人们去研究宪法史，而这种研究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还没有松弛下来。

到了十九世纪初年，法国革命初期曾风行一时的世界精神，开始衰落。欧洲各国民族思想开始觉醒，这在德国尤其显著。这种情况立刻在历史哲学的解释上表现出来。我自己虽不十分懂得黑格尔的哲学，但是关于他于 1822—1823 年冬天在柏林初次讲授的历史哲学，也许值得给读者再略述一遍。因为有许多人自以为已经很懂得他的哲学，而且很受他的哲学的影响。当他回顾到过去个人和民族的不断变化，存没无常，他就自信他能够看出，正是“世界精神”先去获得自觉，再去获得自由——它是世界精神的实质的自由。世界精神经历过许多阶段，呈现许多形式，在随时变化，推陈出新。各种形式都体现在各个历史民族所特有的天赋的才能里。黑格尔认为某个民族的精神一旦具有一定特点后，它就会把这个特点体现在客观世界中的一定的宗教、习惯、宪法、法律等方面。简言之，就是体现在那个民族的一切制度里和那个民族的历史里。他认为波斯人是第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民族。因为世界精神在波斯国才第一次取得“无限的主观内在性”。希腊人的特点则是“以美为条件的个人主义”。罗马世界的普遍原理刚是“主观的内在性”。他这种理论虽然很巧妙，但是要不是黑格尔突出地发现德国民族是表现出“世界精神”的最高尚的形式的话，那么他的原理就不见得能成为民族自由新福音的根据，也不见得能对解释历史发生影响。黑格尔说：“德国的精神是新世界的精神；它的目的在于实现绝对的真理，就是对于自由的无限自决……德国人的将来是基督教原理的传布者。”

黑格尔把最高的地位给与他的同胞，使得德国人非常骄傲。浪漫派所歌颂的中古时代的“德意志民族精神”，近来法兰西压迫者之被逐出，不都是值得骄傲的吗？这一切给历史研究和历史著作以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和爱国主义的倾向，这是必然的。集中世纪德国史料之大成，并为世界各国典范的《日耳曼史料汇编》于 1826 年开始出版。从此德国人就开始成为世界历史学的领袖。以后在许多学科里，德国人都处于领导地位。兰克、达思、奇斯布莱希特、魏兹、德罗生和其他数十人开始专门研究德国史充满着同上世纪世界主义截然不同的爱国主义热忱。此后，欧洲各国的历史研究逐渐走上了民族历史的道路，大大推动了规模宏大的历史资料汇编的出版。

自然，这种民族精神和十九世纪的政治与宪法问题，会把人们对于政治史的兴趣继续维持下去。政治史是最古的，最明显的和最容易写的一种历史。因为君主的政策，他们所发布的法律，和进行的战争，都是最容易叫人记载下来的。国家这样东西，是人类的最伟大的和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人们最值得知道的过去事实，都是同国家的历史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兰克、德罗生、毛兰勃莱克、傅利门等人都把政治史看成是真正的历史。

## 五

我们上面已经讲了从修昔底德到麦考莱和兰克历代历史学家 33 · 33 · 所

接受的影响。他们都主张用忠实的态度、批评的精神来研究历史事件和条件，目的在于使读者得到快乐，或受到教育。但是，这些兴趣没有一个可以说是科学的。在研究过去的历史，以求发现成为政治家或军事家的秘诀，推翻异端的信仰，说明旧教或新教是对的，说明“世界精神”自我实现的阶段，说明自由是从德国森林里面产生出来的，而永远再不回到那里去，在这种种动机下，虽然也做出精深的研究，但这些动机却都不是科学的。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常常变化的历史学开始受到自然科学的支配。它不再满足于在赫利孔山上用笛子和尖锐的七弦琴来歌颂英雄们的和各民族的丰功伟绩，它不敢再把天理掺入人类社会。它开始承认：从事它的事业，在早晨的时候到图书馆里面去搜集资料，校阅不同的抄本，改正它们的异文。不但如此，它竟开始谈到它要把它的乱成一团的史料提高到科学的行列中来。

使历史成为一门科学的新的雄心，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首先，就是人们开始使用批判和怀疑的观点来看待史料。只要历史学家叙述历史事件的目的是在于激起读者的兴趣，或评论历史事件以培养读者的品德或爱国心，或使其继续信仰上帝，那么，是否需要辛勤去考证史实的真实与否，就无关重要。实在说起来，真实的事实难得像“可能发生过的真实”那样有趣味，或那样有教育意义。但是，到了现在，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大部分转向史料的性质、正确性和缺点上面去了。历史学家对他们所根据的材料加以严厉的审查。从前认为可靠的材料，现在却把其中的一部分抛弃了，或者全部抛弃了。同时，细密研究和系统的编目，也提供了许多新材料。

特别是，现代历史学家都清楚地知道：他的一切史料，就其性质而言，都不如自然科学的各个部门的材料那样可靠。因为历史学家对于他所描写的许多现象，几乎是难于有直接的经验。历史学家所知道的历史事实，只能根据当时所遗留下来的不完全的遗迹。如书籍、文件、碑文、残存的建筑物以及其他考古遗迹。书籍里面的事实，历史学家惯于信赖的往往是别人写的报告，并不是写报告者自己的直接经验，而且写报告者并不向我们说明他们自以为是的材料究竟来自何处。上古和中古的一切历史学家和编年史家几乎都是如此。所以向历史学家所提供的一切史料，其中供其推想的奇人异事，不是事实的本身，而只是心理活动的遗迹。有一个法国学者曾说：“我们历史学家好像这样一个化学家：他不得不依靠一个实验室仆人的报告来获得他的实验的知识。”

这些例子是举不胜举的。现在我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吉本对我们说过：“自从公元410年阿拉利克死后，野蛮人凶猛的性格，就体现在埋葬这位英雄上面，他们对于这个英雄的勇敢和命运，很是哀感。他们利用大批俘虏的劳动力，强迫他们来使康山梯阿城外的普山梯努斯河改道。用从罗马弄来的许多掠夺物和战利品装饰起来的王陵，建筑在疏浚干净的河床上面，于是再把河水引回到自然河道，并且把这批造墓的工人统统杀死。这样，埋藏阿拉利克的尸体所在地就永远成为一个不宣的秘密。”这段叙述，是根据同上述事实相隔一百四十年的一位没有学识的约旦尼斯所著的文理不通的《哥特史》。而且我们知道的旦尼斯又是从他同时代人卡西奥

---

西哥特人的领袖，于公元401年，率领西哥特人，入侵意大利，410年攻陷罗马城。412年卒。——译者  
哥特人，约在公元551年根据卡西奥多路斯的《哥特史》，写成《哥特史辑要》一书。——译者

多路斯所写的、现已失传的书上抄袭来的，这就是我们确切知道的关于这段史实的全部情况。

这段事实是，对于在许多教科书里都讲到的一段历史，对它我们该不该相信呢？吉本没有亲眼看到阿拉利克的葬礼。吉本所依据的前书的作者约旦尼斯，也没有看到，就是后于哥特国王阿拉利克死后几十年才出世的卡西奥多路斯也没有亲眼看见。我们能够约束在吉本书中所描述的心理活动，因为他说他的材料是从约旦尼斯书上取得的；但是我们除了约旦尼斯的材料是从卡西奥多路斯书上取得以外，对于那种把实际情况同书本的情形分开的种种心理活动，我们就没有方法加以约束。我们假设阿拉利克已死了，那是除了有约旦尼斯为证外，还可以有别的理由用以断定；至于埋葬阿拉利克的实际情况，我们只能说它或许就同的旦尼斯所描述的那样，但是我们万万没有理由说：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那样。

## 六

科学精神的第二个结果，就是如兰克的豪语所说的，要“据实记事”。在十九世纪中叶，要想做到这一步，还是不能不提出一些理由。因为我们上面曾经说过，先前的历史学家都是抱有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都指望叫历史来支持或至少不是来反对现行的爱国主义和宗教成见。因而历史学家的“据实记事”的有意识的决心，不仅使他的地位，比从前提提高了许多，而且还使他起很大的影响。举例来说，过去五十年对宗教上的大宗现象，由于曾经过真正科学的研究，并且取得了最巨大的研究成果。

但是决意要谨慎地检验史料，同决意要据实纪事，这两件事体，终究只不过是科学化的史学的初步。因为所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证实的人类过去的事实其数量不仅是远远超过我们可以加以简单叙述的范围；而且这些史实的性质异常复杂，人们可以予以形形色色的解释。因此我们不能不问：自然科学对于历史学家在选择事实和解释事实上究竟如何起它的潜在影响？

首先近代科学方法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人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一切科学研究者尽皆他们研究领域不同，但是十分重视小事、常事、和隐事的重大意义，以及排斥神学的、超自然的、和以人类为中心的解釋。这两方面他们都是建立了兄弟般的关系。其次在探讨和多方面应用自然法刚方面已经取得了最乐观的、最意外的结果进行细致和耐心的研究，发现和解释自然法则，这一切都构成近代科学研究上最显著的特点。

历史这样东西，自古以来就是套着假面具，这个假面具，或者用来使它平庸的面貌变得更为迷人，使人认不出来；或者用来把人们熟知的平常事物化为牛鬼蛇神，使人惊惧；所以无怪历史学家们只能慢慢地来使自己适应科学观点。从前的历史学家很少愿意描写人类的常见熟知的情况和日常生活。他们所注意的和记录下来的，就是惊人的，或例外的事物。他们好像一个地质学家，专门研究地震和火山；或者好像一个动物学家，不研究大象以下的小动物，不研究凤凰和蜥蜴以外的奇怪的习性。近代历史的进步，比化学摆脱炼丹术、天文摆脱星占学要迟缓许多。巴克尔的话也许是对的，他说历史

---

意大利人（约480—575年），曾任东哥特王西奥多利克的秘书。著有《哥特史》及《信札》。——译者  
英国历史学家（1821—1862年），著有《文化史》。——译者

学家的知识，大体说来，实在不如其他领域的思想家。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同化学上或地质学上的问题相比，历史学家的任务面前，有着特殊的，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无疑地，历史学家之能够慢慢地摆脱古代谬误的见解，大部分不是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力量，而是取决于自然科学的全面影响，取决于不断出现各种社会科学的特殊影响。

对于选择和解释历史事实起过巨大影响的第一个社会科学，自然是十八世纪时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最早，对于过去的历史，提出一系列的新颖而重要的问题的，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并且对历史学家所没弄清的事物提供了科学解释。

早在 1845 年，卡尔·马克思就曾抨击过那些专门是在天上浮云里，而不是在地球上困苦的日常生活在去发现历史的发祥地的人们。他认为只有从经济上来解释过去，那才是最有力和最有效。他说，社会的历史是取决于社会成员之间生产生活资料和交换工业产品的方法。这种生产和运输的方法，决定了交换的方法，产品的分配，社会阶级的区分，各种阶级之间的关系，国家的存在，国家法律的性质，以及一切人类的制度。

他这种观念究竟怎样发生，他对于这种学说的创造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在这里不必去详细叙述。对于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怎样滥用他的这种学说，我们也没有时间来解释。很多有名望的社会主义者和某些经济学家，都使我相信，每件事物都可以用经济学说加以解释，但是历史学家中同意这种说法的人实在少得几乎没有。不过它的合理部分，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接受过来。这种学说可以用来解释许多过去的现象，比之以前任何一种解释要强得多。总之，不是别人，而是经济学家，他们才开辟了这块有成效的新的研究园地，他们对于历史学家所几乎完全忽略那些持久性的、但并不显明的因素，特别强调其重要性。这样人类生活中那些平常的和普通因素所具有的重要兴趣和重要性，就逐渐清楚了。现在科学的历史学家已经不再是长篇大论地来叙述英雄的、突出的和传奇的故事，而是力图把过去的真相重新得到恢复。这一点是具有极大的意义，因而我们不能不对它稍加说明。

现在还常常有人把历史看成是对于过去事实的记载；读者还是想从历史学家那里听取过去的故事。但是，有觉悟的历史学家都慢慢地开始明白：他不能希望成为一个很好的说故事者，理由很简单，倘若只是把他有充分理由才相信的真实事物来编写历史，那么，他编出来的故事往往都是残缺不全，模糊不清的小说和戏曲这类东西，人们可以很随便地去构思或安排情节来满足艺术上的需求。至于历史学家刚应该常常领悟到他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严厉限制。假使历史学家只是局限于史料上所叙述的确切可靠的事件，那么他的著作往往就会缺少生动活泼、真正可信的情节，因而就不能编成一个动听的故事。

历史学家逐渐明白：他的事业同文学家的事业是不同的，而他的地位却很近科学家。他能运用的只是他的科学的想像力。科学的想像力同文学的想像力很不相同。他的职务在于应用他的研究过去人类事件的技巧，做出成果来使读者全面了解对人类的过去。他把过去的事实记载下来，并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具有戏剧性趣味，而是因为它们可以说明当时使它们产生的一般的和主要的状况。假使要叙述的某些事实是同某种民族或某个个人的习惯和环境有所联系，那么，不管这些事实是怎样干燥无味也得记载下来。假使历史的主要任务是在于说明事物的由来——这一点上面已经大略谈过——那么，形

形形色色的事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就是阐明对一般状况和影响广大人民变革的最重要的史料。关于这一点，历史只能学习其他自然科学所树立的榜样，例如动物学所研究的，不是罕见的和可怕的动物，也不是研究可以启发人类的动物，而是普通的原理；数学家所研究的，不是数的玄妙的性质；天文家也不是借助行星的位置来观察我们的命运。但是科学的真谛，说明它是能够同小说竞争，而且对我们近代人来说，研究从前被认为是最低级和最无味的最普通的东西，却有着无穷尽的兴趣。

因此免不了会有人要想发现历史上的定律，要根据自然科学的所指出的方向去改造历史，使历史成为科学。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巴克尔没有写完的《文化史》。这部书的第一卷于1857年出版。他以为历史材料搜集以后，归拢一起看时，就有“材料丰富洋洋大观之感”，但是历史学家的真正问题，却看不出来，更不要说去解决那些问题了。他说：“尽管人类思想有着多么崇高的目的，史学至今还是贫乏得可怜，它们呈现的外貌，还是杂乱无章，这其实是很自然的现象。人们对历史法则，还是一无所知，甚至于连历史上的许多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他说：“希望写出一部能同其他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相等，或至少亦要相仿的人类史来。关于自然界方面，种种看来是最不规则的和最反复无常的事件，都已做了解释，而且还被证明是符合于某些固定的和根据普遍的法则的，这些工作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是因为那些有能力的人，特别是那些有坚忍不倦思想的人，研究自然界活动，其目的在于要发现它们的规律；因而，假使我们采用同样的研究态度来研究人类的活动，那么，我们当然有权利来指望取得同样的成果。”巴克尔认为要先发现支配人类活动的两种法则：物理法则和心理法则，再去探究这两种法则在全面发展文化过程中的作用。与马克思不同，他认为欧洲的文化是如此发达，物理法则几乎是起不了作用，所以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目的就应该去研究道德法则和知识法则。

巴克尔的书出版以来至今已有五十年了，据我所知的，现在还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敢说我们向着巴克尔所确立的目标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现在有系统地在研究中的各种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已经成功地解释许多事物。但是从天文家、物理家、化学家的观点看来，历史这样东西始终是一种异常不确切、支离破碎的知识。这主要是因为历史所研究的是人，人的迂回曲折的道路，人的经常变迁的欲望；所以现在要想把历史纳入一定的法别的范围，好像是没有希望的。而且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历史的知识必须永远建立在分散各处异常不稳的材料上面，因而历史的真实性我们往往没有法子去检验。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用科学的精神去研究历史，但是我们现在掌握的关于人类过去的材料，尽管可能产生出十分重要的真理，但人们却不能把它们加以组织使之成为真正的科学。

近世历史学家都十分明白历史的材料是靠不住的，而且很不完备的；但是就是有觉悟的历史学家，当他们著书立说的时候，也往往将可疑的不定的事实隐瞒起来。那种要把历史通过文学形式有效地表达出来的要求，驱使们不得不遮盖住他们那种可怜的无知，而且有无视已有裂口的无知深渊倾向。对这已有裂口的深渊，文学家是可以一跳而过的，但是历史学家却不得不悬崖勒马。

巴克尔和特莱柏 这些大胆之徒，竟敢梦想把历史变为真正科学，那是因为他们夸大和弄错了历史知识范围的概念。

五十年以前，人们一般都认为：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有关最古的人类的情景，关于最古人类在新创的地球上的骤然出现以及他们的早期行动，好像已有一种简明的、但却是可靠的记载。到了现在，我们才承认地球上的人类是十分古老。有许多旧石器时代的遗物，我们有理由可以相信它俩是在一二十万年以前制造的；还有许多近来发现的石器残余，它们也许比旧石器还要早一二十万年。这种时期，当然这些都是臆测或印象罢了，——而且如雷·兰开斯特所说：自人类由动物进化到长有巨大的脑袋和熟练的双手，具有长久养成的投掷石块和挥舞木棒的习惯到使用机智，不使用力气来打败外来的袭击，满足自己的天然欲望为止，到了能够制造石器止，不知道曾经经过几千万年。现在还有许多历史学家以为这些事实都与历史无关，而属“史前”范围的。但是“史前”这个字眼却同我们常听见的“亚当以前”这个字眼很相像，非加以排斥不可的。因为这两个字眼表示一种怀疑，即对于在人类的舞台上的脚光未亮、幕帷未开以前，我们所得到的的一种不正轨的资料表示怀疑。我们对于史前时代的确知道得很少，但是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的这个事实的本身，就是历史上的一个最大的发现。在尼罗河流域发现的最古人类文明的较为发达而进步阶段的遗迹，这些遗迹大构属于六千年以前的事。人们却假设这是人类第一次所达到的一个文化阶段，这种想法是十分无理的。

我们假定：在有关过去至少三十万年间人类的事业和进步中间已经有一些东西值得叙述；我们假定我们已经侥幸地仅仅粗略地了解了人类在这三十万年期间所发生的变化梗概。假定可以用一页的篇幅来记载一千年的事情；那么，在这本三百页的小书里面，只用最后六七页就可以来讲那段整个历史时期，因为这个时期的资料（以这词的一般意义来讲）即使是太稀少，太不全备，还是存在一些。或者我们可以把历史比作一个大湖，我们在湖边看混浊的湖底。我们可以把湖深假设为至少有二十五呎、或者是五十呎，或是一百呎。我们可以看清在湖面四五呎的深处有很稀少的生物在活动，再下去六七呎之处，水中的生物固然很多，但是我们已经看不清生物的动作了，因为在三四呎以下的地方，我们已不能看得十分清楚。如果我们说实话，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在水面一时的地方，我们就不能清楚完整地看清有什么东西，——恐怕连在离水面半时多的地方就看不清了。

由此看来，历史学家的眼光不必去回顾地球处于幼年的遥远时代，似乎只要来注意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拉姆西斯二世、提格拉比塞、和所罗门好像是同凯撒、君士坦丁、查里曼、圣路易斯、亨利五世、维多利亚同时代人；培根、牛顿、达尔文好像是同泰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年幼的同时代人的小兄弟。这样看来，那些要想确定人类进化或退化法则的人们，应该搁笔才好。这好像于一周之间，观察一个四十岁的人的行动，就断定他这个人究竟是不是有发展前途，我们所有比较完备的史料都是不超过三千年；而在

---

英国人（1811—1881年），后移居美国，著有《欧洲思想发达史》、《科学与宗教之冲突》诸书。——译者

指人类有文字记录以前的历史时期的初期阶段，当时人类以打制的粗糙的石器作为主要工具。——译者  
基督教的《圣经》以亚当为人类的始祖，——译者



这三千年的史料中间，有二千年还是异常不完备，十分不可靠。关于我们虽有几部异常残缺不全的，带有文学气味希腊、罗马的历史、许多碑文与一些重要的考古残物，但是我们对于许多重大的事情，还是蒙昧无知。罗马帝国史的资料贫乏到以致蒙森不愿意去写罗马帝国史。只是到了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我们中古编年史，才有其他各种文件做补充，使我们比较直接地接触到当时的生活。

但是读历史的人，往往有这种印象，就是以为我们历史的材料，二千年以来数量的多寡和程度的深浅都是相等的。当他看见一本大部头的《古代教会史》，或《罗马帝国史》，或看到达恩写的或霍奇金所写的好几卷《野蛮民族入侵史》，他便以为这些作者，一定是费了多年的苦心孤诣、把他们长年累月搜集来的大量材料，经过删减才写成文章。很少有人知道：从前历史学家的工作，并不是删减材料，相反地，倒是很熟练地把他们的一些浅薄的知识，加以鼓吹，直到把气泡吹得使它的光辉颜色可以吸引最轻率的读者，博得他们的称赞。倘使把霍奇金所著的甚为过时的八卷《意大利及其侵入者》中的贫乏材料，加以压缩，那么大家都可以看出来差不多有一卷书就能够包括这八卷的内容。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历史学家是一个最有罪过的人。第一，我们不该忘记：历史学家根据长期的传统看来，都是文学家，而做文学家终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第二，同其他人一样，历史学家对于他所找到的似是而非的史实，除非这种史实的著述是同其他记载发生矛盾，是看来根本不会有的。否则他就很容易根据表面的价值接受下来。最后，历史学家同其他的人一样，他也是做了尼采所谓的“梦的逻辑”的牺牲。的确，我们不够经常地考虑这种已形成的倾向：即使具有高度文化的人也本能地有牵强附会，以小夸大的习性。拿尼采学说的实例来说，当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们脚底没有我们醒悟时习惯的那种经常有的压力。这样模糊的感觉要求加以解释。用我们的梦来解释，那就是我们在空中飞。不但如此，梦的逻辑还要造出一座大屋，或者山川的风景，让我们在这上面飞行。再则，当我们刚入睡的时候，或者刚醒来的时候，在我们闭着的眼帘上有时往往会感到有一道闪光，我们把它说成是一种很像人的形像，或者是物的形像，如同影片一样清晰。现在我们明白：就是当我们清醒的时候，也有“梦的逻辑”，或所谓心眼的作用，并没离开我们。如同尼采怀疑：梦理和心眼作用以及其他的缺陷都是我们动物祖先遗传性的一部分。无论如何，这种作用都是神经错乱的东西，我们历史学家是本来有他们文学传统的，因而对于这些东西要特别注意。现在有人说，即使是自然科学家也往往心眼开得很大，不过他决不会像历史学家那样容易被“梦的逻辑”引入歧途。这并不一定是自然科学家自制的的能力比较高超；而是因为自然科学家们的工作比较简单，他们的知识比较容易明了。如同前面所指出的，我们研究过去历史的人，必须要懂得：历史决不能同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者人类学一样，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因为人类历史的现象是异常复杂，我们没有办法去直接观察它们，更不必说我们对于史事来做人为的分析和试验，对于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大部分历史根本

---

德国历史学家（1817—1903年），著有《罗马史》等书。——译者

英国历史学家（1831—1913年），著有《意大利及其入侵者》六册。——译者

德国哲学家（1854—1900年）。——译者

不知道，而只是自从印刷术发明以后，我们的历史材料才算丰富起来了。假使那些受过自然科学教育的著作家、要想教我们历史学家怎样去利用历史的材料，那么，他们就太不懂得历史学家进行研究工作所处的境遇和条件了。

## 七

但是要想使历史学成为科学性的，首先要使它成为历史性历史。很奇怪的是，我们现在认为有真正历史价值的东西，在十九世纪以前的历史学家几乎都不知道。他们所叙述的过去事实，以为都是可以激起读者的兴趣，他们所批评的历史事实，都是以教训读者为目的。他们有时也不辞辛劳地去找出历史的事实真相。关于这一点，他们总算是科学的，虽然他们的目的还主要是文学的、道德的、或者宗教的。但是他们一般地还是不想去判断历史事实的所以然——*Wie es eigentlich geworden*。历史这种东西，二三千年来，主要还是过去事实的记载。这个定义现在还是可以满足一般没有思想的人。但是据实记载过去的事实是一件事，而要想确定过去事实的所以然，则是另外一件事。

关于产生这种历史兴趣的原因及其逐步的演变，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地来谈。这种兴趣还具有它的力量，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近世人已经清楚领悟到人类变化的实现和不可避免性，反映这种变化的实例，层出不穷地来迫使我们注意。希腊的历史学家叙述历史的时候，很少有或根本没有背景。所以修昔底德把前一代的一切史料，当作只是极不可靠的传说来扬弃。波里比乌斯虽然曾专心去研究罗马领土的逐渐扩充的情况，但是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说明他对历史的持续性有明确的概念。在中世纪时代，无疑曾经有过这样的概念，即以为人们把地球看成是一个演出神剧的大舞台。这出戏的结局，就是判明善恶，区别良莠。但是这种超自然的历史的统一性都是神学的，而不是科学的。关于世俗的事情，中古时代的人几乎都不懂得所谓“时间上的混乱”，所以文艺复兴时代画家，居然会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像画在他幼年时代的马槽上，而当时的人还以为这并没有什么不相称的地方。

一直到十八世纪的时候，人类有可能无限进步的这些话才成为某些改革家所津津乐道的东西，而这些改革家在过去都以“昔日的黄金时代”为名来攻击当时弊端的人，所以人们必须是在将来的事物中，而不是在过去的事物中；必须是在进步的事物中，而不是在反动的事物中去找改革；这种创见要比任何发见更为重大，更为重要。人们开始日益明白，世界的确是在变化中。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有思想的历史学家开始接受历史持续性的理论，开始改变历史的目的和方法。这一切都是以前所未有的事情。

历史持续性的理论，原来是建立在下列事实上。——那就是一切的人类制度，一切的公认的思想，一切的重要的发明，都是长期发展的总和。只要我们有耐心，有方法，都可以追溯得很远。如陪审官制度、戏剧、格林机关枪、罗马教皇权、S 这个字母，支持判例的原则，这些现有的形式，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追溯它们的来源。没有什么人类利益是孤立于无数与之同时共存的利益以及一定的环境之外的。因此这就使得历史持续性的概念，具

---

美国人加特林于 1861 年所发明。——译者

这个原则创自罗马法，——译者

有更为广阔的意义，这是由于人类的活动是很错综复杂的缘故。在一种制度或一种习惯里面，是可能发生突变的，但是发生全面的突变，那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一个人因为环境的变迁，或因为穷困破产，或者因为病情恶化，可能很快地根本改变其形态。但是即使是这种情况，也还是很少见的。假使把所有个人的习惯和利害结合起来看，人们就可以发见：只有在最特殊的情况下，个人的许多习惯和利害，才能在霎瞬之间发生突变。但是社会这样东西，由于许多特殊的原因，它要比个人保守得多，所以历史的持续性，是科学的真理，——这一点也不能太强调。——追溯变迁的缓慢的过程，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最耐人寻味的问题。正是由于发见和应用了这个法则，这才使得历史有别于文学和伦理学，这才在某一种意义上来看，它把历史提高到科学的地位。

## 八

历史严格化的后果，就使得历史的专业化迅速发展起来，这就给学历史的人提出一个新的根本问题。假使各种学问都变成为历史性的学问，那么普通的历史还有什么必要呢？假使政治、战争、美术、法律、宗教、科学、文学都做历史的研究，那么历史本身就要四分五裂，成为有机因素了么？剑桥大学西莱教授认为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二十年前他曾经宣称：历史这样东西，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一种残余物，这种残余物就是一批又一批的历史事实，为某些其他科学拿走之后留下的东西，而且现存的这些残余物，将来一定会遭到与其他事实相同的命运，并且不久就要有一种科学来把现在还掌握在历史学家手中无可争辩的财产全部拿走”。

现在我要谈一谈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历史在取得了全世界的地盘以后，它是不是必然要丧失它自己的灵魂？我们可以假定，历史的专业化工作已经完成得很完备，有关人类过去的各个方面、各种制度、感情、概念、发现、成就或失败，已经都根据科学分门别类，并经过各种科学在各种学科中进行历史研究以后，各得其所了。进行历史专业化的过程，其目的在于要在许多方面来改正历史，来扩大和加深历史的作用。人类的种种事务和种种变化，不会因为写出了许多有关某个社会的教会组织或军事组织、立法程序、农业制度、美术、家庭习惯、高等教育的观点的专门论文后，历史研究就此枯竭。相反地倒会清晰地阐明历史的绝对必然性。有许多重大的事实，当人们要想把它们纳入一种纯粹的科学时，往往显得异常生硬。物理的、道德的和知识的想像，在人类活动和变化过程中，是奥妙地相互制约的。这就是历史学家应该去研究和描写的东西。

人类这样东西，绝不是科学地分门别类的总和。水是由氢和氧组成的，但是水既不像氢，也不像氧。假使要把人类的素质用科学方法分成宗教的、美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知识的和好战的，那就太牵强了。对这些素质固然可以进行分类的研究，而且很有裨益，但是假使没有人去研究它们的整体，那么分类的研究，一定要产生极荒谬的结果。那些研究整体过程的人，就是历史学家。假使一切社会科学家都各自去专心研究十字军、宗教改革、或法国革命；他们的研究完成以后，历史学家岂不是还要利用他们研究的成果，

增添他们所略去的东西，改正他们由于对全面情况的无知而导致谬误，把历史重述一遍么？

乍看起来，好像只有那些最熟悉本门研究——如宪法、植物、神学、语言学、绘画、化学、经济学、医学——的人，才有资格去研究各种专门史。但是科学家往往有两个缺点。第一：因为他们只是熟悉他们本门业务的原理，所以他们对于那些超出他所熟知概念外的远古的和不熟悉的情况，就很难进行思考。第二，发现、利用和解释历史材料，似乎有一个长期而且特别的训练，而这种训练，只有专门的历史学者才能具有。历史学家恰常常惊奇地发现许多没有研究历史经验的人发表某种荒谬见解，尽管他们对于自己本行业务很有研究，但是他在进行历史研究，则往往要犯历史学家所不会犯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到如今我们还没有一部令人满意的自然科学史或某种科学的历史，此外，人类思想和事业的某些重要问题，对专门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是不会有特别的困难的。他们掌握的科学细节足以来进行研究。实在说来，即使是近世科学中最奥妙的科学，包括数学在内，在二百年以前都是异常简单，对于对人类某种利害抱有兴味的历史学者说来，是可以追溯出这门科学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因此，历史学者将来会越来越专业化，而且还可以补充当时各种科学家的不足。关于这一点，我想在那《思想史的回顾》一章里加以详述。

我已经明白地指出历史学家的无知。历史学家自己也已经承认，而且尽力去用科学方法来补救他的缺点。而且历史学家同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也想将他们的事业追溯到古代去。我相信：历史学家将来会对解释现状越发感到兴趣。幸而这最近二三百年来，历史的材料，比之早期的世界史的全部史料丰富得多。历史学家现在正在对这些史料进行鉴别和分类的工作，使之可以供人应用。这五十年来，这些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使得普通的人看到会感到惊异。

我们现在已经把问题的关键找到了。我们已经用历史来解释历史了。从狭义的科学观点看来，历史学家的地位比文学家要稍高一些，但他比天文学家或生物学家则低得很多。但是历史学家不必同文学方面的各种联系断绝，因为文学方面的联系是异常可尊的。不过历史学家今后不但应该研究事实的“当然”，还应该研究它的“所以然”。历史学家始终是社会科学的批评家和带路人，他应该将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用过去人类的实际生活来加以检验。历史学家的事业是如此迷人，是如此错综，以致它无疑会使历史学家逐步地专心致志于历史研究，并与文学脱离关系。因为历史学家现在已经越来越明白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理想，比之诗人或戏剧家要崇高得多，更能令人感悟，而这个理想却要求历史学家具有日益提高的想像力和表达力。

### 第三章 史学的新同盟军

—

我们都知道历史时常需要重新编写。这是因为什么呢，人类的过去，在一般人想来，好像已经完结了，固定了。那是神学家也不敢说，万能的造物主有力量去改变它。那么，为什么历史学家不去利用他手边所有的材料，一劳永逸地写成一部固定的历史呢？历史学家回答说：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于过去的知识，常常有所增加，从前的错误常常有所发现；所以我们应该用比较完好的、比较正确的历史，来代替已经陈旧的历史。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但是即使各代的历史学家，都能够后来居上，改正从前历史学家的错误，那就算尽了他们的能事了么？难道他们在选择材料和判断材料上就没有陈陈相因的危险么？难道现在的历史学家都没能及时地迅速地使自己适应最近三十年来所积累起来大量新知识么？他们能够跟上现代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态度的根本变化么？

历史学者所接受的一般训练往往给他留有这样的印象：历史是固定的，可以作出结论的，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他知道：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人劳心苦思地想确立起历史的真理；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著作是很多的；许多历史学家想竭力保护历史的领域，深怕为其他学科所侵占。他们认为一切历史著作的总的精神和总的內容都是十分一致的，于是他们就以为历史的材料是非常系统完整的，只要运用一套明确的方法就可以进行研究。我认为这种态度是非常错误的，它足以阻碍历史研究的正确发展。现在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历史”两字的意义是什么。

第一，历史本身就有一段漫长而变化多端的历史。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简单地谈过。历史的内容、目的和方法，自古以来一直是不断地变化着。一旦我们能找出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我们就可以推知历史这门学问未来的辞多可能性。我们知道，历史总是勉强地，而且只是局部地使自己来适应各个时代的一般看法。它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着。

第二，现在有一些自称为历史学家的人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已经如此的广阔，以致无法把历史归入一定的范围之内。举例来说，历史学家可以像吉本那样，喜欢采用普洛柯比俄斯所著的关于阿拉利克的未必会有的故事情节来使历史带有一种“像是会有”的气氛。他们也可以去研究古代希腊虐疾的流行，或去研究小亚细亚克利萨斯时代以来，小亚细亚的空气湿度有否变化，或者去研究法国革命的时候发行四千万法郎钞票所起的影响。关于研究历史的方法，我们只有经过一种特别的训练，才能判断古代石器同普通未经人们加工的火石间的区别，或者才能去校订罗杰尔·培根所写的《光学》那部书。人们要是想研究路德解释“篇信上帝”四字的解释是否是独创，就要研究俾斯麦对于老年和残废者的保护需要不同的酬练。所以我认为，如果人们要想安静地使脑筋得到休息，那倒不如不去给历史下定义。那倒不如来承认：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研究他所认为是有趣的和重要的，并且现已掌握许多史料的、人类过去所发生过的任何事情。

而且历史能否进步同能否有用，都取决于历史是否能够克制它自己，不要企图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同时也是去抵抗其他学科的侵犯，这些科学时常会出现在它的周围。假使历史企图这样作，那他就会误解近世科学发展的

情况。因为科学研究工作者是不能要求独占一个即使是很小的科学范围的。说实在的，再没有比成功地抗拒这种要求更使他们致于死命了。人类各种学问的范围本来是临时的、无定的、常常变化的。各种学问的界线是互相交错。因为真正人类和人类所处的真正宇宙的内容是如此复杂，以致即使有忍耐性情、思想精细的德国人，也不能满意地而且永久地确定起一系列自然现象——语言、思想、事业、力量、动物、植物、星星等的精理。一切的科学都是永远互相依赖的。每一门科学的生命都是从其他科学中吸取来的；而且它所取得的进步绝大可能性也都是有意地或无意地靠着其他科学的帮助。

肯波教授对于他自己所研究的地质学，曾怀着感激的心情说道：“假使地质学没有别的科学的帮助，它就不会成熟。”他又说：“我们假使没有物理学、机械学、天文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的帮助，我们就不能了解这个巨大的包罗万象的世界的整体。”不但地质学的早期发展是“以其他兄弟科学为根据的；而且现在它同这些科学同时进步，依靠它们的帮助。同时，地质学反过来也对于其他科学，做出一些贡献”。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研究也应该抱着同样的态度。假使历史学家要发展到最高的程度，它就不能不放弃个人主义的倾向，而且要承认：历史只是研究人类的方法中的一种。历史这门学问必须要承认：它同生物学、地质学以及其他科学一样，它的发展是以其他兄弟科学作根据的，它只有同它们一起取得发展后，它才能反过来在帮助人们了解人类过去做出一点贡献。不管是什么历史，它总是研究人类。这样看来，假使历史学家忽视他人使用异于历史学家传统的方法来研究人类，而得出种种发明，那他们岂不是成了天下最愚蠢、最傲慢的人了吗？

为了明白历史学家当前所处的境地，我们要追溯到历史学第一次受到近代科学精神的影响的十九世纪中叶去。我们都知道，以前的历史是文学的一部分，它的目的显然是文学的，也就是说，它还没有被利用来为宗教学说服务，或还没有被利用来激起爱国主义的自尊心和竞争心。但是到了六十年前，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历史学家往往引以自豪。这些成就，照我看来，共有四种。这四点成就的取得都应归功于自然科学的影响。第一，历史学家批评历史的材料比从前严格得多，部分地或全部地推翻了许多先前历史学家所盲目信任的史料。第二，历史学家有决心要直言无隐，不怕伤人感情。第三，历史学家开始知道历史上不突出的、普通的和常是隐晦的因素的重要性，注意平凡的、常见的和普通的事情；而不去注意那些罕见的、特别的和传奇式的事情。第四，历史学家开始轻视先前历史哲学家那种神学的、超自然的或以人类为中心老一套的解释。对于这四种成就，我不想详细说明了。因为没有人再会来怀疑它们的根本性质。它们是多年研究的成果，也是带动历史发展的先驱。但是，这四种成就仅仅就是带动历史发展的先驱吗？如果对它们加以考察，那它们的性质会不会被证明是消极的呢？决心把尽力考证出来的事实真相说出来，宁可考虑正规的、平常的事情，不去考虑那些突出的、骇人听闻的事情，抛弃向上帝和魔鬼去寻找历史解释，这一切都仅仅是给重新编写历史做的准备工作，它们所提供的只是编写历史的必要的条件，而不是开展历史研究的计划。而且这一切决不是必要条件的全部。历史学家们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准备工作，然后才能有希望理解过去的历史。

托马斯教授曾说得好：“自从人们广泛地接受了关于生命和世界的进化的观点以来，这就使得心理学、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和所有关于

人类的科学受到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对于生活中的某种状况决不能单凭它的眼前的现状就可以完全了解。无论对哪种东西，应该看作它是有它的来源和发展的，我们不能忽视它的发生和发展的阶段。举例来说，现在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并不是仅仅去研究成人的脑子，要想明白人类大脑的活动和构造，他们还要观察儿童的心理活动和儿童大脑的构造，来补充他们的研究。他们还要从这个问题的现状作进一步的研究。他们进而要研究猴、狗、鼠、鱼、蛙等的心理和脑子，研究一切有神经系统的生物，甚至于研究只有单细胞动物的心理和脑子。他们进行这些研究就有可能对于大脑构造和心理作用得到启发。他们要从最下等动物的脑子研究到最高等动物，从最简单的脑子研究到最复杂的脑子，逐一地注意它们的构造和功能的不同，从而才能弄清楚最复杂的人的脑子、弄清楚人；至少有弄清楚这些问题的可能。”

按理说，历史学家应该首先发现这种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的理论。但是奇怪的是，历史学家不但不是第一个理解到历史观点的重要性，反而让动物学家、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去发现。更糟的是，我们可以说：虽然自然科学家已经充分发展这个创见，但是历史学家却至今还是偶然地加以利用。因而历史学家至今还不能像比较解剖学和社会心理学那样有严格的“历史性”。即使在现在，许多历史著作在叙述事件和情况时，作者还没有明白：一切事物都是有其来源和发展过程的；不明白它们的发生和发展阶段，不明白“生活中的某种状况是决不能单凭它的现状就可完全了解的”。历史学家当然也常常谈到帝国的兴亡和制度的盛衰；而且近来他们很注意各种制度的发展情况，但是他们的采用事物发展的观点的范围就仅限于此。因而他们的历史著作还是不能摆脱具有长期传统的、即我们所谓历史片断的叙述方法。他们仍旧还是徒劳无功地去描写事实，而不知道事实的“所以然”。举例来说，现在大家之所以不能了解法国革命，就是因为历史学家急于要叙述 1789 年以后发生的巨大事件，不是依据前事来进行解释，他们对于以前的事情只是用导言的篇章做一般性的解释，当然这样还是不能给读者提供充分的线索来理解以后发生的事情。又如“文艺复兴”所以一直为人所曲解，就是因为博哈德和西蒙兹对于“文艺复兴”以前的时代的无知。又如中世纪时代的文化对于那些没有精心研究第四世纪文化的人来说，至今还是一个谜。

现在历史学家的处境还是像一个人睡在一张别人的床上忽然醒来那样，他只有仔细考察房中的家具，才有希望弄清他的处境。这种令人奇怪的处境只有通过回想过去才可弄清楚，也只有通过回想过去才可理解。这种情况很像一个人从芝加哥出发，他的目的地是旧金山，中途要耽搁一下，不能不在沃格登过夜。例如，假使历史学家给读者详尽地描述 1692 年萨勒姆村的情况，告诉我们说那个被称为好好先生的主教的地窖在甚么地方；那个致人死命的木偶是在哪里找出来的；并向我们指出尼希米修道院长的公牛是在甚么地方因为被萝卜梗住而突然死去的，那么，我们还是不能领会新英格兰所发生那个可悲痛的事件。因为真正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好好的祖先为什么因为所谓的老妇同鬼打交道就要绞死她们？这个问题只要稍微具有宗教和教会史对比的知识，就可弄清楚。宗教改革家并没有去废除或削弱卡登·马瑟的迷信观念。即使我们对于卡登·马瑟所处环境进行了极精密的研究，我们对

---

十七世纪末年，英美诸国，巫术迷信颇为盛行。1692 年前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村中有老妇被控行巫术，审官肆行拷问，牵连甚多。因被指控行妖惑之罪，无辜而被绞死者凡十九人。——译者

他还是不能了解的。

近代历史学者往往向专业发展的趋向，他们希望专长某个领域。其实，这种现象往往会阻碍他们去真正了解他们认为似乎是最了解的东西。最优秀的历史著作（这种书是很少有的）同平常的历史著作的差别，就在于作者具有历史的眼光。历史眼光这个问题将来一定会大大地发展起来，因为一切历史著作，若要成为建设性的和教育性的历史著作，并且不仅局限于历史原材料的收集，那么，都应该把历史眼光贯注于整个著作之中。

历史学从其他不同领域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方面得来的好处决不止于历史眼光。此外，还有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发现的两件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这两件事实，没有一件可以归功于历史学家的。

一件就是动物学家证明：人类是从低级动物变来的。另一件就是英国的一个地质学家第一回清晰地很有条理地证明：人类往在地球上决不止六千年，而是至少有六十万年的历史，但是历史学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观点则都是妨碍他们去发现这些学说。历史学家为了替自己辩解为什么自己不能作出这些发现，说成是他们完全不熟悉那些被用来证实人类自动物变来和人类有悠古历史等事的材料。即使他们的托辞是对的，那我们可以质问他们究竟有没有严肃地考虑过达尔文、来尔 两人所发现的两个重要学说呢？实际上他们并不急于考虑这些学说。这两个学说对于上一代的历史学家来说，都是很生疏的东西；在历史学家兰克和班克洛夫特看来，这些学说同他们的工作是毫不相关的。即使在今天，还有一些历史学家仍旧怀疑人类从低极动物变来的说法，认为这并不是历史事实，尽管他们承认亨利二世是征服者威廉一世的后裔这个历史的事实。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现在大多数历史学家坦率地说：人类起源和人类具有很古的历史两种学说，同他们所研究的问题，看不出有什么明显关系。他们这话说得很对，大部分的历史研究工作是可以不必去管人类的起源的。假使他们去研究公元 887 年 7 月 1 日这一天，胖子查理究竟是在英格兰，还是在卢斯特瑙时，那么，查理国王的祖先究竟是或在凉风的黄昏和上帝对话，还或是爬在地上，或是睡在树上，就无关紧要了。假使他们要断定在俄亥俄河上的法国堡垒究竟是在甚么地方，或者去描述玛利·安东奈特所以厌恶米拉波的原因，那么，他们当然可以不管在海德耳堡挖掘出来的古代人类的颞骨。整个历史研究的进行不但可以不管人类的起源，就是不懂得人类是什么东西也不要紧。但是，在许多重要的研究领域内研究工作者都必须要知道关于人类的一切发现，否则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陷入学问肤浅、结论谬误的泥淖。

## 二

由此看来，历史学家虽然在那里尽心竭力地想使历史成为科学，但是他们却仍旧让自然科学家去说明历史眼光的优越性，让他们去发现两种关于人类的学说；这些学说比奇塞布勒希特、韦兹、马丁或霍奇金等人的一切学说要更具有革命性。现在，研究历史的人显然不但应该尽快地使自己来适应总的学术情况中的这些因素，而且还应该对于各种关于人类的新科学表示他们



的态度。这些新科学，因为自由地运用了演化的理论，进步异常迅速，改正了许多为大家所接受的那些历史学家所做的结论，并且澄清了许多自古相传的谬论。所谓关于人类的新科学，我所指的首先是广义的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和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对于历史已经发生很大影响。关于社会学，在我看来，它的价值在于它的观点，而不在于关于人类的新发现。这些新的社会科学，都有人在做专门的研究，他们已经使历史学家惯用的许多名词的意义全部改变了，如“种族”、“宗教”、“进步”、“古代人”、“文化”、“人类的天性”等等。他们推翻了历史学家的旧说，解释了许多历史学家使用自己的方法再不能解释的历史现象。下面就开始来讲一讲史前考古学。

保守的历史学家也许会立刻起来反对说：尽管未有记载以前的人类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因缺乏文献记载，我们对它却一无所知。他们说，考古学虽然发现了几件比从埃及陵墓中发现的还要古老的人类手制器具和人类的头盖骨，甚至全副骨骼，而且熟悉史实的人都不怀疑，在埃及文化未发达以前，人类在世界上已经生活了千万年。但是我们除了知道古代人类颞骨的形状和他们石器、骨器的性质以外，我们对于古代人类还知道些什么呢？假使我们认为我们对戴克里先和克劳维斯时代还知道的不多，那么，要想推想穴居野处时代人类的生活习惯，岂不荒唐？

若说我们对古代穴居人类的家庭生活至今还是毫无所知，那当然是事实，并且恐怕还不会有明白的一天。但是关于最早的铭文出现以前，人类历史的材料，却已积累了不少。人们所以不知道它们的重要性也许就是被“史前”这个不幸的名词所误。历史学家走马看花似地看了一盒又一盒的石器、拳斧、箭头、刮刀，画在骨头上的图画，以及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铜器等，觉得可厌；他们以为这些东西最多不过可以证明从前有一种野蛮的人类，同现在的蛮族差不多，那就完了。但是，假使他们去仔细想一想，他们就会知道“历史”和“史前”的区分，实在是一种武断的区分。所谓“有史以前”，原来的意思就是指摩西和荷马的作品没有出现以前人类的历史，人类最早遗留下来的东西。

但是，历史这样东西，就其最全面的意义说来，应该包括所有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人类过去一切事情，不管我们所运用原始材料是怎样性质。史前史学者所占有的考古资料不仅在可靠性上有时要远胜于文献记载，就是在碑文和书籍出现以后，它仍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现在我们把那些许多不见于书本或碑文记载的材料认为是史料。比如古代人类最早所用的完善的手工工具、石斧，在南部欧洲、非洲、印度、日本、北美洲都被使用，这并不是一件“有史以前”的事实，而是一件“历史事实”。这和凯撒在月圆的时候渡过英国海峡那件事是同样性质的历史事实，而且更加重要。

假使研究历史的人们还是对古生物学漠不关心的话，那么，请他们去想一想下面这件事情（因为这样的假设是没有危险的）：假使最古的拳斧是由

---

罗马皇帝（在位年代，284—305年）。——译者

中世纪初期法兰克国王（在位年代，481—511年）。——译者

《圣经》中的犹太领袖，相传他率族人离开埃及返回犹太，于西奈山上，受耶和华之十诫，创立犹太教。  
——译者

凯撒第一次渡海为公元前55年8月25日。——译者

二十万年以前人类所制造的,那么,我们所谓五千年至七千年的“历史时代”,只不过是人类慢慢地建立现代文化基础这段时间的三十或四十分之一。但是,相对地来说,拳斧是一种很完全的工具,而且散布于地球的各个地区。所以它可以反映出从不能说话、不能制造工具的人类祖先到能够制造石斧的人类,这中间不知道经历过多少年代的进步。照这样看来,假如研究历史的人忽视原人学,他们就有对人类近代变化全部情况没有它的背景的危险。从前阿修大主教曾认为所有人类和陆地的动物,都是在纪元前4004年10月28日星期五那一天创造的。这种说法引起了我们和“古代人”的关系的许多肤浅谈论,实则这些“古代人”实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我们似乎可以有这种看法:在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现在这个短时间内,人类的思想能力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实在说起来,假使我们能够让一伙公元前五世纪时候出身于雅典上流家庭的婴儿,同一伙现在出身于最有知识阶级中的婴儿,完全同文明隔离,由狼喂他们乳,由乌鸦喂食,那么,这两伙孩子就会陷入野蛮状态,就要同猩猩差不多。没有人能知道他们中间究竟要经过多少时间才能不断产生才能出众的人来作句子,发明火,或把一块燧石块造成拳斧,而且我们也没有理由可以想见这两伙人中间谁会比谁最先取得进步方面具有优势。因而只有教育和社会的环境才能够把我们最文明的人同地球上的最野蛮的人分开。

对于“种族”这个名词,历史学家过去是,现在还是十分随便地使用。以前关于“种族”和人类起源于亚洲西部的许多学说,大部分是从《创世纪》中关于伊甸园、洪水神话的记载,和关于建造巴别通天塔时,上帝混乱各地人的语言,使他们彼此言需不通的故事,或无意中得到暗示,或有意识地得到启发的。例如,蒙森在《罗马史》第一章中所提出的、关于阿利安人种的学说,现在看起来,几乎是同《圣经》中建造通天塔的那种说法一样幼稚可笑。自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的那个地质时代以来,水陆的分布、气候和动物的分布一直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外界环境的自然变化,当然会引起人类各种移动和融合的种种情况;此外,还会产生征服、侵犯、奴役和杂乱的性关系。这样就将各种不同的人群混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十分复杂混乱的道德、习惯和语言。尽管如此,历史学家还是常常谈到“人种”这个名词,好像我们仍旧可以相信麦克斯·缪勒所编造的伊朗高原和阿利安人种散布的那个故事。上述的一切情况是足以具体地说明史前考古学对于一切历史学家的重要性,因为假使他们无视史前考古学的成果,那么,他们就有沿袭自古相传的谬误说法的危险。但是,为了要了解在高度发展的文明社会的状况,我们所能利用的资料并不限于过去人类的遗迹和人类的手工制品。威廉·渴麦斯教授说得好:“现在的部落社会实际是一种未发达的文明;现代的野蛮人就是我们同时代的祖先。”那么,那些研究工作者——即是人类学家——那些研究现在野蛮人的习惯、风俗、制度、语言和信仰的人们,将会作出最大的贡献帮助人们真正了解历史。从人类发展观点来看,人类学可以被看作是历史的一部分,正好像动物心理学和比较解剖学是人类心理学和人类解剖

---

爱尔兰人(1581—1656年)。——译者

《旧约·创世纪》中谓最古的时候,“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以后在巴比伦首都巴别地方建造通天塔时,上帝变乱了人们的语言,使各地语言彼此不通。——译者

德国语言学家(1823—1900年)。——译者

学的一部分一样。

我们至少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已经承认这个真理。爱德华·梅尔教授[德国著名古代史家]在他那部增订再版的《古代史》里，用了二百五十页篇幅来讲“人类学原理”。他说：“我的著作前面，作了这样一篇导言，这在从前恐怕就会引起人家的惊奇，而且还会遭到许多人的批评，因为当时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完全不注意这些问题。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没有声明的必要了。……其实，对于一部科学性的内容正确的古代史来说，这篇导言是绝对必要的。”

但是，现在有许多历史学者还不明白人类学对于他们可提供的帮助。这一则是因为他们对于人类发展的全部问题，本来就漠不关心；二则是因为他们多少怀有合理的怀疑心理，他们怀疑如果按照我们企图用人类学上的原理和讲解未解释过去的事实和状况，恐怕会有误入歧途的危险。

但是，由于我们愚蠢而不知某种工具的用途而就加以排斥，这是一回事；我们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而不让这种工具来伤害我们，则是另一回事。但是，即使是最顽固和自满的历史学家，除非他穿上了上帝的胄甲来保卫历史的疆界，也一定会肯定研究人类学的价值。因为人类学可以增加我们的知敲，提高我们的见解，尤其是在对一切有关宗教、宗教习惯或保守精神的潜势力等问题，特别有帮助，这也就是历史学家所常常遇到的问题。在近代科学里面，再也没有一门科学像比较宗教学那样将陈腐的历史观念彻底推翻掉。因为这种科学所用的材料和方法，是半历史学的和半人类学的。从前的历史学家对于宗教上的现象往往不能深入本质，以为那些现象是自然而然的，它的起源也是不足为奇的。他们不知道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宗教是最容易说明的一个方面。人们不仅把产生正宗派基督教的混合主义弄明白了，而且还把掺进在基督教初期教父们的神学中那些很古的和很原始的迷信也弄明白了。

圣·柴尔曼博物馆馆长苏罗阴·莱那契先生曾对我说：几年前，当蒙森来博物馆参观收藏品时，他还没有听到过‘冰川期’这个名词，也没有听到过‘图腾崇拜’这个名词。蒙森以为这些名词都是这个馆长编造出来的。现在我们都知道蒙森是近代一个卓越的历史学家。我们大家对他的著作数量之多，质量之精，是很熟悉的。由于他对史前考古学和人类学的两件最普通的事情一无所知，这就阻碍他不能用正确的眼光去观察罗马的文明，阻碍他不能完全领会罗马的宗教现象，甚至它的法律现象。正如亨利·亚当斯曾经恰当地说过：“人类在长期的冰河时代，好像一个‘函数’”。至于图腾制度则被用来解释这些现象：如马达兰尼时代 黑暗山洞里的壁画、犹太人对猪肉的嫌恶，垒球队的尊重‘福星’。现在基督教教会的许多信仰和习惯，也可以直接地或迂迴地追溯到图腾制度、万物有灵说和神赐的食粮等信仰。

历史学者明白了这些道理，假使还没有照着这样去做，那么，就应该快去读读人类学和比较宗教学方面的富有启示性的著作。下列各书都是这方面的名著：汤麦斯编辑的《社会起源资料选辑》、已经去世的森本纳教授所写的《社会传统》、苏罗门·莱那契所写的《奥非乌斯》，康尼皮尔所写的《神话、魔术和道德》和德·摩尔根所写的《初期文明》。如他读了以上各书，还不能改变他的历史观念，那他真是鲁笨的人了。

---

根据地质学家之计算研究，地球曾经过四次冰川期。——译者

此期是旧石器时代之最后期（约在纪元前 35000—15000 年）。——译者

因此，关于我们同所谓“古代人”的关系、一般宗教和基督教、以及“种族”等问题的陈旧观念，经过现代学者的研究，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这些学者一般不被看作历史学家。这些科学家们指出了旧日历史学家的推理的肤浅，并且还指出了一种新的、较为正确的方法去解释过去的事实和状况。有些历史学家对于“进步”、“衰退”、“人类的天性”、“历史的连续性”和“文化”等名词并没有充分了解而胡乱使用。假使他们稍有一点“人类学”的知识，再懂得一些“社会心理学”、“动物心理学”等新科学的原理，那么在使用这类名词时，就可以有较深刻的了解而纠正过去的错误。

社会心理学现在虽然还刚刚开始创立，但是它是建立在这个信念的基础上，那就是我们因为同他人有着联系，所以才有自我。“自我”是社会的产物。如果没有他人，我们就没有“自我”。米特教授说过：“不管唯我论在形而上学上是否能存在，但在心理学上它是存在的。假使要有自我，那么一定要有他人。进行心理学的分析，对于往事的追忆，对于儿童与野蛮人心理的研究，都表明‘自我’只能作为与其他的许多‘自我’的对立物时，才能为人所意识到。”

乍看起来，关于自我的来源及其对于社会的依赖性等问题，同萨尔贡在位的年代、文艺复兴的意义、或拿破仑征服英国的可能性的看法等问题好像是离得太远。但是，历史学家对于许多更加重要的事件的看法，如果他们对人类模仿的规律和我们从原始的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本能稍加研究，那么，他们的见解就会有大的改变。这门学问和泰德教授的名字分不开的。实在说来，假使没有社会心理学，我们就决不能理解人类如何学习和传播它的发现和误解。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有别于类人猿生活的人类文明的全部理论。如果没有动物心理学，我们就不可能理解社会心理学。只有对这些学问进行研究，才能说明那些历史学家必须加注意的“进步”、“退化”的问题。在这样一篇小文章里要说明这个复杂的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想在下面做些简单的介绍。

第一，我们对于种种事物的看法，如今岂不是心甘情愿地在做“以人类为中心”那种陈旧观念的牺牲品么？由于西方人士长期持有这种观念，他们根本不管近六十年来种种发明，过去传下来的许多未曾改正的观念至今还潜伏在我们的见解之中。我担心，我们经常会忘记：人类男女并不像马克·霍浦金和他同时代的人所普遍相信的那样，是上帝在一天之内就造成的。人类是从不会说话和不会耕田的动物进化来的；并不是出世之初，就有纯洁的崇高的抱负、很发达的语言和农业的知识。所有古代有过的同现在还有的动物，人类也包括在内，“恐怕由于远近血缘的关系而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的血统不止儿百代，实在可以追溯到自从地球上人类以来所有地质学上的年代。人和类人猿身体相同之处，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讨论的题目。二千年前，罗马埃尼乌斯曾经发生过这样问题：“我们的祖先同猿何以这样的相

---

约于公元前 2369—2314 年为古代两河流域阿卡德国王。——译者

美国人（1802—1887 年）。——译者

罗马诗人（公元前 239—169 年）。——译者

似？”随着近代动物学和比较解剖学的发展，人类和动物在身体构造上相同的地方愈加显明了。达尔文曾经将人类全身有毛的祖先描绘成这样一个肖像：有尾巴、有可以握东西的脚，长着像犬的大牙。这个假设由于在人身上还发现某些退化筋肉和器官、祖型再现现象和病理学上的状况而得到证实，因为这种情况只有进化的学说才可加以说明。我们的身体和身体的作用，同高级动物既如此相似，那么，我们的头脑又怎样呢？是不是从动物心理逐步发展过来的呢？我们的心理同动物的心理是否完全不同呢？还是动物的身体好像我们的身体一样，身上仍旧保存着一切有用的和那些已经无用而只能产生紊乱的特点呢？难道我们还不会说话的远祖的心理不但出现于我们婴儿时代和年老力衰的时代，而且每当我们一遇到危急的时候也要重新体现么？我可以毫不武断地肯定说：研究动物心理学的人，都会承认：灵长类的其他动物身上的心理作用将永远体现于人类的身上。假使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岂不是应该研究动物心理学以求得一种知识，来使我们发现与明白真正使得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是些什么东西？

比较心理学或动物心理学这门学问在美国各大学里只是最近才有适当的地位。桑代克教授在十二年前是第一个将心理学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从此以后，心理学发展很快，特别是在美国。当猿皱眉地在观看时，我们几乎很难知道它在那里想些什么。莱那契说过：“动物不能把秘密告诉我们”。但是，科学上的观察和实验都已证明，猿和其他各种动物都有接受教育的能力和它们学习的方法。科学家又证明：类人猿能做许多它那住在森林中的祖先所不能做的事情。它们是很可以教育的。看来通过“用试验和纠正错误”的方法，或者使用我们所谓作弄心理的方法，用赏罚去激动它的方法，类人猿可向人学得许多东西。尽管模仿性的性质和作用到现在还没有弄得很明白；但是我以为没有人会怀疑它的重要性。现在我们不能不提一个显著的问题，我们人类是不是同类人猿一样，大体上也因为有了试验，有了错误，有了作弄的能力，有了赏罚的刺激，有了模仿性，才可以学得许多东西呢？我深信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几乎我们所有教育根据都是建立在同类人猿原理略有变更的基础上的。对于一个相信历史具有连续性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很可喜的新发现，尽管从其他方面看来，这未免使人感到耻辱。

我知道大部分历史学家，乍看起来，都认为比较心理学和历史学相去太远，很难发生关系。但是这种印象是错误的，至少在关于文化的性质和传播的问题方面是错误的。假使我们不懂得一些动物心理学，我们就不能了解人类文化的性质是有别于我们只是从动物身上继承过来的遗产。历史学家若能把较高级的少有的人类特有的心理，同我们由于祖传习惯现在还经常在依赖的那些优势的基本的类人猿心理方式加以区别，那么，对于思想的变迁、制度的发展、发明的进步、几乎一切的宗教现象等问题，恐怕就要容易研究得多了。

我想对于心理学方面来举一个简单例子。加勒里尔·塔尔德曾经强调说，我们所有文明中各个最微小的原质，文化中的各个原子，以及动物身上必要的器官，一定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或是重新体现的，否则就消灭了。对于这个规律在历史上的作用，给予证明便是我们历史学家很重要的一部分职责。文明不是天生就有的，但就广义来说，它是由模仿传下来的。一个字、一种工具、一本书，假使不去加以普及推广和不断更新，那么，它们就肯定会像有机体那样遭到消灭，这个规律也适用于下列事例的说明。假使西罗马

帝国瓦解以后，时局混乱和学问长期消沉的程度稍稍增高，那么，恐怕西欧的希腊书籍就会遭到必然的消灭，假使在都尔的格里哥里时代，在高卢地方能读希腊书籍的人只有君士坦丁时代的一半，那么，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或欧里庇底斯的《伊雷克特拉》这两部书遭到消灭的机会，就不知要增加多少。在总结这些见解的时候，我很知道这些见解对于有思想的读者，也许会引起许多严重的危险。历史学家会承认他们是忽视了在别的科学领域各种新发明的学说对于他们的结论所具有的影响；但是他们会提问：他们如何还有功夫去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比较宗教学、社会心理学、地理学、气候学等等的科学呢？仅是这几种新的科学名词，他们已经弄不清楚，哪能作进一步的研究呢？而且他们还抱有一种并非不自然而产生的怀疑心情，认为许多人向他们介绍一些常识，其实这些人自己还是一知半解的东西。有些新兴的社会科学中常使历史学家很不愉快地回想起那些现在已经绝迹的历史哲学家，他们自以为是用推理方法发现了人类过去的由来，而对人类的过去却不必去进行研究。

但是历史学家假使把近代的社会科学，同从前那种陈旧的无人相信的历史哲学相提并论，那就大错特错了。历史哲学家研究人类的过去，其目的在于满足他们的感情上的渴望，他们所作的解释，归根到底往往是带有一些神学的、或者民族的偏见。至于现在社会学家则恰恰相反，他们对于人类过去的历史作了一种很真实的、有价值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显然是片面的。虽然社会科学家确实忘记了休谟所说的那句话：“宇宙运行中有千变万化”，而去过份地强调自己所喜欢的某一方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的效用。

显然，同地质学家、生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一样，即使历史学家没有功夫去掌握他们最为接近的其他科学的原理，但他们必须利用其他科学家所能提供给历史学的学说。历史学家不一定要作人类学家或心理学家才可以利用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发明和学说。这种发明和学说必然可以对历史学家贡献出一种新的见解，而新的解释则可以帮助历史学家纠正许多误解，改正存在于历史著作中许多陈腐观点。最重要的是历史学家应该彻底树立起历史的观点，运用发展的学说去解释人类过去的经验，而且消除人们这种猜疑，即历史学家尽管自己的称号和地位是历史学家，而他们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在所有企图解释人类的学者中间却是最没有历史观点。许多新兴科学领域，有时很可能会言过其实，他们所提供的历史解释，也时常会遭到历史学家的反对。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思想，无疑地跑得太快，失去分寸，这就使得许多历史学家抱住过份的保守思想，心安理得地就什么也不去想了。但是无论如何，想得太少总比想得太多会有更大的冒险。假使把历史学的新同盟军好好加以利用，那么，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

---

法国人（540—594年）。——译者

在今法国南部及意大利北部。——译者

古代希腊悲剧作家（公元前480—406年）。——译者

## 第四章 思想史的回顧

—

培根勋爵在他的《论学术的进展》一书里曾经说：“现在虽然有许多关于研究自然现象、政治和宗教的著作，但是总没有人专心去描写和叙述历代学术思想的概况。世界史中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叙述，那就如同波利菲穆斯（独眼巨怪）没有眼睛一样。这就缺少了那个最足以代表人类精神和生命的东西。但是，我并非不知道在各种科学里，如法律、数学、修辞学、哲学等，常常提到某些学派、作家和书籍；而且对于技术的发明，或日常的习惯，也有些简单的叙述。但一种公正的学术史，包括学术流派的起源、它们的发明和传统、它们不同的行政制度与管理制度、它们的兴盛、对峙、衰微、萧条、消沉与湮没，它们的根源和它们的起因，以及所有自古以来其他关于学术思想的大事，却是缺乏的。”

培根这话已经说过了三百多年了，但是他所指的那些缺点，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弥补。我们现在还是没有一部“恰当的思想史”。

我们的确有过几部叙述某些思想的历史书，尤其是叙述哲学史和神学史的书。但是这一类的著作，大体上都是局限于那些著名思想家的学派，如柏拉图派、亚里士多德派、康德派以及黑格尔派；保罗派、奥古斯丁派、阿奎那派、路德派以及约那顿·爱德华派，而不是叙述当代流行的思想。普通人只能懂得各种哲学流派里面的、简单易懂的部分。因而对与论史发生影响。当我们说奥古斯丁主义、黑格尔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们指的并不是这些作家的全部哲学系统，而只是他们的几点特别突出看法。由于这些学说特别深奥，只有专家才想去对它们进行研究。现在一个知识分子假使要回顾和问一问自己，他和一般人所接受的思想，究竟来自何处，他若都想从哲学史里去寻找答案，那只是徒劳无益的。培根的话，至今还是有用，因为我知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十分明白地要写一部学术思想史。

但是，在过去的最重要的教训中，难道还有比教导我们去了解那些重大问题是如何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更加重要的东西么？这些见解大部分都不是我们自己苦心发明的，而是同我们所居住的地方的制度和社会习惯一起继承过来的。丰富的思想内容是几千几万年积累的结果。现在有许多广泛流行的观念，断不能发生于近代，而一定是发生于跟现在不同的环境中的。因而我们的陈腐知识，就往往不能承担种种新的前所未闻的事业。我们只有研究人类思想的变迁，才能使我们充分明了这一点，从而才能改变我们的观点来适应现在的环境。

如果事情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机器动力时代，我们的思想变化往往是落后于环境的变迁，那么，如果对于那些存在于我们世界观

---

古代希腊荷马时代神话中，谓西西里有一个独眼巨怪，名波利菲穆斯。其眼后为勇士尤利西斯所焚，遂致盲目。——译者

德国哲学家（1724—1804年）。——译者

相传耶稣的门徒。——译者

意大利中世纪经院哲学家（1226—1274年）。著有《神学大全》等书。——译者

约那顿·爱德华（1703—1758年）是美国教士。——译者

和对世界的态度中的谬误不去研究其产生的根源，我们又怎能发现我们的谬误呢？培根责备历史学家说他们只给我们提供了一幅肖像画，而在这幅画上却没有画上体现人物精神生命力的巨大眼睛，这种责备岂不是很对么？

广大群众在对于这个被人忽视的园地的殷切关怀也可从德拉波所著的久享盛名的《欧洲思想发展史》一书见出。现在看来，这本书虽曾得到好几年的盛名，实在是名过其实。用我们现代的观点看来，这本书除了体裁还可用、见解还可信以外，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有缺点。德拉波始终不愿意向读者说明他的史料来自何处，可是批评家都很清楚，他的见解看法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的各种著作中得来的，他的结论根本不是从第一手材料得来的。他坦率地向我们说：他的目的在于证明两个法则，而这两个法则现在根本没有人相信了。

在德拉波的著作出版的同时，莱克出版了《欧洲唯理主义的兴起及影响》一书。它同德拉波的书大不相同。这是精心研究的结果，它体现了作者的特别谨慎的治学态度及其所具有的学术水平。但是遗憾的是，他只叙述了最近三个世纪的欧洲思想的发展，而对以前的发展只是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背景。

曾经引起许多读者注意的第三部著作是怀特所著的《科学与神学之争》一书。在这部书里，作者的措词异常激烈。这也许是因为他曾亲自参加论争的缘故。他在写这部书的时候，曾借助于许多学者给他提供大量的论证。他很有力地利用这些论证，驳倒那些神学家。但是他在书中却宣言他写书的目的，无非是揭穿基督教教父遗书的和中世纪传统的荒谬学说，并不在于站在公平正直的立场来叙述学术思想的历史。

勒斯列·斯蒂文所著的《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很可作为十八世纪哲学史和文学史的补充。本恩所著的《十九世纪英国的理性主义》一书叙述的主题是十九世纪时期人们对于教会所支持的意见愈来愈不满意。迈尔兹所著的《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一书也许是当前对于学术思想通史上的一个最有学术价值的，最重要的贡献。书里有几章出色地显示了研究思想史的价值。最近泰勒写了一部很好的书，名《中世纪思想》。这部书里既有同情，也有批评，而且它是以对于原始材料进行不倦研究为依据的。上述的那些著作，尽管具有不同价值，但是它们都局限于某一时代，除了德拉波那部已经陈旧过时的著作以外，我们在那些著作中根本找不出能够概括自古以来欧洲思想发展的各个主要阶段。

如果只是看到各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是复杂难解，那么，看来人们对要想写逐代的学术思想概况的任何企图似乎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摆脱叙述历史的传统方法，对和人类特定的学术遗产同时产生的那些重要事件进行有条理的叙述，不去专门留心专业研究家或学者的思想态度和知识范围，而只去留心一般学术思想界的心情和知识范围、他们对于各种大问题的见解：他们的推理方法、批评能力、见解、以及他们始终所信服的关于神的或关于人的原始材料、他们的知识范围，他们前后的无知程度，那么，要叙述逐代的学术思想的概况，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叙述的时候，当然应该特别强调获得和传播知识的方式（或那些曾被人误以为是知识的事



物) 以及利用知识来促进福利, 改善世界人类的今天和将来的生活状况。

## 二

如果我们要想写一部思想通史, 那我们必须要注意那些过去没有能影响莱克和德拉波的重大发现。我们可以肯定: 如果人们要追溯人类的心理, 那么, 人们会发现人类的心理和动物的心理是混杂在一起的, 因而人们若有志研究晚近才发展起来的动物心理学和比较心理学, 就能大大弄明白人类思想的某些方式。这并不是说我们有任何理由可以假设: 动物能够运用狭义上的理智。我只是说, 在某些地方, 高级动物学习的方法, 同我们人类的学习方法是相像的。无论如何, 研究动物的心理, 要比研究别的事物更能弄明白人类心理的主要特点。某些高级动物, 特别是类人猿, 它们是很能接受教育的, 而且它们身上是体现着一种可以不凭理智进行学习的能力。这种能力, 不用理智而取得知识, 不但是人类和动物所共有, 而且人类要比动物强大得多。人类文化的真正的本质与文化的传布方法, 以及人类理智同猿类心理活动过程的区别, 也只有研究动物心理学, 才能把它们弄明白。人们现在正在苦心研究这一门新兴科学, 这在美国尤为显著。在上一章所述及的另一门新兴科学社会心理学, 将来必然会帮助我们弄明白人类相互依赖的本质和程度。总而言之, 我们人类不但还保留着动物的心理, 而且还保留着为人类学研究所发现的与那种原始人所共有的原始的推理方式。正如同在某些危急的时候, 我们的原人思想对我们提供的帮助那样, 我们的原始的推理方式, 如果还没有为日积月累的知识所淹没, 如果还没有受人为开展的批评所压制, 那么, 它们就总是要流露出来。

若要逐步弄清楚几千年以来人类心理发展过程, 那么, 我们只能从古代人类手工的遗迹来加以判断。此外, 还可从野蛮人的推理和婴孩思想的逐渐发展做出推断, 在未有史料纪载以前, 我们只好根据古代人类制作物的残留遗迹来判断他们所已具有的知识, 我们没有别的方法来发现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历史上最古文化——六千年前埃及文化——的基础。

埃及人看来似乎不曾有过希腊人所谓的那种学术生活。他们苦心编制出一套很复杂的死后生存的学说, 他们在工艺上有过许多的发明, 而且他们因为要利用尼罗河水——他们借以为生的——涨落的缘故, 不得不细心地去观察天象。西欧各国受埃及所赐的益处, 毫无疑问地要比我们已能断定的多得多。但是, 我们的关于时间之划分为小时、分、秒, 以及圆周之划分为三百六十度的方法, 都是从巴比伦人和亚述人那里学来的。希腊人和其后的西欧人对于研究星占学的热忱, 也是从这些古代文明那里得来的。

就我们所能追溯所及, 狭义的学术生活, 似乎发源于纪元前六七百年住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 特别是在米利都城。但是在泰勒斯、阿那克西曼特和其他哲学家的哲学下面还连接着一块广大的基础。当这派哲学家探究着什么是万物的本原, 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十分诡辩和虚伪的, 它代表着一种科学的抽象玄理。这种玄理只有当思想已是很成熟的时候才能产生。因而自泰勒斯时代以来, 为了要维护对于这个科学的野心, 哲学家似乎一直开展着殊死的斗争, 因为这个野心, 经常有遭受陈旧的和原始的思想破坏的威胁,

这些思想可以纳入实用主义派、神秘主义派和浪漫主义派中去。

爱奥尼亚派 哲学家同艾利亚派 哲学家，似乎专门在高度抽象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上用心，如“一与多”的问题，“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概念所提出的种种似非而实的论点。但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我们忽然发现雅典的诡辩派 已经具有完备的和成熟的知识生活；在许多地方，即是现代人们也难能同他们相比。不幸他们的著作大半都失传了，或者因为他们许多的理论，如苏格拉底的理论，没有写下来，仅是一些谈话和口头辩论的东西。

从他们所谈论的东西所给予我们的种种印象，可以知道大部分的论点是从同他们为敌的柏拉图以及从亚里士多德的引文中得来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的智力是如此生气蓬勃，他们理论范围是如此广阔；他们对哲学的洞悉力是如此深邃，以致我们专门研究他们著作的人们，容易有这种感觉：觉得自他们生活的时代以后的一切思想史，都只是思想退他的历史。因而我们有必要来追溯欧洲思想史，倒不一定探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深信的和所发现的是什么；但必须要探讨在他们活着的时代以及他们以后所普遍盛行着的是他们那些独特思想。他们是超乎其他思想家的人，是我们的导师，我们从他们那里取得知识遗产。我们知道：西塞罗 和新学派的怀疑哲学自认为起源于柏拉图；而另一方面，普鲁梯努斯 和新柏拉图派中人的超理性学说和达到忘我境界的学说，也自认为渊源于柏拉图。至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近世批评家无论是研究文学的，或是研究哲学的、科学的、政治学的，都会对之表示惊奇和赞赏。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他是十三世纪烦琐哲学家们的偶像；他们都利用亚里士多德错误的关于本质原理与最后的原由的理论以及他的站不住脚的干枯三段论法来做他们哲理的根据。

希腊化时期，在亚力山大和其他地方的学者，似乎在某些方面能很有利地继续维护希腊的传统。但是他们所添加进来的知识，并不很多，他们的主要力量是用于训诂、注释和文学批评之类的工作，因而对罗马时代的思想家的吸引力并不很大。亚力山大派的著作大部分久已失传，只有欧几里德 的《几何学》，和托雷密的《地理》、《天文》、《气象》等著作，被阿拉伯学者保存下来，并到十三世纪重新在西欧发现。

罗马帝国末期，随着希腊思想凄惨的衰落，出现了一种新思想的热潮，这种新思想对于人类起源和人生活目的的论点，和前人大不相同。近代历史学的一个大发现，就是证明了我们所谓的“中世纪思想”，实在完全是在罗马帝国末期，日耳曼人还没有南下瓜分那个奥古斯都大帝帝国以前，已经完全被创立起来了。因为远在普鲁塔克活着的时候，从雅典留下来学术生活的传统已经逐渐改变，导致了一种感情的革命。理智成为叫人怀疑的对象；理智的无能似乎已经得到证实。所以当时的知识阶级中，人往往并不到斯多噶派

---

希腊哲学最初起源于小亚细亚西部的爱奥尼亚地方，最早出现者为泰勒斯派的天然哲学。——译者

希腊哲学之一派，为艾利亚地方的色诺芬所创，故名。——译者

也译为智者，此派起源于纪元前五世纪中叶。——译者

罗马哲学家（公元前106—43年）。——译者

亚力山大时期的哲学家（205？—270？年）。为新柏拉图派的创始人。——译者

此派为普鲁梯努斯所创。其学说系融合东方玄学与柏拉图学说而成。——译者

亚力山大的几何学家，约生于公元前300年。著有《几何原理》。——译者

亚力山大的天文学家及地理学家。纪元后二世纪时人。——译者

的恬淡寡欲的情欲抑制中去求自慰，而是到新柏拉图主义的放落不羁和巫术的幻想与东方的玄秘主义中去求安慰。希腊主义所固有的纯洁和中和，慢慢地让位于对理想的低估和超自然的信仰。普鲁梯努斯认为理智生活中所能感到的，只是较卑下的东西。至于最崇高的真理则是超自然的。若要实现我们的崇高希望，那就不能依赖理智，而只能依靠直觉。

哈那克 说得好：新柏拉图主义虽然在某些方面是崇高的，而且是足以感动人们的，但实际上它只是一种思想的破产。“藐视理智和科学（由于它们的降格而受人鄙视），终于导致野蛮之风；因为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粗俗的迷信，而且容易蒙受各种各样的欺骗。而且事实上，野蛮之风，真是继新柏拉图派繁荣时代之后便产生了。广大的群众在迷信中成长起来。基督教会接受了新的柏拉图主义的遗产后就不得不向它靠拢，并且同它调和。正当古代文化破产，堕入野蛮的泥坑时，在这段时期的欧洲史上就出现了某些野蛮民族。对于这些民族来说，过去的一千年的历史就不存在一样。尽管那段史实已经模糊不清，但是只要我们仔细深入研究它的本质，那就可以看出古代的世界必然是自然而然地退化到野蛮状态，因为它是已经放弃了这个世界。它不再存有去享用、去支配和如实地去理解这个世界的希望。由于另一个新的世界的被人发现，人们便放弃这个旧世界的一切东西。并且人们已不打算再想去弄清楚和理解这个旧世界，就去占有另一个新的世界了。若用将来的新世界的见解来看待事物，那么，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些被人看作是荒谬的，却成为智慧的；而那些原来被人看作是聪明的，则倒成为愚蠢的了。”

恰好是在这个时期，历史上的基督教从那些教父的著作里面取得它的教义信条。人们可以想见：最著名教父奥古斯丁曾经受过波斯人摩尼的学说和新柏拉图主义的诱惑。桑塔亚那说得好：“基督教史诗”给新的学术生活提供基础，使它在以感情中心的环境中得到发展，使它尽可能不同于公元前五世纪时雅典的知识，这种新思想虽然能够吸收那些显然体现于柏拉图的学说中的某些理想和玄妙的论点，但是它却不欣赏德谟克里特以及曾接受柏拉图的机械宇宙观的伊壁鸠鲁学派，也不欣赏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亚历山大时代的那些科学家——如阿里斯塔斯、希派古斯、阿基米得等人的对于世界知识上的各种贡献。假使这些科学家的研究精神和研究方法，能够得到推广，那么，我们现在的自然科学，也许早就发达起来了。苏格拉底同时代人所过的那种生气蓬勃的学术生活到最后非令人失望不可。因为这种生活是纯学术性的；它要想通过纯粹学术活动和探讨中去研究真理。它很少去具体地研究使我们感到苦恼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它不认识我们苦心研究科学的意义，也看不到把研究自然世界（有机世界也好，无机世界也好）所得到的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的可能性。

---

德国十九世纪神学家。著有《信条史》七卷，以下引文系引自该书第一卷，337—338页。——译者  
摩尼（216—273年）波斯人。为摩尼教之始祖。其教义以明暗两种竞争为主，教人弃暗就明，改过向善。  
——译者

希腊哲学家（约生于公元前460年）。创立原子说。——译者

此派哲学为伊壁鸠鲁（公元前341—270年）所创，故名。以求快乐为修德之目的。——译者

公元前二世纪的天文学家。首创地图及地球公转自转学说。——译者

纪元前二世纪的希腊天文学家，始发现春分秋分之理。——译者

希腊数学家（公元前287—212年）。——译者

关于这个方面，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经院哲学的复兴，就其精神来说，它是希腊式的。诚然，那时候非常相信权威，而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以前，雅典人是不受它的限制的。托玛斯·阿奎那所应用的材料和柏拉图不同，但是他同柏拉图之间的连续性，还是十分明显的。

十二世纪末年，欧洲出现了第一批大学。神学这门课是以彼得·龙巴特的《集语》为依据，成为当时有系统的课程。当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已经有了不太好的拉丁文译本，于是旧日所讲授的那种对于早几个世纪留传下来的简陋的七艺就被讲述希腊思想最卓越的代表的主要著作所替代了。除了法律和医学，十三世纪西欧知识界所研究的科目，还有两种：（一）异常复杂的神学及其一切精微的分派。（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他的《伦理学》、《物理学》、《形而上学》、《动物学》，以及当时教会的注释家所编辑的关于自然现象的次要著作。这些经院哲学家将他们自己的观察同阿拉伯哲学家的观察结合起来，这些阿拉伯哲学家已经知道而且研究了亚里士多德，其中最伟大的哲学家是阿弗罗斯。但是阿拉伯人不如“伟大者”亚尔伯特和汤姆斯·阿奎那更能理解亚里士多德。因为阿拉伯文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本，不是从希腊文译过来的，而是从叙利亚文译过来的。所以雷南对于阿弗罗斯的注释，曾经幽默地说：西欧的大学在研究一个希腊哲学家的哲理，曾经花费数百年的功夫研究一种拉丁文的译本。这个拉丁文译本是从希伯莱文译出的，这种希伯莱文的译文又是从一种阿拉伯人对于阿拉伯文译本的注释译出的，而这个译本又是从一种叙利亚文的译本译出的。即使假定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拉丁文译本是异常完备的，但是十三世纪的哲学家要想超越所有困难，去理解纪元前四世纪的希腊哲学家，这种可能性恐怕是很少的。所以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再兴，不但不能纠正中古时代错误的看法，提供知识进步的起点，反而对根本变更思想又增添了一个新的障碍。崇拜权威的习惯，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探讨真理的精神不仅没有得到鼓励，反而受到挫折。

十五世纪时，希腊思想在意大利再次流行了。在西欧方面，自公元 500 年以来，希腊文几乎消灭了。鲍伊喜斯曾经将希腊人的主要著作译成拉丁文，想把希腊人的知识留传下来，但是他没有取得成功。显然，这是因为当时受教育的罗马人已经不懂希腊文了，因而希腊人的一切著作也就势必要消失。当 1396 年克里梭罗拉斯在佛罗伦萨地方给好学的人讲希腊文以前，这数百年间几乎很少有人提及希腊人的著作。尽管人们没有忘记荷马和柏拉图的名字，但是十二世纪的学者几乎不知道伊契鲁斯或苏福格尔，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这些人。十五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专心致力于搜集希腊文学著作的残本和拉丁文学家塔西陀和路克勒底斯的著作。他们将希腊书籍译成拉丁文，因而将这些古典著作在知识界中流传起来。

但是一般人认为这种对希腊和拉丁著作兴趣的复兴，也就标志着希腊主义复兴，这是错误的。十五世纪时，佛罗伦萨的书商委斯巴西恩斯编了各藏书家的书目，从这书目可以看出，当时买书的人毫无鉴别能力。曾经译过柏拉图的著作的费西努是一个热心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在庇果·伐拉·米兰陶

---

十二世纪的意大利人。——译者

阿拉伯著名哲学家（1126—1198 年）。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作过许多注解。——译者

经院哲学家（1190—1280 年）。——译者

罗马学者（470—524 年）。——译者

拉看来，犹太的卡巴拉这种学问是蕴藏无穷的知识。总之，正如在十三世纪时亚里士多德不能引起学术革命一样，十五世纪时，柏拉图也不能引起学术革命。除了瓦拉还多少接触过古典著作，因而稍具有批评的能力以外，所谓“新学问”实在不能说它已经走近批评的时代。很难设想十三世纪会出现马基雅弗利或一个伊拉斯谟斯这样人物。但是人们也很难设想在十六世纪初，究竟有什么微妙的变化能够产生出这些人物？而且人们也不能随便说：这是因为有了人文主义的缘故。

新教徒的脱离罗马天主教与思想的变迁并没有什么关系。新旧教徒往往强调新旧教义的不同，致使我们忘记这两个体系在知识上的一致。实际上它们十分之九是相同的。最初的新教徒同旧教徒一样对于世界的观念，也是赞成教父的整套见解。他们对于历史的看法，对于人类起源，《圣经》及《圣经》中的预表、预言和神迹、天堂和地狱、天使和魔鬼等观念也是相似的。同旧教徒一样，当时的新教徒以为人们若要想得救，那就一定要相信三位一体的神，而且一定要反对在私下谈论理智，反对科学进步所提出的革新。路德和梅兰克松曾经根据《圣经》反对哥白尼。梅兰克松曾经热心地校订了托雷密的《星占学》。路德曾再三尖锐地攻击理智，因为他承认在理智面前，有许多基督教的理论显然是荒诞的。喀尔文极力主张人类本来没有道德的能力，宿命论看来就是要麻痹人们一切作为。

新教徒并不比他们的对头——旧教徒更懂得自然；他们同样受魔鬼论和巫术的欺骗。所以宗教改革并不是由于科学的进步；它的成功也并不是由于对于批评精神的信仰。正如吉本所指出的一种玄理——“变质的原理”——的丧失，可以完全由“原罪”、“赎罪”、“信仰”、“恩典”和“宿命”等学说来弥补，这些学说都是新教徒从圣保罗的书札中引取来的。所以从知识观点来看，早期的新教主义还是中古时代宗教史的一个方面。

### 三

到了十六世纪末，哲学家蒙坦很能表示出一种真正希腊人的风格，这就使人们明了所谓“文艺复兴”时代的缺点和失望。他虽然没有升到柏拉图理论那样玄妙的高度，但是他毕竟能够完全摆脱教条和权威，而且他的结论很具有推测性和人道精神。到十七世纪初年已经出现了思想革命的开端，它使我们摆脱了希腊思想的范围。当时有一个人把这种变迁说得特别明白，那就是培根。他在《论学术的进展》和《新工具》两书里，很尖锐地指出学术进步的障碍以及克服这种障碍的方法。他对于科学发明以及应用科学去改良人类生活的远景，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讲得透彻，或者至少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要说得有力。他分析了权威的性质，并指出它的危险。他预见到我们通过实验科学的研究，我们关于人类和世界的知识有无限增加的可能性。他在他那个理想共和国——新大西岛——里建设了一个科学院，给这个机构一个最重要的地位。他还详细地说明科学院内部的复杂设备。在他看来，知识是动的，而且是进步的。在他的著作中，他第一次明白地提出了有关我们近世人类进步的观念，他虽自己并没有对于自然科学做出什么重大贡献，而且

他于当时的科学家如伽利略、哈威等人的贡献，也不加认识。他甚至不赞成哥白尼太阳系的学说，而且有时也表露出对权威的崇拜。但是所有这些都说明人们的用意无论怎样好，但要骤然打破旧习惯，那实在是很难的。

笛卡儿在反对崇拜古人方面，比培根更进一步。人所周知，他认为假使人们遵循他所制定的那种研究真理的方法，人们就能重新创建一套完整的知识。他的《方法论》那部书，基本上就是一篇摆脱古代和中世纪思想方法和中古的治学态度的宣言。同培根和伽利略一样，他敢于用自己的国语写出最精深的思想，从而承认知识阶级并不局限于那些懂得拉丁文的人。

笛卡儿的扫除旧思想建立新体系的计划，无疑是标志着哲学思想的新纪元；但是如同人们所早已预料到的，当他再去充实他虚空的心思时，他所添入的观念仍然主要地是那些旧观念。他无意识地只是找出一种新的借口来重新安插进静多旧思想。同培根的研究真理方法不能使他摆脱旧日的谬误一样，当笛卡儿急于要证明上帝存在的时候，他就露出一一种很强烈的保守趋向。尽管如此，他和培根虽然未能将迷信偶像的旧习完全铲除，但是却已经把它打伤。而且我们现今知识空前的进步，以及关于人类和它的环境的论据空前增加，这不能不主要归功于培根和笛卡儿两人所提倡的新的治学态度。

在十七世纪西欧出现了大胆的批评精神，这种精神自从罗马末年怀疑论派消逝以后就没有再现过。这在对于被教会支持的事情上，尤为显著。洛克等人发展了信教自由的理论，神迹这样东西便成为一个极大的障碍；斯宾诺莎梗概地制订一套深刻批评《旧约全书》的方法。培尔对于宗教英雄的历史如大卫和奥古斯丁等人——进行了无情的审查。到了十七世纪末期，布伦特和柏奈特给《创世纪》前边几章写下引人发笑的注解。舍伯利的黑柏特在他的《古代信徒的宗教》一书中，曾很早地对宗教进行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他反对上帝要使大部分的人类永入地狱的观念。牛顿证明：地球上运动法刚可以用之于整个宇宙。这种学说给人的印象要比哥白尼学说远为深刻；而且十八世纪的自然神论者始终是把不可动移的法则当作上帝来加以颂扬。

近代天文学、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数学等科学基础都是在十八世纪中期以前就建立起来。那时，关于这些科学知识的范围和正确性已经大大超过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水平。从前建立在《圣经》和古典著作基础上的迷信和巫术最后衰落了、消灭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自由批评的精神和对实验科学及其应用的信仰——这一切都不断增加进步观念的力量和削弱对过去权威的信仰——这给以后一系列新的事业创立了必要的前提。

---

意大利数学家、物理学家兼天文学家（1564—1642年）。——译者

英国生理学家（1575—1657年）。发明血液循环之理论。——译者

法国哲学家（1596—1650年）。著有《方法谈》等书。——译者

英国哲学家（1632—1704年）。——译者

荷兰哲学家（1632—1677年）。著有《伦理学》等书。——译者

法国怀疑派哲学家（1647—1706年）。——译者

公元前十一世纪以色列国王。相传为著作《旧约全书》赞美诗之人。——译者

英国人（1654—1693年）。——译者

英国宗教史家（1643—1715年）。——译者

英国人（1583—1648年）。——译者

## 四

从以上所叙述的从古代到十八世纪中叶思想史的梗概，我们可以对现代思想的主要特点得出某些结论。即使是那些最醉心于希腊思想的人们，也不能不承认现代思想。毫无疑问，同古代相比，是含有许多新的因素。没有人会怀疑：如火车头、缝纫机、蒸气打谷机、电话、电灯等这类东西，都是古代所没有的，但是许多有高度文艺修养的人们，却仍旧认为我们现在的艺术和文学，恐怕不见得能够超过希腊人，因而他们认为所有各种知识的活动，都已被希腊人发明尽了；所有我们种种根本的科学发明，也差不多被他们预知了，而且他们的知识生活的理想，虽不能比现在崇高，但是至少总能同现在的相等。

我以为这种怀疑是由于人们看不到我们现代思想里所蕴藏的、具有根本性的新特点所造成的结果。现代思想至少有五个显而易见的新特点。其中两个特点，我们在上面已经谈过了：（一）实验科学主要是近代的产物，即用器械去细致观察自然现象，再用实验去证实它们。希腊人没有望远镜、显微镜、寒暑表，也没有分光镜；他们的知识至多不过是一种粗率观察的结果，而且有承认权威的趋向。经院哲学派学者们也许要问：既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重物体下落要比轻物体快，那么，我们还有必要去亲身观察么？（二）我们近代由于新知识的发见和人类生活状况的改善而产生的进步观念，这显然为希腊人和罗马人所没有的。

到了十九世纪人类思想中又增添了三种因素：（三）我们不知不觉地对平常人有了尊重，有了了解。我们关心他们的福利，愿意容许他们去参政。所有这一切就成为一种所谓民主精神。只要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还存在一天，那么，民主的精神就不可能产生。正是由于对于平常人民有了理解，我们的那些为希腊人所没有梦想到的近代社会科学才会发展起来。而且那些旧学问，例如心理学和伦理学，才会社会化。经济学产生于十八世纪，到了十九世纪，在与人类学大规模发展的同时，比较宗教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也有很大的发展。

（四）大力推动着我们去掌握这种社会观点的趋向是一种新的因素，这就是工业革命及其伴随而来的种种情况，即所谓产业革命。所谓产业革命是指有了机器和工厂制度之后，我们的经济生产和经济组织的方法所发生的根本变化，乍看起来，这些事情和学术生活好像相去很远。试问新的纺织方法和更有效率的做鞋的方法，为什么竟会具体地影响我们整个的世界观呢？这是因为产业革命提供了两种出乎意外的可能性：一种是改革社会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促进人类幸福的可能性。这是近代思想中两种使人最为关注的事情。正如欧文所指出的，由于有了机器，我们的生产能力提高了，正好像世界上大大增加了许多不衣不食而劳动的工人一样。假使在一个具有二万人口的工业城市，近代机器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可以等于从前二十万工人的工作量的话，那么，每一个工人的必需品和生活福利事业就平均需要九个人去帮助他。在一个平常人看来，到目前为止，工业革命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由于这种种原因（这里不能详述），那些帮助他的人对他并没有好处。尽管如

此，经济革命为改革社会提供了可能性，这对于人类思想来说，却是最个人感到喜悦的问题。

再则，我们近代城市的发展要归功于产业革命；而城市生活同学术的变迁总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有理由去假定：城市的巨大发展一定会最后大大影响我们的思想。伴随这些经济变化而来的，就是世界商业的发达以及交通工具发挥高度的效能，这都使得全球人类团结在一种竞争和合作的精神之中。恐怕无需许多年，全世界的人类都能读能写，而且通过交通工具，能够了解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情。这种奇异的情状提供了人类四海一家的无限可能性。没有几年以前，在一次国际邮政会议上，我记得曾有人提议要将在地球上任何两个地点之间的邮资一律减为二分美金。这个建议曾得到埃及、美国和新西兰的赞同。这个提议及其拥护者，一面代表最古的文化，一面代表在地球另一方的最新的文化。这足以使我们消除这种思想，即认为我们思想的范围只能以希腊人的思想范围为限。

（五）除了上面所我的各种趋向以外，还有近代进化的观点。这个发见通称为进化论。它认为所有一切东西都是慢慢产生的，而且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从另一个东西产生出来的。这个学就要比任何其他新的思想更有力于推翻欧洲在上古和中古时期盛行的思想方法。杜威教授曾经说过，达尔文将他的书称为《物种起源》，就体现了对旧学说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思想革命，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这个学说的全部意义，迄今以前几乎没有人明白。希腊思想家对世界的发展，虽然并不是相对无知，但是他们对于地球和人类的历史，却知道得很少，或者一点也不知道。一般来说，他们是建立了固定物种信念，即固定不变的物种的信念。这种信念还得到中古时代基督思想家的赞助。既然人们相信固定的和最后的物种是超群的这个学说，那么，人们就自然会吧演变和来源当作是一种缺陷的和非现实的迹象。杜威还说：《物种起源》攻击了绝对永恒的那只方舟，而且把前人认为是固定的、完美的形式看成是发生的和发展的。因而就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终究必然要变更知识的逻辑，从而变更对伦理、政治和宗教的研究。至于柏拉图的“观念”、亚里士多德的“精理”、基督教关于“创世”和“永久的真理”的信条，都因此一扫而空了。只有当人类的思想有意识地对不变的、最后的和超群的东西都研究完了，然后才能去探讨将来可能发生和可能变化的前人没到过的荒境。由于人类的思想在从事这种新的冒险，他的兴味就必然从变化的内涵精义转移到变化如何对目的有贡献或破坏的问题；从那种已经形成固定不变事物的知识转移到正在形成事物的知识；从善的最终目的转移到直接增进公道和幸福。当现状管理得明智得法时便可产生这些东西；当现状管理得不明智得法时，则会破坏或抛弃这些东西。

这种“进化”的思想方法是我们所处的现代动力时代必然的结果。即使古生物学家、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没有给人们说明现在的动植物是由古代物种发展来的，但希腊人和中古时代的哲学家的思想刚总要在科学知识全面进步和产业革命面前让位。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殆我俩提供了很好的进化顺序的实例；但是即使没有这些，从前那种以固定物种和要素为基础的哲学，同依赖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把它看做是一种追求真理的好方法的哲学是注定要破产的。因而有机进化学说的发现，实在是哲学革命的结晶，



而并不是哲学革命的开始。

如上所述，在材料的积累和用以建立思想的材料正确性方面，在研究和解释这些材料所用的批评和历史的方法方面，在反对阻碍知识进步的荒谬的哲学假设和空洞的相反的理论，在利用知识去增进人类的幸福方面，都是近代人的思想，岂不是现代远远超过希腊人么？确实，亚力山大时代希腊哲学家从阿里斯塔卡那里懂得了地球有自转和环绕太阳公转的道理，并从阿基米得和希罗那里，获得了重要器械的图样，而且他们还知道伊壁鸠鲁派所主张的人类渐进的学说；但是他们都不能够懂得这些思想的重要性。正如杜威所说的，他俩立誓要专门研究不变的、最后的和超群的东西，所以他俩的思想总有一个最后的止境。至于我们的思想则似乎没有止境的。我们没有理由可以说我们所做的已远远超过最初的发现和最简陋的知识应用。我们充满希望的研究的前景似乎是无穷的；新的知识的影响似乎也是无法估量的。

我们对事物思想的范围要比前人广阔得多；我们知道真理不但是像古代希腊一个重要学派已经看出的那样，它是相对的；而且这个相对性是以我们知识的经常增加为条件的。西塞罗宣称：这世界上不可能有哲学家们还没有发见过的观点；因此聪明人应该接受当时在他看来最合理的意见。西塞罗的这种怀疑态度固然不无可取，但是我俩现在必需说一说我们的情况。我们的经过慎重思考出来的意见是建立在人类和人类环境的事实上面的，随着我们对于这些事实的知识不断增加，我们的意见必然会不断改变。我俩要在希腊人所发现的事物所固有的相对性上，还要添加能动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是科学知识飞速进步的结果；因而，这就必然会使我们一切的结论都是暂时性的结论。

在人类从事有意识的社会改革事业的过程中，思想史似乎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社会的变化一定要配合着感情的变化，而且它是取决于学术上的指导。思想史这样东西是一种消除成见和打破保守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它不但通过对现在问题产生的经过进行说明来使我们明确我们的义务和责任；它并且还可以促进人类的学术自由，这是进步的根本条件。

---

古代希腊数学家（公元后二世起初生于亚力山大）。以试验凝结空气著名，并预见蒸气压力的道理。——译者

## 第五章 普通人应该具有的历史知识

—

假使有人问历史家，近代最新奇的、具有最大影响的发现是什么？他可以回答说：近世最新奇的、具有最大影响的发现就是我们对于普通人和普通事物的重要性有了认识 and 兴趣。我俩的民主精神、和它所有的希望和志原，就是以尊重普通人为根据；我们的科学和它所有的成就和希望，就是以尊重普通事物为根据。以上这几句话的正确性，我们不能在此地加以说明，而且也不必再加以说明。因为我们都承认这个真理了。我们现在应鼓研究的，就是对于那一大批将要过早地用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的青年男女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去教育他们。但是教育这件事，从来就不十分注意做普通事的普通人。因为从前以为受教育的人们，一定都是有闲的、不必自己去谋生的人们。

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希腊人。他们建立了一个传统，把教育看成是“自由的”，是以“自由艺术”为基础的。所谓“自由艺术”就是对于那班有奴僕侍候的而且有余暇的自由人而设的那些学科和训练。假使一种特别的研究、带有一些实用的意味，它就失去它的自由性了：因为这种特别研究、只有奴隶才配去做。这种教育的观念、事实上一时很不容易清除。因为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我们并不十分觉得社会上有什么变化。希腊人并没有和我们一样的民主精神，也没有如我调所了解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在生活上的应用。奴隶制度早已消灭了；古代奴隶所担任的职务、已经经过了一种革命了、已经如此的复杂了、而且已经可以利用科学发现的进步去发展它了；因此近世的工业和古代简单的手艺已经大不相同。现代的工业是非常有趣味的，而且非常被重视的。我们没有权利可以和希腊人一样，将工业放在教育范围以外。我们没有理由可以继续保持那种偏见，去反对有实用的科学。我们不应该再被传统的观念所局限，认为“自由的”和“有用的”应该分开。在今天，我们正应该大胆地、毫无保留地，立刻将我们的教育和现在大多数在公立学校读书的学生们的实际生活同他们将来所要担负的任务，密切地结合起来。

根据存在我的心中的上述信念，我想要说明历史学在将要于毕业后即到工厂中做工谋生的青年男女们的教育中的地位。当我最初开始教授历史的时候，我不能不承认我实在不十分明白学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这主要地是因为当时我没有十分明了人类过去对于我们的意义。后来我慢慢的觉得我俩的知识和思想完全是依赖过去的；而且只有过去才可以解释我们自己的现状和我俩的事业。历史是我们对过去的知识。我俩要追问历史，就像我们要回忆自己个人的行为和经历一样。不过我们对自己过去的回忆是常常随着我们的态度和成见起着变化的。我们往往调整我们的回忆来适应我们当前的需要和希望，而且还往往利用它来分析我们当前的问题。历史也是如此，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变化的。各时代的人都有权利去从人类历史里面选出和当时特别有关系的事实。所以马特林克 曾经指出：“随着我们知识的增加，那些看起来好像刻在石碑上或铜器上的，永远不变的历史事实，一定要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一定可以复活起来，跳入运动之中，给我们提供一种

较宏远而且具有胆量的意见”。

这一点非常重要，希望读者特别注意。因为现在普通所谓教科书、很少是适合于我们的目的的，所以工业学校里应该采用一种什么历史教本，我实在没有具体主张。因为历史这门学科，我们没有像算学一样的那种明确的组成部分。虽然普通历史学家编订历史教科书的时候，以为他们已经将各种最重要的事实都包括在内，好像化学家或地质学家编他们那种自然科学教科书一样。但是历史学具有它的特殊性，因为历史学所研究的是异常复杂的东西，不像化学那样有一定的现象。我们有许多所谓史学名著，其中专门叙述的往往只是君主和教皇、朝臣和政客、争夺银土和王位的战争、君主和国会所制订的法律。但是这些事实，只是历史中的一小部分。因为历史学家可以描写一个罗马人的农庄，或者一个简陋的蒸汽机，或者比较圣托焉斯·阿奎那和路德的神学主张，或者他可以追述哥特式建筑的来源、或者埃及日历的来源、或者描写亨利八世对安娜·宝琳的宠爱，或者说明俾士麦对于社会党人的态度，或者说明新石器时代的手斧。上面所举的几件事，已经可以表明人类的兴趣和事业是如何广大无边，复杂万状。以上的历史事实，有的包括在我们教科书之中，有的并不包括。

试问过去的事实既然如此的丰富，现在我们有什么保证可以说编写通俗历史课本的人们已经将人类经验中最重要的最有关系的事件提纲挈领叙述下来，以备教授青年之用？我以为我们到如今还没有这种保证。从前伏尔泰说过：历史这样东西只不过是“一种大家同意的故事”。他这句话是对的；因为所有编辑历史教科书的人，当他选择历史事实的时候，往往不知不觉地将从前那些陈旧不堪的历史教科书作为标准，而且教师们和公众们也希望如此。

一直到近来，历史学家所选择的线索还是政治。差不多无论什么东西都分述在君主的朝代下面；各个君主的政策和战争都是他们最喜欢论述的题目。这种传统已经建立很久了。从希腊、罗马以来，如修昔底德、波里比乌斯、季维、塔西陀等历史学家就是如此。本来政治史是一种最容易编写的历史；因为政治史所叙述的主要的不是状况，而是事实。所以按照年代顺序排列起来，非常容易。而且当时的君主和朝廷比现在的国主和朝廷重要得多。在当时，战争是被看作一种贵族娱乐。对于当时的读者，政治史当然是格外重要。有许多主张注重政治史的人，认为这种历史可以做武人政客的指导，以为他们读了历史，可以知道怎样去统兵打胜仗，或者怎样在内忧外患的风浪中决定国家的大计，转危为安。

但是，现在我们的兴趣是在继续变化之中，因而我们要求历史所解答的问题也大大改变了。我们近来有许多历史教科书，大胆地删除了许多沿袭已久、但无关重要的事实，而且企图把书中的记载同现在的需要联系起来。但是我以为这种推陈出新的方法还可以再进一步。即是在我们最好的教科书里面，仍旧包括着许多不值得青年男女注意的事实，而忽略了许多最值得叙述的事实。

我再说明一下：假使有一位眼光远大、富于同情心的人，因为大受现代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感动——例如像马特林克一样——并没有看过现在各种标准的大小历史著作，而对于人类的过去却了解不少；假使他忽然被引入真正的历史材料里面去，明白了所有人类过去思想同活动的遗迹，不但包括文献上的记载，而且还包括建筑物、图画、服装、工具和装饰品。假使他着手去

编一部教科书，要将最有兴味的而且很有关系的事实记载下来，以备将来服务社会的儿童之用。你想他还会包括爱哥斯派泰米战役、赛米特战争、罗马人围攻努曼梯阿、尼罗的罪恶、弗雷特雷克·巴巴罗萨的侵入意大利、亨利八世的六位太太、三十年战争种种事实么？可以断定，当他想一想数千年来人类的事业、思想、困难和希望，他必然不会把以上所说的，我们普通教科书里所包括的那些事实全包括在内的。

假使写历史的人，不专门注重战争、围攻和国王的行动，假使他写历史的目的是想教读者去做好的军官和政治家，恐怕他一定要选择一些政治以外的事情作为线索。他可以说人类对于世界的知识、人类的义务观念、生产活动、建筑的性质和样式，实在比人类在某时期所制订的法律和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更加有意义。所以要讨论在工业教育中历史学科所占的地位，我说过我绝不主张采用那些普通历史大纲。我主张我们应该暂时放弃普通对于历史的庸俗观念，而将这个全部问题，重新加以研究。

我们先要问问我们自己，当我们想到工业学校里面的青年男女的需要、能力、兴趣和他们将来的职业，究竟他们最迫切需要哪些过去事实，以便把他们培养成将来在生活 and 工作中，成为一些有知识的、有能力的、而且幸福的人物呢？要好好的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确定学生们所处的地位和工业教育所提出的要求。第二，我想提出一些工业学生应该知道的、应该记得的，而且我以为最可以增加他们知识的那些人类过去的事实。我认为这些知识对于他们更为有用。

## 二

工业教育当然是一种专门教育。它的直接目的是尽快地把十三岁到十六岁的男儿童培养成为技术工人。关于这种专门教育，我们此地可以不必多说。但是工业教育的目的不只是专门训练一些工作效率很高的技术工人、满足雇佣者的要求、因而可以比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工人获得较高的工资和较快的升级。现在从事工业生产的这个阶级是一个巨大的阶级。社会显然应该对这个阶级的后备队予以极大注意。这班未来的工人应该知道他们的地位虽低，但对于进行世界的工作却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应该明白他们地位的将来；应该对于他俩的地位充满无限希望。

我们应该承认，近世工厂里面的状况并不是令人愉快的。在里面工作的人们往往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很忧郁的。从表面看来，所谓工业就是时时刻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声音嘈杂、污秽不洁的地方、永远重复着一种简单的工作。正如威可夫所说，每一个工人都在那里做一种特别的工作，但是他始终不知道他的工作的意义。结果他们“对于工作的进步并不感觉是自己的光荣，他们和资本家并没有共同的利害。他们没有责任感的快乐、没有事业心，只是把自己的劳动看成是一种干燥无味的苦工，专望着放汽笛散工和领取工资两件事”。假使他这句话是对的，那么，我们怎能希望工人觉悟他们的劳动具有社会的和工业的价值呢？又怎能希望他们明了他们的责任和设法改良他们自己的状况呢？这就是工业学校的组织者应该好好去解决的问题。

现在我以为他们要想解除工业上现存的流弊，他们不能不求援于历史——不过，我所说的历史并不是普通教科书里面的历史，而是那种足以说明我

们的工业生活和它的重要性的过去人类的经验和成就的各个方面。惟有历史可以说明工人所使用的那种机器的存在。机器这种东西是人类发明的链条最后的一环。自从人类发现火石以后，已经经过几千、几万年的工业进步。那几块火石是人类最早的工具，而且或者就是人类机械发明同社会进步的开始。工人可以从历史里面了解现在的分工制度是怎样来的（在这种分工制度中，他是身受其害的），他会知道现在分工制度的巨大社会意义，他会知道何以现在的制品作得如此之快，卖得如此之贱，生产得如此之多。假使他们知道了这儿点，当他们年长的时候，就能想法子去改良自己同工人的地位，不至减少工业的产量，调和经济效率和工人的福利——这本是工业生活里面一个重要的问题。

试举一例，从一个局外人看来，分工制度发生以后，工序已经变得非常简单，何以没有一种相对的趋势，使工人对于制品的整个生产过程，能够有一系列贡献，这岂不是愚笨而且不幸么？单调无味的工作，可用随时合理交换工作的方法去加以挽救，使工人的全部体力和心力有合理使用的机会。现在工业上所存在的许多流弊，假使工人具有更高的知识、更富于同情、而且更加机警，那么，他们很容易通力合作，来扫除这些流弊，而不至于在经济上产生重大损失。

历史这门学问，不但可以使工人得到一个社会进步和未来的观念，并且可以对他提供某些事物的背景，使他可以在自己的环境里把这种知识利用起来，又可以丰富他的想像力，把他的思想扩大到工厂以外。在这里我只能列举几件人类发展史里最重要的事实叙述出来，这事件足以激起青年男女的注意，而且以后可以使他们对人生得到一种新的认识。我们可以先说这个熟知的事实，即世界上能够工作的并不只是人类。人类假使没有工具，他的工作能力比不过蜘蛛同蜜蜂或黄蜂。有几种鸟类能够为它自己和它的家庭造很复杂的巢。关于人类的祖先，照现存的人类相近的动物看起来，只能用树枝造粗糙的平台。当我们人类刚用后腿走路，前腿当手的时候，他的脑力才经过种种变化，使他们的脑筋超过最高级的类人猿。在这种长期的变化过程中，在人类文化的发达上，有两种极有力量的因素：那就是语言和工具的发明。

最初的人是一个比黄蜂还要粗笨无能的工人，但是他有一种长处，就是假使他很聪明，他不但常常能做他祖先没有做过的事，并且能够将他们的成就传给他们的子孙。黄蜂工作的技巧是怎样发达起来的，我们还不知道；但是直到如今它始终一样，——同人类的文化不同，既不进步，又不退化；这就是因为这一代的黄蜂并未接受前一代的教育。假使现在有一个婴孩，绝对的不使他受教育，不使他模仿他周围的人们，那么，他的文化程度恐怕比狒狒高明不了多少。总而言之，人类的一切成就并不是先天的，而是经过·99·历代的积累。文化的积累，并用通过广义的教育来传播它，这是人类最大的特点，也就是人类最大的义务。人类社会发展的绝大部分，我们所接受前代遗产的大部分是和我们所用的工具密切地联系着的。我们可以根据人类使用的工具追溯到数千万年前人类的历史。说实在的，最古人类只有通过他们所制造的几块火石才把他们遗迹遗留下来。法国人类学家曾经根据工具的种类和精粗将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分出许多时期。照这样看起来，人类的历史就从人类的工业开始的。现在，广义的工业的发达的程度恐怕还可以作为一个试验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准和研究文明变化的线索。

大的当七千年或一万年以前，欧洲最后冰层退去之后，就有所谓“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出现，有种种经过磨光的石器、陶器、农业和家畜。这个逐渐使用金属工具以前的时代，好像新旧世界都经历过。这是在埃及、巴比伦文化还没有发生以前的时代。四百年前欧洲人所看见的美洲土人的状况还是如此；现今在世界的各地还有这种原始文化继续存在。要向儿童们生动地说明人类文化发展那一个中间过程，应该没有什么困难的。这个时期的文化，从类人猿的眼光看起来是如此复杂；但是从希腊、罗马人的眼光看起来却是如此简单。

最近关于古代埃及文化的许多发现证明了：在公元前四千年以前已经有一个超过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在那里出现。当时已经有了一种写起来很快、形式很美的文字发达起来，开始用铜制作器皿，而且将它淬制坚固以后，还可以用它制造工具。古代埃及人看起来好像是一种辛勤劳动、非常实际的人，对于商业颇有兴趣。所以在他们所留下来的图画里面，最突出的是司账的人。埃及的艺术和当时的环境和工业有密切的关系。布荣斯提德曾经说过：“埃及人的匙柄上刻有荷花，他们的酒斟在荷花式的深蓝色杯子里；他们卧床的四柱是用象牙刻成牛腿形，他们房屋的天花板上刻有星辰，下面有形像棕树的柱子架着，柱子的上端刻有低垂的树枝。”

至于希腊人的工艺也可以很容易地和他们的艺术和人生观联系起来。这样，可以对希腊人的特点要比普通只讲政治和战争的历史教科书里面所说的更加显著。我们现在还有许多希腊时代留下来的可爱的花瓶、酒杯、大盘、手镯、耳环、镜子等物。我们对希腊人的家具以及他们的神庙和剧院便可以形成一个极好的概念。

希腊人虽然比以前我们所知道的人重视美的东西，但是一班有闲阶级对于体力劳动却是非常鄙视。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手工业生产完全由奴隶去做。奴隶阶级常常用战俘来补充，人数很多，足够制造所有的必要商品。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的有名的一章中说：奴隶制度是符合于自然的，因为世界上常常有一大部分人除了做奴隶以外，并无其他用处。虽然他也承认有许多人应该是自由的，因为运气不好，以致沦为奴隶；有许多人是天生的奴隶。高尚科学的目的并不在于实用，他们的尊严就是为此。只有那些不用手去劳动、有暇用心的人才可以研究高尚科学。辛尼卡竭力反对各种实用的技术是由特殊天才的人所发明的那个观念。他说这都是最下流的人们的粗野设计，而且应该由奴隶去做。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中也曾说：好像所有可能的而且有用的技术都早已发明了，再也没有了。所以在古希腊时候，哲学家的意见同奴隶制度的存在联合起来贬低工业的地位。因此，有人用他的手和脑去做有用的东西的时候，就要被人家藐视。越是不做有用的东西，他愈有希望上升到一个人，和一个哲学家的高尚地位。

罗马人的工业是从希腊传下来的，后来又流传给中古欧洲，在这过程中根据当时社会风尚，生活习惯的变化有了一些改变。到了十二世纪时期，城

---

最后冰层北退时，约在公元前 15000 年。——译者

此期约在纪元前 7000—2000 年间，在此时期，人类开始能制造磨光石作工具，并且发明制陶的技术。——译者

美国著名埃及学家（1865—1935 年），著有《埃及史》、《古代埃及史料汇编》等书。——译者  
古代罗马哲学家，曾任皇帝尼罗的师傅，属于斯多噶学派，于公元 65 年为尼罗所杀。——译者

市兴起了，各种手工业行会同时也发达起来。各行业的师傅们在政治上也逐渐获得较为重要的而且尊贵的地位。普通的手艺人也已经不是奴隶或农奴了。因此，自希腊罗马以来，对于手工艺方面那种轻视的态度于五六百年以前在西欧一带已经消灭了。这种工业恢复的开始，在当时的以职业为姓氏那种习惯上得到了反映。当时人对于下面这种姓字已经不觉得耻辱了，如裁缝、辘轳匠、织工、五金匠、漂布工、桶匠、酿酒匠、箍匠、烛匠、弓矢匠、陶器匠、制角匠、鞣皮匠等。

自十三世纪以来，大家才知道工业有时可以用新的发明去加以改革。例如熔铁的方法发明以后，铁器可以铸造了，不必像从前那样非锻制不可。炼术士想找出一颗金丹来，能将黄铜变成黄金，或者将黑铅变成白银，以使人们长生不老。他们忽然发现了一些意外的物质，因此就奠下近世应用化学的基础。但是在十八世纪以前，在工业上还没有显著的变化。当路易十五世时期，发明家虽然很多，但是西欧方面的人还是使用旧日简陋的方法纺纱织布。货物的运输还是全靠很迟缓的笨车，从伦敦到罗马的书信，费时之多还是和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一样。

但是当时有思想的人已经逐渐发现了两个真理。第一是那些平常的、普通的、平淡无奇的事物的重要性。第二是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对于普通事物的知识来提高人类的幸福。上古和中古的思想家对于物质世界都没有注意。他们远远地离开自然界，如培根所说：“专在他们自己的理想和谬见里面翻来复去。”他们不在那个大世界里面去寻求真理，而专在他俩的小脑袋里面去寻求真理。当有些第一流的人物放弃了真、美、善和三位一体中彼此的关系这类问题，而去研究牛乳怎样在热的气候里面容易变酸，或者研究何以通过玻璃杯看到的東西特别放大等问题，他们的态度就已经从旧的过渡到新的方面来了。

在十七世纪以前，欧洲人还没有大规模地用我们近世的研究精神去做细密的观察、实验和计算。从此以后，知识累积的增长和利用知识来增进人类幸福的进步，实在是史无前例的。关于近世无数的重大发明和这些发明对于我们生活所引起的革命变化和我们的进步观念，我们此地即是加以概括的叙述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历史事实比从前所谓正统的历史书中所记载的君主、武功、条约、国会的讨论和立法更加具有吸引力和重大意义了。

并且，如果我们将这些事实清楚地表示出来，那么，关于蒸汽机所引起的巨大变化一定可以激起青年的兴味，因为机器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比自古以来所有君主和国会的一些命令更加重大得多。1704年，英国人纽康门发明了一种蒸汽机，用来抽水很笨重，效力不大，人们对它并未抱着很大希望。但是后来成为世界史上一个最大的革命力量。使用这个蒸汽机抽水，工人俩能够控制矿坑中的水，使它不再成为采取煤和铁的障碍。有了铁才可以造新机器；有了煤才可以运转新机器。既然有了煤、铁和蒸汽，所以无论新的或旧的产品都可以空前地增加。而且既然有了煤、铁和蒸汽，就可以把各种物品输送到世界各地去。用机器装备起来的工厂出现了，以工厂为中心的城市兴起了。于是人类的工具重新成为人类进步的动力和标志。近一百五十年来的变化，比过去五千年来的变化还要巨大。正如过去人类用了一根本棍同一

---

法国国王（在位年代 1715—1774 年）。——译者

英国著名发明家（1663—1729 年）。——译者

块火石作工具，人类就开始了知识的发达；近期有了蒸汽机，于是人类的活  
动、利益和社会及道德问题就开始扩大起来，不知何日才达止境。

正如我们所深刻而悲惨地感觉到的，工业革命虽然增加了我们的幸福，  
扩大了我们的知识，因为交通方便的缘故，使我们世界各地更加容易到达，  
彼此接近，但是工厂里面工人的情况恐怕比希腊、罗马的奴隶更加恶劣。不  
过，我们不能过分地希望西欧一方面产出一种物质状况上的空前变化，另一  
方面又要免除了这些变化所引起的流弊。长时间的劳累，单调无味的工作，  
重复那些因分工制度而带来的琐碎工序，这种分工制度虽然提高了效率，但  
是降低了兴趣。再加以微少的而且不稳定的工资和种种联带而来的恶劣状  
况，这都是现代工业上的严重缺点。

对于这些缺点，以下的情况使我们有迅速改良的希望，那就是我们现在  
已经有了一种社会公平的观念，即对于经济和社会措施的更加重和对民主  
教育的热心。中古时代那种没有思想的慈善事业到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有组  
织的社会事业，这种事业是由人类的同情和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的产物。假  
使机器发明产生了一种新的奴隶制度，那么，机器发明也能产生一种消毒  
品。因为有机器的发明，对人类的贫困——即无衣无食无住所——有完全  
废除的可能。因为现在的人类拥有足够的蒸汽、电气等等能供给人类生活  
上的需要。如果加以适当的分配，就不会有人还缺乏日用必需品。更加重  
要的是和工业革命同时产生的尊重劳动的看法，这是亚里士多德所不明白  
的。托尔斯泰这班人不想有一种脱离劳动的一种完全无缺的生活，反想  
将劳动同余暇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快乐的理想生活。生产的劳动，如果在适  
当的状况下，有计划地去进行，而且工作的期限要适合于工人的体力同其  
他生活上的责任，那对于身心性格都会产生最好的结果。我们虽然还没有  
达到这个快乐的地步，至少我们再不会藐视劳动，我们也不以为体力劳动  
是耻辱的。

我们现在再研究以上所说种种问题和工业教育的关系。工业教育本身就  
是我们以上所追溯的长期历史过程的最近产物。据我看来，我们上面所述  
的那些事实，就是我们急需使工业学生知道的事实。这种教育可以使他们  
具有一种人生态度，这种态度不但可以使他们成为最好的工人，而且可以  
使他们对于他们的工作有个明智的理解，使他们协力帮助清除他们所遭受  
的那些工业上的流弊。怎么样能够将上面所述的种种的历史的研究很容易地  
、永久地而且很自然地印入学生的头脑之中呢？这种研究不但可以满足接  
受工业教育的学生们的特殊需要，而且可以提供一种最好的、唯一的方法  
去扩大他们的眼界，提高他们的道德知识水平和对于进步的热心，这种热  
心只有把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才能产生。



## 第六章 “罗马的灭亡”

—

历史学家写书时往往对于时代的起点和终点，感觉困难。为了他自己和读者的便利起见，他常将历史分为几个时期。既然选定了起点同终点以后，他就极力地说明分期的标准很有理由。他知道得很清楚，假使他是一个近代史家，尤应知道他这种分期的方法，实在勉强得很。他一般地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为了要替分期的方法进行辩护，因此他对历史分期的不科学性就諱莫如深。这就是普通历史学家的正规办法，他要把历史发展的速续性和在叙述上的条理性调和起来，因而他就隐瞒了他对历史的真实性的冒犯。我们对于旧日的历史学家可以加以原谅，因为“历史的连续性”这个观念，本来是近代的产物——十九世纪的产物。从前历史学家都以为英雄人物，著名战争或上帝的干预，常常骤然来打断人类事业的进展。这种观念，只有当历史学家专门注意过去特殊的事件才能维持。但是一旦历史学家要来注意全部关系人类利害的事情和对人类具有永久性的事业，而不是去注意那些偶然的和过渡性的事件，他就会看出人类一般的变化一定是迟缓的，——非常迟缓的。

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就是所有高等文明体系都是异常复杂的。假使我们想到五世纪十世纪或十八世纪时候全部人类的兴趣，就会知道一个人、一次战争、或者一个条约断不能立刻将当时宗教的、知识的、美术的、科学的、语言文字的、工业的、商业的、法律的、军事的、政治的、思想和习惯统统改变。一次战争，或者一个条约也许可以改换一个国家的君主：一种很厉害的瘟疫也许可以影响他们的经济状况；但是在历史上看起来，没有一次骤然的变化改变了大部分人类的习惯、风俗和制度。

历史连续性的第二个原因，是人类的情性和缺乏思想。这两种心理的特点很可以说明为什么虽然在一个范围里面发生了一个骤然的变化，但是有许多旧的东西仍旧遗留到新的时代。最显著的事例，就是法国虽然经过一次大革命，但是许多十八世纪法国政治的特点仍旧存在于现在法国政治生活里面。

从上面几件事实看来，我们对于传统的“历史分期”方法，不能不表示怀疑。因为这种方法，以前的人虽然赞成，但是到了现在，实在没有可以辩护的理由。

无疑地，我们自小就养成这个观念，以为罗马灭亡以后，中古时代就开始了。经过一个长期的黑暗，人们发现了希腊、罗马人的著作，人类好像从冬蛰中醒来。这就是文艺复兴时代，它为引起近世精神觉醒作了准备。至少新教徒是这样相信的。继起的危机就是引起大众注意的法国革命。我们普通所用的教科书和高等学校的历史课程还是根据这种分期的方法。

每个有思想的历史学家都知道这种分期方法的缺点，他很知道要断定中古时代起源的困难。特别是近世史应起于何时，那就更难确定。至于“革命”，我俩好像还是在革命之中。但是普通历史学家往往不知道这种分期所引起的恶果。上面所指的那些“时期”，不但需要加以批评，而且表现对于过去一个完全错误的看法。

近世历史学家慢慢地知道，全部西欧的历史的分期以中古初期和中古末

期间那个分界为最明显。当十二世纪时，欧洲人对学术兴趣的觉醒推动了大学的建立，罗马法的复兴，教会法的编订，基督教会初期著名神父神学理论的整理，此外还有城市生活的发达，商业的扩充，哥特式建筑的兴盛，和优美的方言文学的发达。

到了十三世纪的初期，欧洲学术界的注意慢慢地集中到古代最大的哲学家。他的著作重新传播于西欧学者的面前。所谓文艺复兴，它的成就实在不能同十二世纪及十三世纪的成就相比较。虽然当十四、十五世纪的时候，在意大利诸城市发生了一种和昔日大不相同的有趣味的文化和惊人的美术。但是，这种文化和美术的出现使我们对于那个时期的变化估计过高。当时的贡献对于一般的变化影响并不太大。照我们要建设历史继续原理的人看起来，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家、哲学家，甚至美术家，都表示出在学术上一种非常保守的精神。他们很少能够超出古代的迷信，对于世界知识贡献很少，而且常常受到新柏拉图派神秘主义的迷惑，如费西努、皮科和鲁克林等，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前边曾经说过，我们可以读古人的著作，但是我们的心理态度，不一定就因此变成希腊的。我们可以断言，当我们对于中世纪时代的知识和我们对于自己时代的认识提高之后，我们就会感觉到文艺复兴时代这个时期，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特点，就逐渐消逝了。但是现在许多历史学家还把文艺复兴时代看作一种光明的精神照耀着欧洲，感动了这个著作家和那个画家和建筑家，而其余的人则留在中古黑暗里面。

对于要断定近代史开端的人有三个历史事件可以拿来作为很好的起点：第一是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第二是1492年新大陆的发现，第三是1517年路德张贴他那篇攻击赎罪券的论纲。但是这三个事件，实在并不像大家所想的那样重要。有人以为君士坦丁堡陷落这件事逼迫着希腊学者逃到西欧去教授希腊文，以资糊口，因此恢复了古代学问的知识，并引起文化的提高。这种看法是经不起我们细加研究的。希腊学问的复兴，在君士坦丁堡没有陷落以前五十年，在意大利方面已经进行了。当时奥里斯帕和费里托这班人已经从拜占庭带了许多希腊手写本书籍，意大利的人文学者已经在那里辛勤地进行翻译。虽然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有少数希腊学者逃到西欧去，但是我们看不出西欧方面人文主义的进展因此就受了什么影响。所以从学术的和文学的观点看来，君士坦丁堡陷落这件事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至于美洲的发现，我们要知道美洲并非真正发见于1492年，因为哥伦布直到死的时候，还以为他是由水路到达了印度。一直到1610年，亨利·哈德森还希望要从哈德森河达到太平洋。按照现代我们的看法，一个新半球的发现一定会引起眼界的扩大。

但是哥伦布的航行的重要性，在欧洲人心目中，认识得很慢，以致在数十年间并未引起重大影响。

至于路德关于忏悔的意义那篇经院哲学式的论纲标志着世界史一个新时

---

指亚里士多德。——译者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学者（1433—1499年）。——译者

德国著名人文主义学者（1455—1522年）。精通希腊文及希伯来文。——译者

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1398—1481年）。曾在君士坦丁堡学习，精通希腊文。——译者

英国著名航海家与探险家，于十七世纪初年在北美探险，约死于1611年。——译者

代的开端。虽然在此以后十五年至二十年间，北欧方面有几个国家脱离了罗马教会，并且反对罗马教皇的统治，但是路德那篇论纲虽不能说他不是这种状况的一个推动力量，但是对瑞士和英、法诸国并没有发生什么直接的影响。

## 二

在普通历史教科书同标准的历史著作中，历史的分界最显著的莫过于“罗马灭亡”这个事件了。大家都认为“罗马灭亡”这件事在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日耳曼民族侵入了罗马帝国、自奥古斯都开始的罗马帝国的皇统于公元476年断绝了。普通人以为西罗马帝国的瓦解是欧洲一系列的重大变化的开始。这种意见虽很自然，但却是很错误的。日耳曼民族的侵入虽然引起许多重大的结果，但是这些结果都是逐渐发生的。实在说起来，在中世纪初年，欧洲方面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变化。失去的旧东西虽然很多，增加新东西的却是很少。许多中世纪时代的特点——如僧侣、圣人和神迹；寓言与象征；七艺；罗马基督教会和它的特权以及其与政府的特殊关系等等——在410年阿拉列克攻陷罗马以前已经很发达了。所以“罗马灭亡”这件事至多也不过是一种极为肤浅的分界，仔细研究起来，就要失去以前历史学家所给予的那些重要性。历史的连续性比当时的变革显著得多。下面所述的就是公元五世纪时期的详细情形，可以表明传统历史分期方法的危险性。

当公元398年狄奥多西大帝死去时，罗马帝国还是统一的。当时帝国有一种很复杂的官僚机构担负统治责任。我们如今还有一张当时的职官表流传下来。百年以后，帝国的西部已处于瓦解状态。当时罗马帝国里已经有法兰克、阿尔曼尼、伯坎底、西哥特、东哥特、汪达尔等族的国王统治着大小不等的国家。

我们要详细追溯罗马帝国瓦解的过程已经是不可能了。实在说起来，当时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如此粉歧、如此缓慢，以致即使我们对于五世纪的事实，好像对于十九世纪那样清楚，也不能将当时的革命说得很清楚。因为这个革命本身是曲折的、晦暗的。但是，我们就连最突出的、最惊人的政治事件，还很不明白，对于当时的情况也很模糊。过去许多著作家如吉本、霍德金等人竟将当时的许多人物同事实详细地叙述出来。他俩同其他著作家竟对帝国“灭亡”的原因，作出许多解释。我有一个朋友，近来为了好玩，曾经将各种历史教科书里面关于帝国灭亡的原因搜集起来加以统计，居然得了五十个。这些理由当然都是猜想之词。就连那几个一般承认的理由，如帝国人口的减少，日耳曼族的勇敢善战，与精力的充沛等等，据古朗日说也都是毫无根据的。

本章的目的是：第一，要把关于五世纪的史料性质简单地研究一下（所有这些资料在美国较大的图书馆中，很容易找到）。第二，要说明当时著作家所见到的罗马帝国瓦解的表面过程。我对于395年所谓罗马皇帝狄奥多西把帝国分为两部那件事要特别说明一下。再说一说公元410年阿拉列克攻陷罗马以前的事情。最后再说明公元476年所谓“西罗马的灭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

这些都是日耳曼人在西欧所建立的国家。——译者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1830—1889年）。著有《古代城市》及《古代法国政治制度史》等书。——译者

### 三

第一，关于此时期的史料，最可信的当然是《狄奥多西法典》和它的补充，即所谓《新法》以及《查士丁尼法典》中所保存的法律条文和政府命令。这几种法典里所载的命令，一部分是颁发于五世纪的。他们很可以说明罗马帝国的组织和它的积弊；其中并且往往载有官吏的姓名，有时还记载事实。可惜这种命令都采取一种华丽的、讲演式的文风，因此我们要明白它们，不能不费一点功夫。

关于五世纪的历史，当时没有很好的著作家，像朱理安皇帝的名将阿密尼那斯·马西里努斯那样能够将四世纪以前的事实记下来。这是一部很好的历史，一直记到378年皇帝瓦连士败死于阿德里亚堡为止。过了一百五十年的样子，才有一个好著作家普洛科庇乌斯将查士丁尼对哥特人、汪达尔人和波斯人的战争记载下来。他的著作至今犹存。在他们之间，我们知道有好几种历史著作，但是完全传下来的，大部分都是研究教会的东西。我们对于阿密尼那斯以后三十年的历史，不能不依赖邹西穆斯。他是罗马帝国东部的一个官吏（伯爵），他的著作好像是在五世纪的后半期写成。他的著作的最后部分已经失去了。所以阿拉利克陷落罗马以前的事情忽然中断了。他痛恨基督教徒，他把当时种种的不幸都归咎于罗马人抛弃了旧日保护国家的那些神，而信仰基督教。

有几个较好的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的残篇流传下来，其中最著名就是福提乌斯。他本是君士坦丁堡的一个主教，生活在九世纪后半期。他一生的困难很多，但却利用余闲的功夫将他自己的藏书编出一种简单的提要。所以我们现在至少还有一种当时著作的提纲。例如奥林庇道鲁斯所著的历史是从狄奥多西死后说起的，这就是邹西穆斯历史的蓝本。另外有一个提纲的纂辑者，就是很有学问的皇帝君士坦丁·波菲罗吉尼杜斯。他曾经下令将所有最好的历史著作中值得保存的材料，都搜集起来，汇为一编，分为五十三卷。这部大书现在已经残缺，其中有两卷关于重要使臣往来的记载是重要的。举一个例：关于五世纪一段最好的历史保存下来了——即普里斯古斯叙述他去拜访匈奴王阿提拉的一段记载——就是这个热心学问的皇帝的功绩。还有一段也是他保存下来的，就是六世纪的时候马尔丘士所说的奥多瓦卡于476年派使

---

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他于公元527年命特里鲍尼等人编纂罗马帝国法典，结果编成《查士丁尼法典》、《法令汇编》、《法学阶梯》及《新律汇编》等书，合称《罗马民法法典》。——译者

阿密尼那斯·马西里努斯（约330—390年）。曾著《罗马史》迄378年皇帝瓦连士战死。——译者

希腊历史学家，著有《皇帝查士丁尼战史》。公元565年卒。——译者

希腊人（408—450年）。著有《罗马皇帝本纪》一书，自奥古斯都起至公元410年止。他把罗马国势衰微归咎于放弃罗马人的旧教。——译者

五世纪希腊历史学家。著有《西部帝国史》，用希腊文写成。——译者

君士坦丁·波菲罗吉尼杜斯，东罗马帝国皇帝，（即君士坦丁七世，在位年代913—959年）。著有历史及政治的书籍。——译者

匈奴王，公元451年为罗马联军击败于沙龙。——译者

本系蛮族，后人罗马任禁卫军官，废奥古斯都鲁斯，自掌大权。公元493年被东哥特王西奥陶里克刺死。——译者

臣到君士坦丁堡那件事。

有几个教会的历史学家自中古以来到现在还是有名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奥罗修斯。他在少年时代曾受到奥古斯丁的鼓励，著了一部世界通史，他的目的就在于攻击深信异端的民族。他说他的宗旨是搜集过去历史上各种天灾人祸——如战争、疫疾、饥馑、地震、水灾和种种大罪恶——条分理晰地来说明在基督教没有传入欧洲以前，当大家还是崇奉异端神道的时候，世界上并不比以后幸福。他那部《七卷反对异端史》最后的十余更是叙述五世纪最初十八年间的事情。他所说的事实，他以为人人都知道，他的唯一目的是证明敬畏上帝的人一定得到幸福；相信旧神的人就要遇到死亡。所以我们对于他的著作不能过分重视。他的著作的可信程度和今天那些职业传教士的从人听闻、浮夸浅陋的说教差不多。

关于五世纪的头六十多年间，我们有几个希腊教会历史学家，那就是苏格拉底、苏邹密努斯和狄奥多利等人。他们最注意的是导端、僧侣、神迹这类东西。关于当时的事突反而不十分注意。对于当时的政治史，叙述得尤其少。

在中古时期的编年史里，虽然编纂的人很喜欢给我们一种历代执政官的名单，而且有好些年代没有记载，但我们有时也可以搜集到几段很简单的记载。但是从普罗斯波 的著作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种提示，他生在五世纪，他的偏年史叙述到 454 年。至于马西利那斯在查士丁尼时代所著的历史，蒙森已经把他的残篇搜集在一起。不过这一类的史料异常模糊而且难读。

还有基督教圣徒的传记，虽不很经常但有时也提到当时的事情。埃努丢斯约在公元 505 年所作的《帕维亚主教埃庇汉纽斯传》里，就常提到理西美、奥瑞斯提斯、奥多瓦克这班人和当时扰乱的状况。当时的史料如此缺乏，所以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不竭力去利用各种暗示，甚至不能不利用当时人的诗和当时人所作的颂赞。

在六世纪初年，有一个克劳底安 曾经写了一篇极好的六音步的颂揭斯提利古 的赞。但是他的论调不但太偏，而且因为他这篇文章原来是一种韵文，所以不能将真实的事迹叙述出来。我们普通以为阿拉利克从蹂躏希腊归来以后，罗马政府曾经命他作一个罗马官吏，这种说法就是从克劳底安的两行诗里得来的。

在五世纪后半期，有一个很有名的著作家，叫做阿波利那利斯·西多尼息斯。他前后赞美过好几个罗马皇帝，第一个就是他的岳父阿维杜斯。他所提到的事实，没有克劳底安那样明白可靠，也没有那样简明清楚。但是现在仍保存静多西多尼乌斯的信札，读了一遍，就可以知道五世纪后半期的法兰

---

四至五世纪东罗马教会史家。著有教会史，述 406—439 年间事。——译者

五世纪东罗马教会史家，著有《希腊教会史》。——译者

安提阿克教会史家（390—457 年）。——译者

高芦人，生于五世纪，著有编年史。——译者

罗马蛮族军官。公元 456—472 年间统治意大利，曾立皇帝四人。——译者

班诺尼亚人，是皇帝罗摩罗斯·奥古斯都鲁斯之父。后为奥陶瓦卡所杀。——译者

公元四世纪时期著名希腊纪事诗人。曾著《斯底利克武功颂》。——译者

汪达尔族人，任罗马军官。皇帝奥多西死后，他统治罗马西部。403 年在拉维那被刺死。——译者

生于公元 430 年，卒于 487 或 488 年，472 年为主教。——译者

西虽然有伯坎底人、高芦人和法兰克人，但是有人仍旧可以进行文学的研究和在美丽的农庄中避暑。除了他的信札以外，我们还有教皇利俄一世和埃诺丢斯这班人的书札保存着。

#### 四

我们现在将罗马帝国分裂这件事研究一下。普通以为罗马帝国自从公元395年狄奥多西死后，分为东西两部；东部传给他的大儿子阿尔卡狄乌斯，西部传给他的小儿子荷诺里乌斯。这个观念印人普通读者的脑中如此之深，教科书里面复述这句话如此之普遍，我们在此地可以不必再去细加叙述。我所以从两种最通行的教科书里面引出后边两段文字，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的课本错误还多，实在是因为他们最可以代表那种谬误的观念。

“自狄奥多西死后，其二子阿尔卡狄乌斯与荷诺里乌斯再度将帝国分为两部。从此罗马帝国事实上就永远分为东西两部，欧洲历史上遂有东西二帝国之称。东帝国存在了千余年，而西帝国不到一百年就亡了。”

另一位作者，在用大字印的“帝国的最后分裂”的标题下，叙述如下：“狄奥多西在位之日是罗马帝国最后的统一时代。自公元392年至395年，他是唯一的皇帝。他临崩之际，将帝国分给他的两个儿子，阿尔卡狄乌斯及荷诺里乌斯。长子年十八，分得帝国东部；次子年十一，统治帝国西部。这是罗马帝国最后的分裂——这是大国分离趋势的结果。东西二帝国在历史上的分裂从此开始”。

上面所引的两段文字，其中最严重的错误有三点：（1）罗马帝国并没有分裂过，它始终是一个国家；（2）狄奥多西并没有作过罗马唯一的皇帝；（3）东西二帝国在历史上的分裂并不是从狄奥多西开始。当时人对于阿尔卡狄乌斯和荷诺里乌斯承继他父亲的帝位这件事，并没有感觉奇怪，因为阿尔卡狄乌斯在他父亲未死以前，已经作过十一年的皇帝；荷诺里乌斯也已经作过三年皇帝。在当时法典里面还保存下许多命令，都是用父子的名义发布的。关于帝国分裂这段事实，说的最详细的恐怕要算奥罗修斯所著的历史了。他不过说：“在罗焉建城后1149年，皇帝阿尔卡狄乌斯（他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统治东帝国）和他的弟弟荷诺里乌斯开始共同统治帝国，只是各有各人的都城。”邹西穆斯说的更加明白：“皇帝狄奥多西既分意大利、西班牙、凯尔提卡及利比亚给他的儿子荷诺里乌斯，自己在去君士坦丁堡途中得病而死。”

奥罗修斯所说的当时状况非常正确，因为他根据当时的习惯和狄奥多西法典以及查士丁尼法典来说明的。从公元461年，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皇帝命维鲁斯来协同他统治帝国以后，直到戴克里先皇帝为止，帝国的法律往往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皇帝的名义颁发下来。自从戴克里先以后，数帝并治的局面更加普通；帝国的命令也往往用两个、三个或四个皇帝的名义发布。

罗马帝国里同时有两三个皇帝进行统治，这件事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名词上的矛盾。但就罗马人的眼光看起来，并不如此；因为他们自古以来就惯于有两个行政官或保民官统治全国，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全是一样，不过在责任上稍稍有点区别罢了。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皇帝，他们都是

---

公元440—461年同罗马教皇。——译者

罗马皇帝（在位年代，161—180年）。——译者

最高统治者。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从前那种行政官的关系一样，仍旧用非正式的方法来决定，那就是：儿子当然服从父亲，青年无名的当然附属于年长有名的。

假使我们能够将阿密尼斯·马西利努斯所说当时选举皇帝那件事参考一下，我俩就可以明白当时的状况。我们知道皇帝犹里亚努斯于公元363年在巴比伦阵亡了，承继他的人的维阿努斯几乎是当选之后就死了。

因为有种种不幸的事情，使两个皇帝忽然在那短时间都死了。

当时军队向皇帝约维阿努斯的尸体——预备送到君士坦丁堡去——举行葬礼以后，就向尼西亚开拔，同那地方帝国的文武官吏研究一种应付危周的方法。当时虽有些人怀有妄想，大家都以为非选一个很有威严的，很有智慧的人来继承大统不可。

当时有一种谣言说：一部分人想提出斯古塔里第一区的保民官埃揆提乌斯来做皇帝，但是当时一班有势力的人们不赞成，认为他太粗野；他们的意思很愿意举约维阿努斯的族人詹努利努斯来作皇帝，他本是在伊利古木地方作军需官。但是大家也反对他，因为他现在距离太远。于是大家一致地选举了天命攸归的瓦楞提尼亚努斯来继承大统，因为他的资格既好，而且所在又近。他本来是斯古塔里第二区的保民官，曾留任在安西拉地方，原定他应随后登位。当时对于皇帝的选举，既然没有人反对，所以立刻派人去请他快来即位。中间有十天功夫，罗马没有皇帝。

瓦楞提尼亚努斯到达之后，穿上皇帝的袍服，戴上皇冠，大众欢呼他为皇帝。但是他想演说的时候，四围的兵士忽然大声疾呼，要求他立刻推举出第二个皇帝来。瓦楞提尼亚努斯回答说：“你们要选举一个同事来同我共负皇帝的责任，本来有许多很好的理由，我当然没有疑问。而且我自己是一个庸碌无能的人，对于国家大计，我一人当然担当不了。……我希望运气来帮助我，可以找出一个很聪明的而且极和平的人。”

瓦楞提尼亚努斯到了君士坦丁堡之后，也想到他自己所负皇帝的责任太大，所以决意不再延宕了。他得到大家同意之后——实则没有人敢反对——就带着他的弟弟瓦建士（364年即位，378年卒）到了城外近郊，宣布他是罗马的皇帝，代他穿了皇袍，加了冕，两人同坐车子回到城中去，然而事实上他的弟弟好像是他的僕从一样。

在这个时候，罗马国内战云密布，四边的蛮族都要向他们最近的地区侵入。阿尔曼尼人蹂躏了高芦和拉提亚地方；同时萨玛提人、揆地人又骚扰班诺尼亚地方。还有庇克特人、萨克森人、苏格兰人和阿塔古提人也常来进攻不列颠。此外奥斯托利安人同摩尔人等蛮族又进击非洲；此外还有哥特强盗常常劫掠色累斯一带地方。

冬天过了，两个皇帝和衷共济地——一个是正式选出的，一个是形式上的同僚——经过色累斯到了尼西亚，他们将军权分而为二。此后再到了色米乌木地方又将政权分而为二。瓦楞提尼亚努斯前往米兰，至于瓦建士则回君士

---

罗马皇帝（在位年代361—363年）。——译者

城名，在小亚细亚，为两次宗教大会之集会地，因此著名。——译者

地名，在今亚德里亚海东岸一带地方，即希腊半岛之西部。——译者

公元364年即位，375年本，以善战著名，——译者

城名，在今意大利北部。——译者

坦丁堡。

不久瓦楞提尼亚努斯正在高芦从事战争的时候，忽然生了病，当时就有人提出一个官吏名叫鲁斯提古斯·茹利安努斯的来承继他作皇帝。但是，同时又有人主张拥戴一个步兵的军官塞维鲁斯。

“但是这些计划都没有实现，因为当时瓦楞提尼亚努斯的病，经医疗后已趣好了；而且他自己知道是死里逃生，所以就想传位给他的儿子格拉齐安努斯。因为儿子快成年了，于是就预备传位的事，军队也收买好了。格拉齐安努斯到达之后，他父亲为了要大家欢迎他，所以将他带到一个空旷地方，站在一个高台上面，四周围着一班贵族和官吏，牵着他儿子的手，演说一番，将未来的君主介绍给军队。”

七年之后，瓦楞提尼亚努斯就死了。“当时经过详细讨论之后，议决请他那四岁的儿子——亦名瓦楞提尼亚努斯——来继他作皇帝。这个小孩当时和他的母亲朱斯提娜住在摩罗西搭镇，离都城有一百多哩。当时各方面对于这个议决一致的赞成，就派他的叔父塞克利去请他即位。不久孩童皇帝果然坐肩舆到都城来了。在他父亲死后第六天，他就宣布为新皇帝。当时有许多人以为这次选举皇帝时未得到他们的同意，格拉齐安努斯一定要发怒的。但是事后的一切忧虑都是不必的，因为他是一个聪明而和气的人，他和新皇帝异常要好，而且很用心地抚养他。”

以上几段引文，很可以说明当时选举皇帝和增加皇帝的方法实在很不正式。我们要注意的，要知道当时并没有将帝国分裂为二的企图，皇帝虽然不止一个，但是他们所关心的还是一个统一帝国的共同安宁。

狄奥多西和他两个儿子统治帝国的时候，情形就是如此。当时并没有人想分裂帝国；虽然自从君士坦丁大帝建立了新罗马以来，国都有了两个；但是国家只有一个。虽然有两个上议院，虽然有两个组织完备的皇宫，虽然有许多皇帝，但是罗屑帝国始终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凡有新选的皇帝，一定要恳求他的同事承认他。从狄奥多西以后多每个皇帝每年选出一个行政官；所有国内的法律也是由几个皇帝会街而且同意颁发的。

所以，从习惯上看起来，狄奥多西死后那种分治的办法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且分疆而治只是为了行政便利起见，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并没有建立一个“西罗马帝国”，所以根本没有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回事。

## 五

狄奥多西死后，罗马帝国里有三个最有势力的军官，他们都是日耳曼人或半日耳曼人——斯提利古是汪达尔人，盖那斯和阿拉利克两人都是哥特人。阿拉利克协助过狄奥多西最后的战争。要明了这儿个人的特殊地位，我们只能研究邹西穆斯所记载的狄奥多西死后儿年间他俩活动的情形，因为这部书关于此时期的记载最为详细。我们虽然没有理由可以断定他所说的种种黑暗的阴森都是可信的，但是关于当时一般状况是明显的。他的记载很可以改正我们普通对于蛮族同罗马人种种关系的谬见。

---

在位年代，375—383年。——译者

即君士坦丁堡。——译者



我们要知道，日耳曼人和杂居在帝国以内的各种蛮族——甚至匈奴人——并没有很明显的界限。只要他有一个正当的职业，差不多没有人去过问他是属于那个种族的。狄奥多西以前数百年，罗焉国内的情况同现在美国纽约城的情况差不多。对于外国人并没有因为他是外国人而加以种种不利，也并不故意地加以种种限制。因此当狄奥多西时代，日耳曼人移居到罗马帝国里面，正如现今各国人移入美国一样。他们同罗马公民混杂起来，好像外国人同美国人混杂起来一样，他们急于做一个美国公民。罗马人对于蛮族亦并没有什么界限，而且当时的蛮族也很愿意为罗马帝国去攻打他自己的族人，他们并没有表示出什么民族的感情。我们对于当时下级社会各族间的通婚虽然不十分清楚，但是上层社会的人并不反对异族通婚。我们可举几个例子：狄奥多西的侄女嫁给斯提利古，斯提利古的两个女儿前后嫁给荷诺里乌斯。阿卡尔底乌斯曾经娶过法兰克的酋长班托的女儿攸多克西为后；后来狄奥多西的女儿普拉西底阿又许配给阿拉利克的内弟阿塔勒夫。

邹西穆斯向我们说：狄奥多西大帝即位后，立刻同重要的蛮族领袖妥协起来，异常的优待他们，甚至于萧他们来同他宴饮，他被认为是哥特人的朋友。他同他们要好，曾经派阿拉利克和盖纳斯做他的将军，而且将一部分东哥特人迁住在夫利吉亚肥沃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他这种办法实在是遵循着帝国的习惯，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我们要明了当时全部情形，恐怕要以公元410年阿拉利克攻陷罗马那件事为最好的一个说明。

当时在各蛮族的军官之间的争权夺利已经有好些年了。他们在当时政治上的地位同现在美国市政里的外国政客差不多。斯提利古、盖那斯和阿拉利克三个人，各为自己的利益进行种种活动。狄奥多西死后，阿拉利克马上就侵入希腊，在那个地方斯提利古曾经稍稍抵制他。他就向北去，在罗马军队中得了个官职。他究竟任什么职务，我俩不清楚，因为克劳底安只说阿拉利克是负责管理军械的。斯提利古很活跃，而且有野心，他打败拉达盖苏斯和他的蛮族军队。但是他为了要实现后来的计谋，他故意教汪达尔人同苏维汇人渡过莱茵河侵入高芦地方。至于阿拉利克，他于公元402年曾经侵入意大利，但是被斯提利古的部将扫鲁斯击败。不过罗马政府里面的人没过几年（公元408年）的功夫，就嗾使皇帝荷诺里乌斯杀死斯提利古。邹西穆斯说：自斯提利古被杀以后，在罗马城中的蛮族被杀的很多，因此其余的蛮族就组织三万军队，并且请阿拉利克和他俩联合。

但是阿拉利克不愿意开战，因为他只要有官职，有相当的权力和进款就满足了。他当时准备和罗马皇帝讲和，将他的军队退到潘诺尼亚去。不料优柔寡断的荷籍里息斯不允许他的条件。于是阿拉利克就派人到上潘诺尼亚去，召他的内弟阿塔勒夫带领哥特人和匈奴人回来，他自己率领军队向罗马城挺进，将罗马城包围起来。城中的市民求他解围，就送上五千磅黄金，三万磅白银，四千件绸衣，三千条红毛毡，三千磅胡椒。阿拉利克于是再宣言他自己愿意同皇帝和罗马城联盟去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于是蛮族部队都退出罗马城。但是当他们的撤退时，罗马城中的奴隶，沿途便加入蛮族军队之中，数目达到四万人。我俩从这事实可以看出罗马帝国里面的所谓“日耳曼人”分子，实在复杂。

荷诺里乌斯不愿意同阿拉利克讲和，但是他的宫内大臣朱维乌斯为人较

为谨慎，“他决意派使臣到阿拉利克那边去，萧他到雷温纳来，向他说明罗马政府愿意同他讲和。阿拉利克接到罗马皇帝和朱维乌斯的信以后，他就进驻阿利米努穆，该地离雷温纳不过三十哩。朱维乌斯本来在埃庇鲁斯已经认识阿拉利克，而且同他很要好，立刻去欢迎他。当时阿拉利克所要求的，只是每年要给他多少黄金，多少谷物，而且要允许他同他的蛮族可以住在威尼喜阿、诺利古穆和达尔美喜阿这几处。朱维乌斯当面将这几个条件写下来，同他自己的私信一齐寄呈罗马皇帝，劝皇帝任命阿拉利克作骑兵步兵的司令官，以为如此可以减轻阿拉利克所要求的条件，缔结和约。”

不料荷诺里乌斯仍旧拒绝批准这些条件。阿拉利克因为不能在罗马政府中得到一个较好的位置，发怒起来，决心再进攻罗马城。但是他听得罗马皇帝已经招集了一万匈奴兵援助罗马，阿拉利克后悔他自己作事太鲁莽，因此他派他所占领地方的各个主教去规劝皇帝，教他们向罗马皇帝说：“他俩自己并不想作罗马官吏，只顾住在常常受人骚扰的诺利古穆一带地方；至于一年给他多少谷物，完全听皇帝的便；黄金也不要了；而且他很愿意和罗马人联盟来抵抗帝国的敌人。”这些条件邹西穆斯以为是很合理的了，但是荷诺里乌斯竟不正式应允。这种强硬的态度实在表现了他的愚蠢。

普通只看过“民族大迁徙”这类书籍的读者，对于罗马人早就雇用匈奴人来当兵这件事，一定要感到惊讶。就是对于阿拉利克命教士同罗马皇帝办交涉，如此客气，如此审慎，也一定要感到惊异。实在说起来，阿拉利克住在罗马帝国里面恐怕已经多年了，他同其余的罗马官吏实在没有蛮族或非蛮族的区别。只要能够得到一个同斯提利古一样的地位，他显然就很满意了。

阿拉利克既然受到荷诺里乌斯不接受他的条件的耻辱，他就再度进军包围罗马城。他将罗扁同非洲的交通断绝了，而且要求罗马市民同他联合去攻击皇帝。当时皇帝已逃往雷温纳。

邹西穆斯叙道：“罗马的上议院召开会议讨论应付的方法。他们对于阿拉利克的要求，一概承认了。他们欢迎他的使臣，而且请他到罗马城里来。同时并遵照阿拉利克的命令，请罗马城的市长阿特卢斯穿上紫色皇袍加冕，即皇帝位。阿特卢斯于是任命兰帕底乌斯做宫内大臣，任命马西阿努斯做罗马城市长，任命阿拉利克同从前统带达尔美喜阿军队的军官名瓦连士的做司令官，并任命其他种种文武官吏。”

阿特卢斯并且宣言要征服全世界，罗马人听得这句话，“非常的欢喜，以为不但得着许多熟悉政务的官吏，而且对于特图鲁斯被任为执政官一事，尤其满意”。但是不料阿特卢斯不能维持罗马同非洲间的交通，城中粮食的来源断绝，因此阿拉利克立刻废黜了他。阿拉利克将他带到阿利米努穆城中，掠夺了他的皇冠和紫袍，将袍冠送还罗马前皇荷诺里乌斯。

照上面所述的看来，阿拉利克侵入罗马的时候，并不是带了一般西哥特蛮族来横扫帝都，他实在很想用和平方法去实现他的目的。当他对于他自己所选择的皇帝没有办法的时候，他还是愿意同荷诺里乌斯重开谈判。上面邹

---

意大利东北海滨城市，为罗马帝国西部国都凡三百五十余年。——译者

在古代希腊的西北部。——译者

在今意大利东北部。——译者

古罗马的一个省，在今奥地利南部，沿多瑙河一带地方。——译者

在今南斯拉夫西部沿海一带之地。——译者

西穆斯所叙述的辞情，恐怕是根据当时一个希腊的历史家奥林庇多鲁斯的著作而来的。他叙述到此地，忽然中断了。后来阿拉利克为什么再围罗马，我们就知道了。

以后来吉本对罗马陷落那件事，用去了好几页的篇幅，作了详细的叙述。他这篇文章大部分是出于他自己的想像。关于这件事，我们从当时人的史料中所能得到的知识是很少的。奥罗修斯当时是一个青年人，他要证明基督教并没有促进罗马城的陷落，相反的，基督教实在保护了罗马城中的许多人。他曾经举了一两个例子，证明哥特人对于当时的礼拜堂很是尊重；而且他说蛮族烧了几座房屋后，第三天就退出去了。他在这事发生不到十年以后写道：“这件事虽然过去没有几年，但是到了现在，罗展城中除了少数断井颓垣以外，没有人会想到罗展城中曾经发生什么变化。”

阿拉利克占据罗马城后五年，罗马城的市长鲁提琉斯·那玛夏努斯作了几首诗，赞美罗马的荣耀：以为罗马城雄踞泰伯河上，好像世界上一个美丽的皇后。他对于最近罗马的扰乱并无伤感，并且预言说罗马城将来一定为永久的大一统的帝国。

过了一百年，到查士丁尼时代，有个历史家普洛科庇乌斯在他所著的《汪达尔战记》那部书里面，叙述了阿拉利克攻陷罗马城的事实，同上面邹西穆斯所说的完全相反。他说：有许多人说阿拉利克曾经以三百个美少年送给罗马城中的贵族，这班青年当他们的主人吃完晚饭入睡后，就将城门打开。但是他说另外有人说：开城门的人实在是一位上议院议员的太太名普罗白，她看见城中一班可怜的贫民，差不多要到人相食的地步，所以叫他的奴仆在夜间将敌人放进来。

吉本自己说：“从普洛科庇乌斯那段不太可靠的记载，提出了一种似乎可信的情形。”这种作法的结果当然是靠不住的。普洛科庇乌斯关于此事的两段记载，不但不确实，而且是自相矛盾的。此地还可以提到我们常常听见的荷籍里息斯和他的母鸡“罗玛”。那段故事，也就是从普洛科庇乌斯来的。这段轶事虽然没有多大历史上的根据，但是因为它异常有趣，所以值得永远记载下来。

阿拉利克不久就离开罗马南去，他要去维持罗马同非洲的交通，因为罗马依靠非洲的食粮供应，但中途就死了。继他而起的是阿塔勒夫，他娶了原来作为人质的荷诺里乌斯的妹妹为妻，先后在意大利和高芦进行了种种和阿拉利克一样的政治上的阴谋诡计。阿塔卢斯再度被立为皇帝，再因失败而被废。所以奥罗修斯说这个懦夫是哥特王的一个傀儡，他们立他，废他，又立他，又废他。奥罗修斯还记载着阿塔勒夫曾说过：

“最初我竭力主张应该把罗马的名字毁掉，它的领土应该变成哥特人的帝国，并叫作哥特帝国。我希望“罗马尼亚”这个字也该变为“哥特西亚”，而且阿塔勒夫应该成为皇帝。但是照我的经验看起来，这班哥特人放纵惯了，不会遵守法律。没有法律，就没有国家。所以我现在采用一种比较稳健的方法：就是用哥特人的精力来恢复而且增加罗马的名誉，我希望由此取得光荣，永垂史册。并且希望后代的人当我是一个恢复罗马的发起人，因为现在我不能变更帝国的国体。”

## 六

邹西穆斯和奥罗修斯的记载都到此为止，关于五世纪的史料，就异常缺乏了。所有的编年史里的记载都十分简略。普洛科庇乌斯的著作，因离当时已远、很不可靠。但是以后蛮族首领同罗马皇帝往来交涉的情形，和斯提里古及阿拉利克时代差不多，这是很清楚的。至于那西哥特人诸王能够维持罗马旧日的政体和法律，这也是很显然的。关于伯坎底王国的事情，我们所知道的很少。至于北非洲汪达尔王国的历史，大半都是正就基督教徒所著的居多，而这些基督教徒又是最反对当时蛮族所信的那种阿利安教派的，因此对汪达尔人偏见很深。

在意大利方面，从斯提里古以后，最重要的军官莫过于“执政”阿伊喜乌斯这个人。他曾在匈奴王宫里面供职多年，并且作过匈奴雇佣兵的将领，而且很有资格去组织联军，于451年在东高卢地方击败阿齐拉。他的继任者是利西美尔，也得了执政的称号，在政界中好像纽约城中的政党老板一样，有很大的势力。

从公元455年无能的瓦楞提尼亚努斯三世死了以后，西部罗马的皇帝一个紧跟着一个以惊人的速度继位。据说马克西穆斯就是杀死瓦楞提尼亚努斯三世的凶手，不到几月他自己也被杀了。在这一年阿维杜斯来作短期的罗马皇帝，他就是西哥特王狄奥多利克二世所支持的。但是当时汪达尔人已经要从非洲来攻罗马城，必须选出一个能干的人来做皇帝。因此作为后台老板的利西美尔就同意选出马吉利安做皇帝（在位年代455—461），他本来是个很好的军官，而且曾经与利西美尔同过事。他尽力去澄清当时的吏治，因此群众拥护。但是后来利西美尔见他声望过高，不满意他，所以在461年，就请西维鲁斯来代替他。西维鲁斯在位不过四年，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们无从考究了。西维鲁斯死后，利西美尔不再另选皇帝。二年以后罗马东部的皇帝利俄才同安西米乌斯联姻起来。我们在恩诺底息斯所著的《埃庇法尼乌斯主教传记》里面，可以看出新罗马皇帝和那利西美尔的关系。据恩诺底息斯说：利西美尔在帝国里面的地位仅次于安西米乌斯。利西美尔认为安西米乌斯是一个滑头，而安西米乌斯又以为利西美尔是一个不容易对付的蛮族。到了472年，利西美尔另外又立了一个皇帝奥利琉斯来对抗安西米乌斯。但是就在这一年，两个皇帝都因病死去。翌年有个新的候补皇帝出现，这就是哥利西里乌斯这个人，他本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军官，而且又有伯坎底国王的援助。同时住在达尔美喜阿的一个军官茹利息斯·尼波斯得了罗展东部皇帝西诺的允许自称皇帝。照编年史所说，哥利西里乌斯在罗马附近的波都斯地方作了主教，尼波斯作了皇帝。利西美尔死后，又有一个很有经验的蛮族领袖俄利斯提斯来作执政官，这人本来作过阿齐拉的秘书。此时罗马西部虽然已经有了两个皇帝，即哥利西里乌斯和尼波斯，但俄利斯提斯却要立良己的小儿子为皇帝，这就是罗穆路斯·奥古斯都鲁斯。同时东部的皇帝西诺也正在

---

在今法国东南部，亦属于日耳曼族。——译者

日耳曼人的一支公元439年攻陷北非迦太基，即定都于此，建立汪达尔王国。——译者

基督教的一派，创立于阿里乌斯，当时日耳曼蛮族都信仰之。——译者

罗马帝国末期名将，公元454年罗马皇帝派人将他刺杀。——译者

东哥特国王的建立者（455—562年），493年推翻奥多亚克，遂统治意大利。——译者

那里驱逐一个劲敌。

我们要明白所谓西罗马灭亡这件事的关系，不能不将罗穆路斯·奥古斯都鲁斯被废黜的情形说明一下。因为普通都以为罗穆路斯的废立这件事，就是“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现在让我们先来讨论公元476年种种事实的材料。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所有的材料没有一种是当时亲眼看见的人记载下来的；大半都是后代的著述，或者是远地的传闻。其中最有名的是狄奥多利克的大臣卡西多卢斯所写的。但他生于公元476年以后。他于此事发生后四十年，在他所著的《编年史》里不过说：“纪元后475年这年尼波斯逃往达尔美喜阿，俄利斯提斯将皇帝的权力授给他的儿子奥古斯都鲁斯。”在公元476年那段下面写道：“本年俄利斯提斯同他兄弟保罗都被奥多瓦克所杀。奥多瓦克称王，但他不穿王服，亦不用王徽。”照上面所述的看起来，显然卡西多卢斯并没有看出这几件事可以看作是“西罗马的灭亡”。关于此事，最完备的记载是保存在一种意大利编年史的残篇里。这是六世纪中叶的人所著的，作者的姓名我们无考。我们所知道的不过正如蒙森所说，那位作者显然是一个幼稚、简单、文理不通的基督教徒。书中关于此事记载如下：

“当皇帝西诺在君士坦丁堡统治帝国时，执政尼波斯忽然到了波都斯，将哥利西里乌斯废黜。哥利西里乌斯后来作了主教，而尼波斯就在罗马作了皇帝。不久尼波斯到了雷温纳，但是他惧怕执政俄利斯提斯，因为他带了军队来追他，所以尼波斯就由海道逃到萨罗那，在那里住了五年，被他的部下刺杀。”

“从他离开罗马不久以后，奥古斯都鲁斯被立为帝，在位十年[!]。奥古斯都鲁斯没有做皇帝之前，他的父母叫他罗马路斯。他的父亲执政俄利斯提斯立他做皇帝，但是奥多瓦卡带了西利地方的人，忽然来和执政俄利斯提斯打仗。在庇西查地方将俄利斯提斯杀死，不久又将俄利斯提斯的兄弟保罗在克拉西斯[雷温纳的海港]附近松林里面杀死。他便占据了雷温纳，将奥古斯都鲁斯废黜。但是他因为皇帝年轻貌美，就生出一种怜爱之心，赦了他的性命，并且送给他六千枚索里达。他还送他到坎培斯去，同他的家人安然度日。他父亲俄利斯提斯本是个潘诺尼亚人，因为随阿齐拉来到意大利，而且作了他的秘书，所以慢慢的做了罗马帝国的执政。”普洛科庇乌斯是查士丁尼时代的著名历史家，他在大约作于公元550年左右的著作里所述关于上述事迹，比较详细。但是他没有说他的材料从何而来，而且他搜集材料的时候，离那件事已经七十年了。他在他的那部《哥特战纪》里面写道：

“当西诺统治着拜占庭的时候，西方的权力为奥古斯都所有，罗马人给他起了个绰号，称他为奥古斯都鲁斯，因为他即位的时候，年纪很小。他父亲奥利斯提斯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任摄政王。从前罗马人曾经为阿拉利克和阿齐拉所败，所以和西里、阿兰尼以及其他哥特部落结成同盟，罗马军队的威望因此大为降低，而蛮族的威望则因此提高。他们在名义上虽称作同盟，实际上是受蛮族的支配。蛮族如此嚣张，甚至在罗马人屡次退让，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之后，他们竟想瓜分全部意大利可耕的土地。他们要求俄利斯提斯拿出三分之一的土地，当俄利斯提斯不允许之后，他们就立刻将他杀死。蛮族里面有个皇帝的禁卫官，名叫奥多瓦卡的向蛮族说：假使他们派他作指挥，他就承认他们的要求。他僭位以后，并没有伤害皇帝的身体，而是仍允许他作一个庶人。他想使蛮族对他忠心，所以将意大利所有可耕的土地的三分之一给蛮族，他僭位凡十年”。

十世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普菲罗金尼都斯下令搜集的历史材料中，其中有一部分是叙利亚历史家马勒古斯著作的残篇。这部历史是从公元474年叙到480年，他著书的时候是六世纪初年。其中有一段叙述罗马上议院派人到东罗马皇帝那里去要求他任命奥多瓦卡作执政，这个头衔是从前一般担任罗马政府后台老板的蛮族领袖所拥有的。下面一段文字具有许多重要意义，而且可以表明吉本等著名历史家是如何不谨慎，几乎近于不规矩了。

马勒古斯的原本是希腊文，现在译述如下：

“……奥多瓦克强迫上议院派使臣到皇帝西诺那边去，告诉他说他们已经不要他们自己的皇帝了，有一个共同的皇帝统治帝国的两部就够了。因为奥多瓦卡很熟悉政治和军事，所以他们已经选举他出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恳求西诺赏他执政的称号，而且命他管理意大利方面的政治、军事事务。罗马上议院所派的使臣，就将这种陈萧书带到君士坦丁堡去了。

“在这些日子里，尼波斯也派了使臣来向西籍道贺[因为当时西诺已经将他的劲敌巴西里古斯推翻了]，同时请求他来援助尼波斯，对他提供金钱、军队及其它必要物资，以恢复他的地位，因为尼波斯所受的困难和西诺一样。尼波斯就派使臣前往，陈述此意。

“但是西诺回答罗马上议院使臣的话是：他们从东部接去两个皇帝，一个被逐，一个被杀。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应该知道有什么办法。只要那个皇帝还是存在，那么，除了欢迎他回来，没有别的办法。

“他对于奥多瓦卡所派来的代表说：奥多瓦卡要想取得执政的称号，最好是向皇帝尼波斯去要求；不过假使尼波斯不愿意给这个头衔，那么，他自己再来给他。他对他们将奥多瓦卡夸奖了一番，他说奥多瓦卡显示了维持罗马秩序的倾向，所以他希望奥多瓦卡能够欢迎封他为执政的那个皇帝。他并且写了一封信给奥多瓦卡，说明这番意思，而且尊称他为执政。”

西诺一句也没有提到罗穆路斯·奥古斯都鲁斯，因为他没有正式被承认为皇帝，只是他父亲的推荐的候补人而已。我们已经将公元476年那件事实的全部材料加以说明了。现在再看吉本著作中的第三十六章是如何将马勒古斯的记载加以复述的。

“奥多瓦卡决定废除这个无用而且糜费的职位[皇帝]。但是传统的压力很重，要实现这种主张需要见识和魄力。他迫使不幸的奥古斯都鲁斯向上议院辞职，这是上议院最后一次表示服从君主的行动，它的自由精神和宪法形式了。上议院这一致议决致书于拜占庭皇帝西诺。西诺是利俄的女婿及继承者，在不久以前，方平定了叛乱而复辟。他们向他陈述意大利方面已无另立皇帝之必要，皇帝一人已足以统治保护东西两帝国而有余。因此以上议院及人民的名义，议决将统一帝国的首都由罗马移至君士坦丁堡；而且上议院宣言此后放弃选举皇帝之权利。他们认为，奥多瓦卡在政治、军事上的经验已足以巩固罗马共和国（他并不感到羞耻地重复这个名称），请求皇帝任命奥多瓦卡为执政，命他负责管理意大利方面的事务。

“上议院所派遣的代表到达君士坦丁堡时，并未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小心的西诺既知[尼波斯]大势已去；遂不再坚持使他复辟。唯一皇帝之名称以及在罗马各城铸像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乃与奥多瓦卡互通音讯，而且感谢他接收了皇帝的徽章、宝座及宫内的装饰品等物，这正是奥多瓦卡愿从国民

的心目中转移出去的东西。”

从上面这段文字看，吉本所述虽然自称取材于马勒古斯，但相同的地方很少。而且在马勒古斯原文里面，没有提起共和国一辞，即使果然提到，吉本也应该知道希腊文所谓的共和国，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共和国，因为当时共和国一辞不过就是国家的意思罢了。

最可怪的是，吉本称西诺“接收皇帝之徽章及皇帝宝座和宫内的装饰品”。“奥多瓦卡愿从国民的心目中转移出去。”无论向人读了，都以为奥多瓦卡将罗马皇帝的徽章等物移至君士坦丁堡这件事是真的了。谁知道这话实在没有一点根据。在意大利编年史里面说：从公元493年狄奥多利克杀了奥多瓦卡以后，他就同皇帝安那斯塔西乌斯讲和，皇帝就将从前“奥多瓦卡所送到君士坦丁堡的那些王宫装饰品，一概交还了。”至于这些装饰品究竟是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断不能说这种装饰品就是皇帝的徽章，而且吉本、霍德金所说的东西被送往东罗马这件事，我们从马勒古斯的记载中找不到根据。

现在我们将上面所说的五世纪的大事总结一下。从当时流传下来的稀少的史料研究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普通人对于罗马帝国西部分裂的种种观念显然没有根据。

(1) 狄奥多西大帝决不是罗马唯一的皇帝。

(2) 他并没有将帝国分给他两个儿子阿卡尔底乌斯和荷诺里乌斯。

(3) 欧洲史上从没有“西罗马帝国”这个东西，至少在查理曼以前。

(4) 罗马人和蛮族并没有什么种族感情上的界限，而且即是在上流社会里面，也常有互通婚姻的事情。

(5) 阿拉利克并不是一个蛮族的领袖，带了大队的蛮族来横扫世界的首都，他实在是个很谨慎的政客，惯常从事于长期的谈判。

(6) 公元410年时，罗马城虽然暂时被阿拉利克所占领，但是并没有受多大的损失。

(7) 公元476年时，并没有西罗马灭亡那个事件，因为基本上就没有可亡的西罗马帝国，而且那一年也没有大事发生。(8) 罗穆路斯·奥古斯都鲁斯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罗马皇帝。(9) 奥多瓦卡并没有将皇帝的徽章送到君士坦丁堡。

## 第七章 “1789 年的原则”

—

自从法国国民议会发表了那篇阐明革命的性质、范围和利益的著名宣言以来，时间已过去有一百二十五年了。国民议会在完成了六七个月的工作之后，宣称：“旧的、腐败的国家在国民议会的主持下已经更新，重获自由”，并且数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曲解的和轻视的人权又重新建立起来了。从前在法国公法中规定[少数人所享受的]无数特权永远被废除了。宣言宣称：“现在哪有一个名实相称的公民胆敢回顾过去，希望在我们周围的废墟上再来恢复从前的旧制度？”

但是竟然还有不少人竟敢回顾革命以前国民议会所藐视的那种旧制度，他们对它不仅表示留恋，而且还流露出向往的心情。的确，就在现代还有一个[法国]作家名叫查理·厄里考特，在全极会议一百周年纪念会上还在赞美旧制度，认为在旧制度下全国国民过着安乐和谐的生活；直到了革命到来的时候，人民由于中了革命的魔道才叛离了上帝和国王，灾难深重了。按照查理·厄里考特的说法，法国的旧制度是能够使社会的各个阶层的特性得到最高的发展，他们能够共同合作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第一，首先就是僧侣，他们是聪敏、可敬和虔奉上帝的人。其次就是从前的暴君，现在则是有礼貌的、受人尊重的国王了。再次便是军人，他们现在成为文雅的贵族、荣誉的灵魂。接着是资产阶级，他们是富裕的、有威严的和受过教育的人。最后是人民，他们笃信宗教，和蔼可亲；他们生活中虽有些小麻烦，就积攒钱财，唱歌跳舞来排遣，而当他们遭遇到严重的不幸时，就想到死后天堂的快乐。

可是，这个幸福的、信奉基督教的、君主政体的法国，骤然出其不意地以强大的暴力突然攻击教士和君主。它现在竟然要消灭它以前所崇拜的指导者，反而专诚崇拜一个新女神——这个新偶像就是我们所谓的革命。

乍看起来，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对于一个查理十世时代获得最早印象的极端反动保皇党分子的意见予以十分重视。但是厄里考特只是那些重要的有学问的著作家之一。他们这些人为了反动派的利益，一直在致力于描写恐怖时代的可怕事迹和混乱状态。再则，只有这些历史学家才能说明共和党人的态度，他们对于顽固的仇敌所说的话是决不容许袖手旁观，轻易放过的。

现在巴黎市政府拨出款项叫人研究本市的历史，其用意并不止于它对科学发生兴趣，或是为了叙说这个城市的光荣传统。它所以要搜集和出版革命时代巴黎公社的种种文件，其目的是在于表明巴黎城在推动“人类解放”的“不朽的光荣”。这些文件要表明巴黎的代表们建立起一个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新社会；他们用德行、爱国主义、克己精神去反对背叛、弃信和诽谤——这一切都是自私自利的贵族常常来煽动人们去反对高尚的公民的手段；而能使他们成为殉道者，而不能使他们成为叛徒。我们若是平心静气地来研究巴黎公社在建立第一个法兰西共和国过程中的作用，那么，我们就感觉到上面的话就同厄里考特所描绘的旧制度下的幸福是一样荒谬可笑的。

总而言之，现代的法国人同他们的 1790 年的祖先一样，或者热爱这个革命，或者憎恨这个革命。近来有一位法国著作家曾说道：直到如今为止，还



没有人能在叙述法国革命时，和叙述其他重要历史事件一样，既不加以咒骂，也不加以辩护。这句话虽是不很公允，但是比起奥拉德所说的话却更近真实。奥拉德曾说：他和他的朋友们是用像叙述希腊、罗马史的那种精神去叙述法国革命史的。但是如果要叫法国人用像叙述克雷翁、布拉西达、尼西阿斯和阿里斯托芬尼斯时所持有的那种公正精神去叙述法国革命中的人物，如丹敦、克罗特、拉斐特、德莫林，那就不知道还要经过一个多么久的时间。

如今在法国的重要著作里面，正如同在一百年以前一样，还存在着许多党派偏见，所以法国革命正好证实了都克维尔所说的话。他说法国革命就其性质而言，虽然是一场政治革命，但是它的方式却是一场宗教革命，因为法国革命激起人们强烈的仇恨，这种仇恨同由宗教改革伴随而生的厌恶情绪几乎相同。这种党派的偏见永远存在的原因，一部分可能是由于法国人的性格，但是大部分却还是因为法国革命没有完满地解决法国革命所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如中央政府的性质，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等。而且法国接二连三的几次宪法的革命虽然进行得并不像普通人所设想的那样彻底，但是这些革命却一个接一个地使得各个政党打起精神，从而使保守党和激进党的心里永远满怀着希望。所以第一次革命就成为以后每次辩论时局问题的背景，人们也就常常提到对 1789 年的原则作为依据，这些有不同志趣、目的和信念的人，对于 1789 年的原则就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法国革命或许是历史学家最难研究的问题。如果人们想研究它，那么，在力图使现在能够明了过去的道路上就会到处遇到困难和陷阱。关于法国革命是在什么地方开始的这类问题，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至于要问法国革命是在什么时候终止的，则它好像直到现在还并未终止。就某些事实来说，资料实在多得叫人迷乱，而对另外一些事实来说，材料又太稀少，甚至于一点也没有。我们必须对各式各样的党派偏见——宗教的、政治的、哲学的见解都加以研究。法国革命对备种各样的人都发生关系，包括本国的和外国的君主、朝臣、各种国民议会和无数的委员会、各地的革命机关、公社政府、派出的代表团、逃亡的贵族、宣誓与不宣誓的传教士、俱乐部、演说家、报纸编辑、小册子的著作家——它对这些人所从事的事业都发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历史上还没有见过像法国革命那样在 1789 年全级会议以后的短短十年或十五年期间，在涉及人类利益如此众多的领域内，发生如此众多的、已经实现的或计划要实现的变化。伴随着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宗教的和教育的这些根本改革而来的是最空前的群众激动和粉乱、内战和对外战争、防御和侵略、对外交涉活动等。事情如此复杂，变化如此遽然，使人不可能将法国革命中全部事实有条有理地记载下来。所以卡莱尔曾经说：“法国革命的意义真是同谈论革命的人们一样多。”在他看来，“法国革命是一种公开的、激烈的叛乱，无政府的精神从下层爆发起来，打破监狱，用它的不可约束的和不可估量的澎湃汹涌的力量将世界上的万象都包罗在高度的狂乱之中”。泰因把法国革命比作一个失常的神士，这个人体质虚弱，但外表正常，性格温良，因为喝了一种新酒，忽然跌倒在地，口吐白沫，疯狂起来，肌肉拘攥。”虽然卡莱尔和泰因所作的比喻都是严肃认真，没有忽视法国革命的深刻意义，但是那些比他们头脑较差的人则往往被当时的粉扰和高谈阔论所述乱，好像这些东西就是法国革命的本身。最近二十五年来，历史界有了一件最重大的成就，那就是人们已经将法国革命时代放到它的适当地位上了。英文读者不得不把这件事情归功于摩斯·斯提芬斯教授，因为他阐明了摆脱

束搏的无政府精神，并且使它回到应有的地位。这件事如果同近来俄国境内所发生的巨大的混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法国革命史里面的个人总是异常突出、引人注目的。如玛丽·安东奈特、德·朗巴勒公主、马拉特、夏洛特·高代、德莫林、丹敦、圣鞠斯特以及小太子等人，在法国史读者的心目中是亲切的，读者往往容易着眼于巴士底狱的陷落和九月杀戳事件，而对于制订法国第一次宪法的原因以及制宪的原则反倒不很注意了。

现在正是我们应该对于法国革命来个全面估价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把法国革命看做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本改革。夏山在他未完成的著作《革命中的天才》（1864—1865年版，只出版了两卷）一书中，一开始就显然抱有这种见解。他想写一部真正的历史，将个人的、轶事的、偶然的和想像的情节略去不提，而注意当时具有永久性的成就。他认为“革命”这件事并不是摆脱束缚的无政府主义精神的爆发，而是改革家把他们的理想化为行动的道路，即以平等的制度去替代特权的制度；以自由的国家去替代专制的政府；以人民的主权去替代神授的君权；以公正去替代偏私。夏山认为“这部历史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它似乎失去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替这样的历史著作进行辩护呢？我们早就渴望知道法国革命的真正成就。但是我们如果要明了法国革命的成就和它的历史地位，我们必须将法国革命史同法国的旧制度联系起来，同时还要同法国召集三极会议以前五十年的欧洲历史联系起来。从前写法国革命史的人们在研究法国旧制度的时候，往往着重叙述当时政府的贪污腐化和资产阶级的投机倒把。用这些事固然也可以解释当时一些过于偏激的恐怖分子的态度，但是这些东西却不能说明看来似乎是骤如其来而实是永久性的改善的原因。假使我們不去研究1789年以前的那些多少是失败的改革的无法抗拒的要求，那么法国革命必然始终是一个谜。人们在将来总有一天会把法国革命看做是一种符合于新的、已经起了变化的环境的最具有决定性的和全面性的改革。为了叙述法国和西欧的这次再生的历史，我们必须注意造成革命的酝酿过程，这是将来研究法国革命的人应有的抱负。

到现在为止，只有少数人能够把发现与阐明法国革命真正伟大的、永久的结果的问题摆在自己的面前，无怪乎广大的读者以为法国革命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可是只有一个人倒是例外。沃拉特先生在他所著的《法国革命政治史》中提出革命运动中两个主要原则，即“权利的平等”和“人民的主权”。他把他的全副精力和广博的知识都用来叙述这两个原则的变化过程，从1789年讲起，一直讲到1840年为止。我们读了这部书就好像摆脱了精神错乱的状态，而进入了条理清楚、目的明确的境界。

在法国革命的那种戏剧性的插曲背后隐藏着具有根本性的社会政治改革，这种改革不仅可用以说明十九世纪法国史，而且还可用以说明欧洲各国自由制度的发展。我们设想五百年后头脑清醒的历史学家回顾法国革命的时候，他们也许会抛弃了那些法国革命中的戏剧性的故事，而突出革命对于欧洲的真正贡献。这些未来的历史学家必然将要把1789年的原则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

柏克 痛骂法国第一次国民议会和它的“笨拙而妄诞的政治玄学”为“好

像艾俄路斯的风暴 横扫地面一样”。以后英国和德国的历史学家都诋毁法国那篇《人权宣言》，把它看做只是法国人性情轻佻的一个例子。西培尔 认为从那篇宣言的条文中可以看出以后法国的种种危机。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当时法国人应该多作一些具体改革，而不应该浪费宝贵光阴来进行空洞无物的、学究式的争辩。在某些情况下，法国人从政治策略的观点出发，也像外国批评家一样痛骂那篇宣言。但是就另一方面来说，当这篇宣言初次宣布的时候，它不仅激起了当时广大群众的热情，而且在以后的法国宪法中还屡次以不同形式出现，直到 1848 年为止。就是欧洲大陆各国宪法中的类似的宣言，差不多都以这篇宣言为范本。

在研究《人权宣言》的来源和原型的过程中有两个趋向：第一，是使人将重大的责任放在卢骚身上；第二，是使人回想起美国的先例，关于这一点，在国民议会的争辩中人们常常含糊地提到。西培尔认为法国《人权宣言》的根本思想来自美国《独立宣言》。霍赛尔和斯提芬斯都认为法国《人权宣言》是以《美国联邦宪法》的神话般的权利宣言为范本，他们假定美国宪法之前，是先有这一宣言的。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说明法国宪法的思想是如何逐渐发展起来的；在第一次宪法的前面加上一个简单的说明来申述宪法所依据的一般原理是如何自然而然产生的。现在我们不能再以说明恐怖时代为主要目的去研究法国第一次现代立法机构了。我们应该用当时议员和他们所代表的人民的观点去观察他们的事业。为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将国民议会宣告制订宪法时的情况，加以叙述。

## 二

大家都知道：早在 1789 年 5 月初，法国封建时代的三级会议即所谓全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这次会议与前次三级会议相隔已有一百七十五年之久了。尽管议员们还穿着古老式样的制服，同从前所规定的一样；但是从上次会议以来，这个团体却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君主的命令并不能够再创造出数百年前的那种精神了。尽管有保守分子的极力反对，但是这个会议却在以后的几个星期内起了不可避免的变化，它以现代人民代表的议会的姿态出现了。

当时在法王左右为他谋图的那些朝臣已经感觉到这种危险的倾向，他们崇奉路易十六下令叫三级会议暂时休会。休会的理由是路易十六将于 6 月 22 日亲莅会场，因而不得不叫木匠将会场修理一下，为这次庄严的会议作好准备。

第三等级的代表们看到会场既被工人们占据，于是就集合在凡尔赛宫的网球场上，在那里通过了如下的议案：

国民议会认为这个会议的召开就是为了制定王国的宪法，实行秩序的整顿和维护君主的原理。这个会议无论在何处开会，人们不能阻止他们继续讨论。国民议会认为它的会员在哪里集合，哪里就是国民议会。本会议决所有

---

希腊风神。——译者

德国历史学家（1817—1895 年）。曾受业于兰克，任慕尼黑及波恩两大学历史教授。著有《法国革命史，1789—1800 年》、《威廉一世时代德意志帝国建立史》、《第一次十字军史》等书。——译者

议会的会员立即郑重宣誓：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他们将团结一致，决不分离，直到将王国宪法制定出来，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为止。

这个议决案的重要性在于这是第一次正式明确地宣布了国民议会的使命。前人的记载往往把这个著名的宣誓解释为这是由于木匠侵入会场所引起的料想不到的结果。卡莱尔说：“这是工人们的锤打声、锯木声、工作时的呼唤声的结果”。实际上，6月20日的宣誓虽然有其重要的政治意义，但它不过是在议会代表们没有被逐出于会场以前的事态的很小的进展。

早在三天以前（即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们就自称为“国民议会”了。同日，这些代表们还宣布了一个誓言：“我们宣誓并且保证将以热心和忠诚来完成我们应尽的义务”。据说宣誓的“有六百人，在周围参观的群众有四千人。这次宣誓激起了的最强烈的感情，造成了气派堂皇的场面。”显然，网球场誓言的新奇之点就在它明确地宣布制订宪法是议会的重要任务。

全体代表一致承认制订宪法是议会的真正目的，这就是足以说明当时广大人民认为发布这样一篇宣言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要问：法国人是通过什么步骤才得到这个明确的信念，认为救国的方法是取决于宪法的制订，即第一次在网球场誓言、正式发表的信念？

当时法王和大臣对于召开全级会议的目的是十分含糊的，因而在1789年1月24日发出的召开全级会议的信件中的说明也是含糊的。那个文件称：“我们急需征得忠顺臣民的意见，帮助我们克服我们所遭受的一切困难，如关于国家财政；并且按照我们的愿望来建立政府各个部门的永久不变的秩序，因为这些部门是关系到我们臣民的幸福和国家繁盛的”。“在政府各个部门中建立永久不变的秩序”。这句话在这个简短的文件中提了三次之多，它是全级会议同国王合作期望达到的重大目的之一。当时的财政大臣奈克于召开会议以前一个月在给国王的报告虽然被看做是反映国王内心目的，但它实际上对此问题仍是含混其辞。奈克并没有提到宪法二字，他只是似乎认为全级会议将会在日后定期召开，国家的秕政将会被革除，政府机构将会得到改革。政府方面也没有再提出进一步的改革计划。但是在网球场誓言三天之后，法王就亲莅会场，在会上提出三十五条详尽有趣的改革计划。

但是，政府方面所提出的改革方案虽是十分含混，而当时国内一般领袖人物已经有了一套具体方案，而且差不多在全级会议还没有开会以前，那种要制订宪法的观念却已成熟了。其中有一些最重要的观念，以后被用作宪法革命的根据。这些观念早已体现在十八世纪时的各高等法院的《抗议书》里面。法国高等法院早在革命以前已制订出一套宪法的理论，他们还不遗余力地将这种观念向广大群众传播。

由于法国政府里面，立法同司法的职务是如此密切相联，这就无怪乎巴黎的那个高傲的高等法院要扩大它的义务和势力来监督立法。这种倾向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根据法国早先就有的习惯，司法机关对于君主提交来登记注册的文件是可以提出抗议的，而且还可以要求复议。高等法院对于这种参与立法的特殊权利进行了异常严肃的维护。他们所提出的理由不仅根据先例，而且还根据公道和权宜措施。因此，当法王和大臣们要强迫司法机关违背它的意志来将国王的命令进行登记注册时，严重的危机就往往发生。这时，法国的君主制的专制性和立法法案的真正性质的问题就十分突出地暴露在国人面前。

法国司法机关虽然承认法王是最高的立法者，但是为了要支持他们偶或

对君主意志的反对，他们就提出一套宪法理论。他们自称是王国的“根本法”的保护人。他们声称他们有维护王国宪法和监督破坏根本法纪的职责。这种宪法本来也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成文法典。但是司法机关却正确地指出：认为只有继续遵守某些古老的习惯，法国才能保持它的合法政府。他们有一次居然对路易十五说：“就是谄媚奉承本身也不敢硬说在个个案件中，君主的意志就能成为法律”。但是法国高等法院好像很明白它们的主张至多也不过是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上，因而他们始终不敢将法国的“根本大法”罗列出来，他们只是把这种含糊的主张用严正的言辞反复地提出而已。

尽管高等法院所主张的一套理论并不十分明确，但是从1716年5月以后却有许多传播很广的“抗议书”，这些“抗议书”使全国人民越来越深刻地明白政府的腐败和专制的危险。从此以后，大臣同高等法院之间常起冲突。尽管这种冲突是十分重要的，它能造成群众对政府的不满；但是在这里我们却不去细说。现在，我们应该专门来讲一讲十八世纪时法国高等法院怎样通过“抗议书”激起了限制君主权利的要求。

下面所引的一段文字就是在网球场誓言之前七十年所发表的，里面包含有他们要求的大纲，这些要求后来在法国高等法院的宣言里分别得到发展。

“陛下，我们虽然承认您是唯一的主人、元首和立法者，并且承认法律因为要根据时代的不同、人民的需要、秩序的维持和国家的统治不得不加以改变，而且为了统治国家起见，您不得不按照向来的方法，用新的法律去代替旧的法律；但是我们始终认为我们有责任请您注意那些永久不变的法律，这些法律是和王国一样的古老。对您来说，保卫这些法律和保卫它的王冠一样重要……正是因为这些法律是永久的，您才作了我们的主人和元首。这些法律的永久存在使得我们希望这个王冠，在您这个长期的、公正的、光荣的朝代以后，将要传给您的后代。

“近来人们清楚地看出：这些古老的法律的维护对法国有莫大好处。同时也看出，您的高等法院的责任是严格遵守这些法律，它们这样作是符合于陛下的利益的，因此它们必须保护这些法律，不使它遭受任何攻击。”

高等法院声称：“就是路易十四也认为高等法院是‘王国根本法的真正保护者，即是最专制的君主也曾认为高等法院所执行的注册法会的手续是实行一件新的法律的必要条件’”。

由此可见，法国高等法院的地位，特别是巴黎高等法院的地位，几乎与法王本人等同了。他们的存在都是根据同样的根本法或宪法。为此，司法官认为：“王国中最重要的和最神圣的宪法”不仅规定国王的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还规定法院有协同君主的立法权，国王和法院都得感谢这些凭此国王成为国王不可抹煞的法律。

所谓1753年的大抗议书曾详细地谈到君主的意志同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这篇抗议书明白地提出了君主的意志要服从于法律，而且他们还引用路易十四时代的各种政治学著作里的话作为理论的根据。这篇反对种种圣典的“抗议书”使得因为罗马教皇所发布的那篇“乌尼根图斯命令”而引起的一场长期争执从此终止。以后的“抗议书”又是关于法院同政府之间的其他方

---

1771年7月不列他尼高等法院的抗议书。——译者

见弗拉麦蒙特编：《抗议书汇编》第1卷，第88页。——译者

见弗拉麦蒙特编：《抗议书汇编》第1卷，第521页。——译者

面的冲突。当时深得人心的司法机关由于对于时代的精神非常敏感，在他们的宣言中往往增添一些民主的、或者至少是群众性的色彩。于是在他们规劝国王的抗议书里，“国家”、“人民”、“公民”等这些名词就逐渐增多起来。我们很容易看出，法国的国民反对无限的君权趋向正在发展。我认为把宪法原则说得最为明白透彻的是1771年7月不列他尼地方高等法院所提出的那篇无名的“抗议书”。“抗议书”宣称：

“随时变化的律条和国家宪法所依据的根本大法是很不相同的。就随时变化的律条来说，司法机关的义务虽然在于影响和启发君主，但是他们的意见最后还是要听从您的智慧的决定，因为只有您一个人才有管理国家一切事物的权力。但是管理国家并不就是要去变更国家的宪法……所以我们不能不将下面两种情况区分清楚。一种情况是立法机关有劝告的权力，这种权力足以启发君主，进行统治。国家统治的范围虽很广泛，但它毕竟有一定的范围。另外一种情况是对君主的权力的限制，君主的权力不能超出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宪法合有必须反对专制行为的权力。”

这段立法机关的“抗议书”所提出的理论显然是很片面的，但是它同后来人们那种将宪法和一般律条加以区别的观念却十分接近。“宪法”这个名词不仅在法国革命以前就为有思想的法国人所熟知，而且现代立宪政府的观念在那时也已接近形成了。

在法国三极会议停止召开以后，法国的高等法院就隐然以国民代表自居，这或许就是他的要博得国民的同情，提出他们主张的根据。1787年7月16日巴黎高等法院提出“抗议书”请求政府召开三级会议声称：“只有代表国民的全级会议才有权力给君主以必要的经费。”这个要求却获得了对于行动的意义持有根反看法的新党和旧党的一致通过，这可以说是终局的开始。

美国早期各州的宪法无疑地对法国某些有思想的读者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澄清了他们的观念。1778年所出版的最早的美国各州宪法的汇编就是供法国人阅读之用的。过后不久，美国国会又重印了二百部送往法国。特戈特、马布利、康道赛特等人曾经写过评论美国制度的著作。我认为无用置疑，法国国民议会里进行辩论时常常提到的美国人权宣言，并不是指美国的联邦宪法，也不是指美国的独立宣言，而是指先于美国各州宪法前言中那些关于国民权利的详细阐明，尤其是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宪法。

美国的经验也许可以对已经得到很大发展的法国宪法改革运动提供精确性，并增添新的力量。除此之外，我们不能说美国的范例还超过更大的影响。真正能够说明1788到1789年间法国各阶级人士为什么对于他们的权利要有一种书面的担保的原因，不能从外国的影响去寻找，而是应该从当时法国的状况和许多事件的过程中去寻找。1788年5月法国政府企图废除旧日的司法机关，引起了一般人的激动。巴黎高等法院遂试图将宪法的原则详详细细地列举出来。他们指出：国家的“根本大法”，包括下面几个原则。

(1) 唯有全级会议才有权给与君主经费；

(2) 公民除非立刻送交正式法官听候审理，有权拒绝非法的逮捕。

这两条已提了人权和公民的权利，后来为议会所批准。此外，还有其他

---

法国政治家（1727—1781年）。——译者

法国著作家（1709—1785年）。——译者

法国哲学家（1743—1794年）。——译者

的提议，其目的在于宪法上规定君主和大臣们不能废除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享有在各省检查的君主的意志，对于那些合乎各省宪法和国家宪法的精神的律条进行登记注册的各种特权。

巴黎高等法院对于地域主义的呼吁虽然是不适当的，但是在当时是成功的。自从前一年加洛纳将财政状况宣布以后，法国政府就失去了人心，现在政府又力图废除各地的法院，这就激起了各省许多事态严重的起义。在陶斐内地方“抗议书”不仅引起了全级会议的召开，而且还对全级会议的精神和性质发生了重大影响。

1788年的起义实质上是法国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表面上看来，好像各省反对政府只不过是要保护各省在次年即被永久废除的陈腐特权；但从实质看来，这种斗争是反对专制主义。十分清楚的是，不仅要对无数弊端进行改革，而且对于君主的专制权力也要尽力加以限制，因为朝廷的大臣岂不是想凭君主的命令，用最卑鄙的手段来废除监督的机关，以便改变国家的全部组织么？因而，双方争执之点，最初虽在保护省的权利，但实质上则是全国性的。

### 三

自从法王决定召开全级会议以来，国内自然是出了无数的小册子，特别是到了1788年的下半年，出版得更多。这些小册子的作用同现在报抵上的社论差不多，有的讨论代表人数的问题，有的讨论国会里面表决的方法，但是也有讨论全级会议在国会里所担当的任务。西爱咸斯所写的那本书是很有名的，因为他在国民议会里始终占着重要的地位。另外有一本无名的不署名作者的小册子，那是在网球场誓言的前一年出版的。书中将制订宪法的必要性说得异常明白。有人说这本书就是后来六月二十日以前国民议会里面最激烈分子拉鲍·圣艾底埃纳所著的。书中写道：

“只要你的这种专制政府还继续存在，只要你还暂时信任的朝廷大臣们还想推翻现存的秩序，还想变更或废除他们先人所制订的法律和条文，那么，你要想改革弊政和改善你自己的处境都是徒劳无益的，而且是不会有永久的结果。”

作者在叙述一部完好的宪法原则时，虽然常常提到瑞士和美国的宪法，但是很显然的是，作者认为英国的宪法是一个最好的典范。他说，宪法里应该规定要有两院制的立法机关，要有政权分立，要有内阁责任制，要有生命财产的保障，要有出版的自由等等。他这一套大纲显然大部分是从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一书中抄来的，但是在我对于当时的许多小册子进行研究后，上述的那本书好像很是例外的。苏莱尔曾经说过：“法国人希望民权的自由要比希望政治的自由急切得多。”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所有的著作大多讨论的是财政的压迫、现存社会和现存经济的流弊，很少谈到政治的改革和宪法的改革。

在人民建议书里面，也显然有这种同样的倾向。根据古老的习惯，各选区的贵族和教士以及各城乡的平民都可以诉说他们的苦衷，并提出进行改革的建议，所有的建议书都表达一种普遍的愿望，那就是要求废除旁波的专制政府。我们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例如有某他的教士团所提出的一篇建议书，第一条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不该建立在含糊不明的历史传统上，而应该建

立在牢固的基础上，那就是主持公道，维护人民福利。”这篇建议书还说全级会议不能行使任何职责，“除非已是正式承认和决定国民的权利，必须制订出具有这些权利的宪章，并将这些权利用文字正式地不能改变地记录下来。”这几句话虽然讲得很含糊，但是这些建议书都代表了一般人民最低限度的要求。当时人们似乎都觉得只有制订出宪法，将国会召开的日期规定下来之后，人民期望的权利和自由才能得到保障。假使个人的权利经过明白规定，而且正式地不能改变地用文字写下了，那么，人民参与商讨国是，行使立法的权力便可以限制政府的压迫。当时人们认为这种办法并不含有要进行根本改革的意义。事实上，在贵族所提出的几篇建议书里面，他们也希望要使他们的特权得到保障，他们把这些特权看做是“根本大法”。他们认为这些特权一经规定，将来就不会再有人对它提出问题。泰纳认为当时一般贵族，包括孟德斯鸠在内，都说法国已经有了这种宪法。他的这种说法虽然有几个事例体现出这种见解，但是在当时的建议书里却没有得到证实。

有几个城市的建议书对于维护人身权和保障财产权作了明确的规定。例如里昂城司法区域的建议书里说道：“由于专制的权力是为国家祸患的根源，所以我们首要的希望就是要制订出一部真正的国家宪法，将国民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而且要制订出法律来维护这些权利，因而我们请求对国家宪法做出决议，并送交国王批准。这种宪法的最主要的目的应该这样规定，一共有十四条，最后并附以说明，鉴于没有一部良好的宪法，社会就不能取得幸福，因此里昂城认为在全级会议还没有制订出宪法以前，全级会议的代表就不得讨论其他议案。”

在各种建议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把两种不同的要求十分自然地，不自觉地混淆一起，也可以说是溶合在一起。第一种就是要求在所有政府各个部门同公共秩序制订出一个不能改变的条例，另一种就是要求制订出一部永久维护王权和国民权利的法国宪章。“国民权利”这四个字屡次提及，有时还同王权二字相提并论。但是归根结底，国民权利是不能建立在不牢固的基础上面。难道有了不可剥夺的社会个人权利以后，就可以永远抵制君主专制的流弊和侵犯么？人们希望：如果国民的权利和“民约原则”一经明确而正式宣布，那么，法国的政府的基础就可建立在这些权利和原则上面。南得和墨莱两地的贵族进一步宣称：“政治的原则应该同道德的原则一样都是绝对的东西。”所以他们要求“发布‘权利宣言’，所谓‘权利宣言’就是由国民代表以国民的名义提出一个议案，将有理性的、有知识的并具有道德观念的人类权利宣布出来，这些权利实际上在各种社会制度建立以前早就具有的。”

关于制订人类天赋的政治权的宣言，再也没有能比纳摩尔地方的第三级人民建议书里所提的要求更为迫切的了。他们要求在全级会议一规定出人类和公民天赋的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后，法王就得制订一篇宣言。这篇宣言要在全国司法机关里注册登记，要在全国教堂每年张贴几次，而且还要插入所有供儿童阅读的书里。身为司法官和行政官的人们都要记住这篇宣言。这篇建议书里，同其他的建议书一样，包括巴黎建议书在内，提供了一篇详尽的权利宣言的草案。

最后的这篇建议书制订得最晚，直到5月5日全级会议开会时才作成。担任制订建议书的委员会里很有几个名人，他们讨论的结果就提出了在国民议会制订宪法以前的一套最完备的宪法草案。这篇建议书的第一部分专门谈



论宪法方面的文章里面写道：“在国民权利宣言没有宣布以前，在宪法的基础没有取得同意和稳固以前，巴黎代表不得允许政府颁发补助费或借贷国债。”在宪法草案前面附有的一篇权利宣言，它同后来国民议会所议决的那个宣言很相像，建议书宣称：“这篇权利宣言应该成为一篇国民的宪章，并做为法国政府的根本。”我曾看过许多当时的建议书，其中对于权利宣言为宪法必要的一部分这个观念再也没有能比纳摩尔的建议书里说得最明白了。这个建议不仅为后来国民议会所采纳，成为附在所制订宪法前面的一篇人类与公民权利宣言，而且后来那篇宣言里面的条文同这篇建议书的条文十分相似。我们看看 1791 年法国的宪法就可以知道那篇建议书所提的宪法条文的重要性。其中包括有以下几条：

“法兰西王国之内，立法权应属于国民与君主，行政权则仅属于君主一人。”

“全级会议除非常会议以外，每隔三年应召开一次。闭会时应宣布下次开会的日期与地点。”

“凡犯有企图阻挡全级会议开会之罪者，应以国家叛徒论，犯叛国罪。”

“在全级会议休会期间，政府只能发布临时条例，作为执行上届全级会议议决案之用。这种条例如果还没有得到下届全极会议的通过，就不得成为法律。”

此外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建议书的草案同后来宪法相同的地方。这篇建议书宣称：现在全级会议根据上述原则所制订的宪法必须成为国民的资产，除了立宪机构以外，不得随意加以变动。这就是说除了国民或由国民为修改宪法而选举的代表以外，不得随意加以变动。

法国人深信权利宣言是不难说明的。法国一般国民不懂重新建立政府是有巨大困难的，而且也很少知道在宪法制订之后，宪法一定是一篇很长的法律文件。至于法国人民虽然渴望有一种根本改革，但是他们对于改制的复杂性是不十分注意的。他们最希望获得的就是民权，至于参政权，他们则并不急于要掌握，只要能够防止旧制度不再复活就行。他们所知道的不过两三件事：就是君主和大臣们的滥用公款，以致造成国家的财政极度困难，朝廷官吏近来想擅自废除陈旧的但大体上还得上得民心的高等法院，以便巩固他们的专制权力，推翻宪法的保障。政府的好些措施显然是侵犯人类最显著的权利。最后，旧制度的混乱已到达足以阻止工商业的发展。即使从来没有读过卢骚的著作和马萨诸塞州的宪法的人也都明了当时的弊政。拉路歇勒地方的贵族对为什么全国国民要求制订宪法并确保民权的原因说得非常明白：

“我们认为国家的各种赋税正在强夺人民的财产；各种专实事业正在阻碍国民的活动；政府的拘人密令正在剥夺人民的自由，使有罪的变成无罪的，将无罪的人关进监狱，而使有罪的人逍遥法外。特派委员们任意停止法律发生效力，推翻法院。每个大臣都把前人制订的办法改变了。由此看来，香比翁先生的话说得很对。“古典的精神、对抽象理论的爱好、以及旧制度等，这些都可能影响某些建议书的制订；但是制订宪法这个观念并不来自哲学，也不来自高度的狂热；实际上它是来自当时广大人民所遭受的疾苦。即使没有《民约论》，这种观念也一定会被当日时势的逼迫而传布开来。这种要求既然很可以从当时实在混乱的王国情况得到说明，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这种要求产生恶感呢？”

法国人早已感觉到他们的政府制度的腐败，迫切想通过限制君主的特权

来保障他们的自由。他们自然而然地一定会想到制订一种成文的保证，以使国家的主要根本大法确定下来。当时法国人之所以强调要有一篇人权宣言，就可说明当时法国人着眼的是要制订出一种英国式的宪章，而不是要制订出像 1791 年所制订的那种精密的宪法。米拉鲍曾经说过：“现在大家都知道法国国民所预备的这个已经开始的革命并不是因为国民的知识已经普遍提高，而是因为国民已经感悟到当时的弊政和政府的腐败。人人都知道要破坏什么，但是却没有人知道要建立起什么”。

#### 四

在简括地叙述了 1788 年的危机和各种建议书所表示的公众精神后，国民议会的态度也就十分明白了。1789 年 6 月 17 日第三等级曾经宣称他们的使命在于确定国家复兴的原则。7 月 9 日，它的制宪委员会做了第一次报告，这是一篇好报告。它将宪法即政府的制度同权利宣言区分得很清楚。报告书里说道：要制订一部完好的宪法，“我们就必须承认天赋公道所给予个人的权利，而且不能不注意所有作为各种社会根据的那些原则”。委员会并主张为了要使大家牢记宪法的目的，宪法前面必须附有一篇人权宣言。这篇宣言不得同宪法分开颁发。为的是深怕没有宪法的具体条文附在后面，人权宣言的条文未免太空洞了。

由此看来，人权宣言的制订就是为了满足普遍人们的要求，所以当时代表中很少有人不赞成的。8 月 4 日，国民议会全体一致议决要在宪法前面附有一篇权利宣言。关于这篇权利宣言内容的讨论，我在这里无需叙述了。8 月 26 日，这篇宣言已经被最后确定下来。为了制订这篇宣言，他们曾花费十四天的功夫。这些时间难道是白费的么？或者比白费还要无益么？难道代表们专门在研究含糊的抽象理论，而牺牲国家的利益，使国家的祸患变本加厉么？或者宣言的这些原则，全面来看，难道不是正确、全面，不是理想的么？难道它不是以国民的多年经验做依据，适宜于为将来制订伟大建设的规划么？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再三地读一读那篇宣言，这是一篇简短而有教益的宣言。

“组成国民议会的法国国民的代表们深信对于人类权利的无知、忽视或藐视，是造成国家灾害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为此，我们决定将人类天赋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权利在庄严的宣言书里逐条宣布，使社会的成员们可以经常看到这篇宣言并能够永远记住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使立法机关的行动和行政机关的行动随时可以与各种政治制度的目的加以比较，可以更加受到人们的尊重；使公民根据下面朴实不变的原则提出申诉，便于维护宪法，增进全民的幸福。为此，国民议会在上帝面前，承认并宣布人权和公民权如下：

第一条人类生而自由，而且永远是自由的。并享有平等的权利。社会地位的差别只能是建立在全民利益的基础上面。

第二条所有政治组织，其目的皆在于维护人类天赋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第三条所有主权的根本都是属于国民全体。团体和个人除非直接接受国民的委托，都不得使用任何权力。

第四条自由只在于不妨害他人的自由条件下自由行动。因此个人在行使他的天赋权利时，除了有确保社会上其余成员享有同等权利之外，没有任何限制。这些限制只能由法律来决定。

第五条法律只能禁止那些对于社会有害的行动。不能阻挡人们去做法律所不加以禁止的事情，不能强迫人们去做法律所没有规定的事情。

第六条法律是公众意志的体现。每个公民都有亲身或派代表参加立法的权利。每个人应受到同样的保护或惩罚。对于全体公民都必须一样。所有公民既然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他们除了道德和才能有些差别之外，他们就该根据不同的能力不加歧视地有权充当所有显职和官吏，经营各种事业。

第七条对任何人除了按照法律规定的手续外，不得加以控告、逮捕或监禁。无论何人，请求、传达、执行或主使执行非法命令，都应受到惩罚。但是，无论何人，根据法律被传或被捕时，应该立即到案候审，因为抵抗就是犯罪。

第八条法律只能规定那些绝对的和显然必要的刑罚；无论何人，除根据犯罪以前所通过的和宣布的法律处以刑罚外，不能受罚。

第九条无论何人，在其未曾宣布有罪以前，都是以无罪论。假使认为有必要加以逮捕，除了那些保全人身所必要采取的措施外，所有严厉的手段都应严加禁止。

第十条无论何人，不得因为发表他的见解，包括他的宗教见解，而受他人的干涉，但是这些见解的发表必须以不扰乱法定的秩序为条件。

第十一条思想和意见的自由交换是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一种权利。因而人人都可以有言论、著作和出版的自由。但是必须对滥用法律所规定的自由负责。

第十二条人权和公民权的确保不能不需要建立国家的军队，这种军队只得维护公众的利益，不得维护那些受托管管理军队者的个人利益。

第十三条全国国民必须缴纳公税，作为维持军队及行政费之用。这种公税应该依照公民的财产合理分配。

第十四条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派代表议决缴纳公税的用途，而且有权规定征税数目的多寡，分摊和征收的方法以及征税期限的长短。

第十五条社会有权要求每个官吏汇报他的行政情况。

第十六条一个社会假使对法律的遵守并无保障，三权鼎立并不明确，那就是根本没有宪法。

第十七条既然财产是一种不可侵犯的神圣的权利，那么，除非经过法律上的决定，为了公共需要而加以征用外，无论何人的财产不得被人剥夺；即使有这种必要时，也必须事先给产业主一种公平合理的赔偿。

上面所说的 1789 年的原则岂不是可以代表现在欧洲各国政府的最普通的原则么？但是这些原则在十八世纪时除了英国以外，所有欧洲政府都是忽视的。塞格诺博斯先生曾经说过：“十八世纪当一个法国人在研究各种政治问题的时候，在他们看来，当时大部分的制度都是一些与理想和入道相违背的弊端”。如果我们对于人权宣言的看法不受那些漫不经心的、持有敌对态度的批评家的影响，也不受当时在国民议会里的西爱咸斯等人辩论的影响（这些辩论的无聊实在是近代国会讨论中所少见的），那么，我们岂不是会把这篇宣言看成是一篇改革腐败政治的珍贵的、简明的抗议么？我们岂不是看到在宣言的每条条文背后隐藏着国民多年的疾苦，国民都希望获得维护宪

法的全面保障么？

显然，这篇宣言是折衷各种建议书的结果，它反映了各种建议书复杂的内容。有人认为只有先把人类的权利一一列举出来，人才能成为在社会里生活的人；有人认为只有缔结了“民约”，人才能获得人权；也有人认为只要制订出那些有关于改革当时制度的一般原则就行了。看来持有最后一种见解的人终于取得了胜利。当议会进行讨论的时候，主张最后这种见解的人虽然在议会里进行辩论时不能同那些专讲理论的人们那样突出地引人注目，但是最后那篇宣言草案显然要比从前的几个草案更为优越，这就不能不归功于议员们的常识，因为他们能够将狂热的代表所发的空论抑制下去。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在 1791 年的宪法中，这篇人权宣言的下面即紧跟着关于旧制度中许多最严重的弊端的废除，再下面接着就附有一篇受到宪法保障的天赋的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在当时议会中最伟大的政治家米拉鲍看来，这篇宣言在理论上就是“对于一般原则的说明，它适用于各种社会和各种政体。”但是为了要挽救当时已经陈旧、摇摇欲坠的政治组织所发表的这些原则，这就绝对有必要将这些原则，使之服从于并适合于当地的许多情况。他说这篇宣言的目的并不在要教国民记住那些来自书本和抽象的东西，而是在于教国民记得他们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因此这篇为政治机关所不能背离的人权宣言只是要表达它的观念，而不是努力去对人们讲授一种科学。

他说：“这就是最主要的区别。既然自由决不是一种来自哲学演绎的理论的结果，而是来自日常经验和由重大事件所引起的推理的结果，那么，我们对于事物了解得越清楚，我们也就越接近于对自由的推理。……这就是美国人制订权利宣言的方法。他们故意将理想放在一边，但将政治真理宣布出来，其目的在于要明白这些真理，其中自由这个东西只有国民才把它看得最重，而且也只有国民才能够维护住它。”

## 第八章 用历史眼光来看保守精神

—

人类开始有历史已经很长久了。最初的人类不过是非洲森林里面类人猿中的一种，能够用两条后腿走路，两条前腿慢慢的变成灵巧的臂和手了。这种新动物有一个好的、大的脑袋，能够用手做许多的事情，这就产生了一种倾向，使他利用他的手作出许多新奇的事情。他偶然将火石块投入火中，他看出火石裂成几片，这些石片可以作雕刮之用。这大概就是他所最早制造的工具。他的形状怎样，究竟是不是同现在的类人猿一样，遍身生毛，栖于树上，我们无法去断定。据法国的著名考古学者德·墨提莱的推测，在河边堆积物中所发现的最古的石器，大概制作于二十四万年前。假使旧石器时代人类祖先们，那就还要加上二十五万年，那么，我们可以断定，世界上的人类至今至少应该有五十万年。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史前期的准确年代，但是对于生物学和史前考古学有研究的人，断不会将这个时期加以缩短。假使我们将各种岩穴里面的遗迹研究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远古的人类在很长时期，除了断削石器的技术、各种石器的形式、骨器的装饰以外，人类在其他方面并没有进步。一直到了一万年以前，所谓新石器时代，人类才有了陶器、农业和住宅。北美的土著，当十五世纪欧洲人前往时，还是处在新石器时代。

因为这些关于人类过去的事实都是近年来的发现，所以它们到如今还没有将我们的思想根本地改变一下。来尔的名著《古代人类》那部书本（1863年出版）第一次将人类很古这个学说对英国读者发表出来。从前奥古斯丁为了要证明犹太的先知年代最古，遂驳斥《几个说谎的人》中所说埃及人考察天文已经有十万年之久那句话。他嘲笑说：“上帝造人类距今不过六千年，埃及人考察天文怎么会有十万年之久呢？”这位著名的教会长老的计算后来到了十七世纪克伦威尔时代有一个大主教名阿歇尔，又加以缩减。他说所有世上动物的造成和人类的祖先亚当的出现是在纪元前4004年10月28日的星期五那一天。亚当虽然是一点经验也没有，但是上帝却叫他来订正全部的动物名词。那天还没有过去，上帝又造了一个夏娃来安慰亚当的寂寞。两人的结婚那件事情是第一个礼拜最后的举动。虽然有几个哲学家和研究初期教会的宗教家对他这话表示怀疑，但是十七世纪的新教徒因为他说得确凿，倒很相信他。直到后来的达尔文、赫胥里一班人类学家出来，才将我们的历史观念根本改变了，到如今才不过五十年。

为了要明了人类历史非常悠久的学说对于我们现今所处的地位、我们同过去的关系、我们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些问题的重大影响，我们可以用一个很好的方法来说明现代历史的概念。我们假定将人类的全部历史压缩到十二小时之中，而我们假定现在是正午的时候。人类的历史，为了便利起见，就少算一点，假定它为二十四万年；那么，每一小时代表二万年，每分钟代表三百六十二年又四个月。关于十一时三十分以前，我们一点记载也没有。我们不知道那时候有什么人和什么事，我们只能推想那时候地球上是有人的，因

---

见德·墨提莱所著《史前史》（1901年出版）第363页。——译者

见他所著《上帝之城》第18章，第40节。——译者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1825—1895年），创立进化论。——译者

为我们现在寻出他们的石器以及他们所画的巨象和野牛等图画。到了十一时四十分的时候，埃及和巴比伦文化的遗迹才开始出现。希腊的文学、哲学和科学，我们习惯上所指为“古代”的，到如今不过七分钟。培根写《论学术的进展》的时候，离今不过一分钟。人类发明蒸气机，离今不过半分钟。我认为这种压缩式的表解，并没有费解之处。因为这种计算法比全部的画像容易领会、容易想像。人类历史的全部画像是如此的超出我们经验之外，以致实在不易领会。

依照上面的说法，我们可以得出两点明显的断语：第一，就是我们所谓古人例如：泰勒、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巴鸠斯、鲁克莱提斯等人，实在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他们虽然在阿歇尔大主教的眼目中看起来，无论多远，他们总是我们同时代的人物。我们没有理由可以说他们的脑筋比我们坏，或者比我们好。只有在知识方面稍有不同，因为自从他们的时代以来，知识一直是经常增加的。第二，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的进步，最初非常慢，差不多过了几万年，看不出有什么进步。到了后来，一天加快一天。居住在堆积层里面的我们的祖先，用一种石器作拳斧，用了有十万年之久，也许很为满意。据约翰·路卜克爵士的推测，这种拳斧用途的广大同现在小孩所用的折刀差不多。到了后来，他们慢慢地知道用火石和骨头制造刮刀、钻子、箭头、叉头和粗针等物。但是我们到了十一时半的时候，才发明陶器，而且开始有了家畜。至于使用青铜和铁来制造器皿和工具，那就更晚了。而且青铜时代的人对于石斧还存有一种虔诚的心情，一般的僧侣在金属工具发现后，还用石刀来宰牺牲。

据我们所知道的，能够自由思考的人要以希腊人为最早。希腊人在伦理学、哲学、逻辑学和数学等各种学问方面表现了人类的思考能力。但是他们对于周围普通事物的重要性，却并不注意。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实用的技术都已经被发现了。他认为这种技术应该由奴隶去做，而哲学家则应该专门研究理想生活的原理，即善、真、美。在亚历山大城，我们所谓实用的科学，虽然有点进步，但是当时的状况实在不方便。人类应付需要的方法在罗马时代也并没有比亚里士多德集希腊思想大成以前好得多。教会的伟大神父如：雅鲁姆、奥古斯丁、安勃罗斯等人，虽然没有说物质的东西绝对是坏的，但是至少他们对于物质的东西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注意的是灵魂和上帝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超出知识之上的。同时代的新柏拉图学派学者们主张最高的真理是从先觉而来。理性所能发现的，至多不过是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当时新柏拉图学派的人们和基督教徒都专门研究神迹、魔术和神术来增进人类的宗教兴味，他们绝对不去研究上帝所造的世界。这就是中古时代初年所接受的遗产。当时，大部分教会初期神父时代的学说都被忘记了，教科书里面只保留了一些一知半解的、杂乱无章的、错误百出的希腊知识。他们认为自然世界至多不过是一种比喻，所有矿物都具有一种德性和魔力，同化学物理无关。以传说中狮子的习惯来比喻耶稣的死而复活；以鸱鸒的习惯来比喻我们的依照过去。十三世纪时期，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被重新发现。各大学里对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十分尊敬。当时多米尼克派僧侣“伟大者”阿伯特和托玛

---

罗马帝国末年神学家（331—420年）。——译者

罗马帝国末年神学家（340—397年），曾任米兰主教。——译者

中世纪德意志著名经院哲学家（1193？—1280年）。托玛斯·阿奎那的老师。——译者

斯·阿奎那又对这些著作做了详细的解说。但是他们的解说对于自然的研究和应用知识来增进人类的物质享受反而产生了一层障碍。因为所有亚里士多德的错误和后人的解说中的错误，从此以后，都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据我们所知道的，罗哲尔·培根是第一个表示深信实验科学具有伟大的前途的人。他说当时的大学与其咬文嚼字地去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拉丁文的坏译本，还不如将所有这些著作焚毁了好。他说，亚里士多德固然知道许多东西，但是他最多不过是种了一棵知识的树，有许多枝叶还没有生长出来。“假使我们人类还要继续无限地生存下去，我们断不能希望对于所有可以知道的东西都有了完美无缺的知识”。他又说，有知识的科学家应该懂得老农和老妇所知道的简单朴素的东西。罗哲尔·培根生于六百年以前，虽然有许多地方还局限于当时的见解，但是他却是第一次说明了未来人类的幸福在于研究普通的物质的东西。他预言说：将来实验科学能够使人类可以不用橇桨去摇船，可以不用牛马去拉车，而且速度还大大增加；可以发明飞机，同鸟一样在空中飞行；造桥可以不用支柱，跨在河上。

当他说这些看起来好像幻想的话的时候，如果用我们压缩的时代表来计算的话，距今不过二分钟。离今一分钟的时候，才有人重视他的话。在新教徒领导人的心目中没有什么我们所谓进步的观念。路德把理智看成“是一种美貌的荡妇”，它蛊惑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不能明了上帝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真理。梅兰克吞曾经很热心地校订了一部古代星占学。喀尔文说人性是恶的，并且是腐败的，它本身绝对没有改过向善的能力。但是离今一分钟的时候，出现了庞波那兹、布鲁诺、法朗士、培根和笛卡儿等人，他们推翻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用亚里士多德的破砖烂瓦所建立的堡垒。他们主张运用理智，反对盲从古人。笛卡儿在《寻求真理的方法》这部名著中的最后说，他著这部书所以不用他的耶稣会教师们所用的拉丁文，而用本国的法文写的缘故，就是为了读者能够开动自己的脑筋，而不去死啃古人的书本。在此以前，培根的名著《论学术进展》也是用英文写成的。他老年时所著的《新工具》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在这两部书里，他研究他所谓的“人的王国”。奥古斯丁却只知道有上帝的王国和魔鬼的王国。培根首先将实验科学的伟大前途用他优美的英文加以宣传。他说：“古人是值得尊重的，我们人类应该根据他们的成就去发现最好的方法。但是既然发现以后，就应该前进。正如古语所说：古代产生新世界。这些时代是古代，因当时世界本来是古的，并不是由我们自己向后计算起来，才算是古的……”

“还有一种错误，同上面所说的有密切联系。那就是存有这种幻想：以为古人的意见和派别，经过分析整理以后，最好的被保存下来，而其余的都被抛弃了。所以假使有人要想从事于新的研究，就往往遇到被前人所抛弃的东西。好些东西因为被大家所抛弃，因而也就被忘记了。广大的群众，或者最聪明的人似乎对于浮在表面的东西允许它通过去，而对于实在的精深的东西，反而加以阻止。因为实在说来，时间这样东西，好像是一条河流，它将轻的、浮的东西带下来，而重的、实的东西都沉没下去……”

“还有一种错误，就是过分重视人类的心灵和人类本身的研究，而忽视对自然的探索和对经验的观察。他们专门在他们的思想里面翻来复去。对于

---

意大利哲学家。——译者

意大利哲学家，因坚信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论，同旧说展开斗争。1600年被天主教会焚死，——译者

这班为人普遍认为是最高尚、最神圣的哲学家们，赫拉克利图斯曾经说过一句很公平而利害的断语：‘人类往往不在大而普通世界里面求真理：偏要在他们自己那个小世界里面求真理。’由于他们不屑于一顾上帝所创造的东西，因而也不愿去研究它了。

“但是最大的错误却在将知识的最终的目的弄错了。因为人们希望获得学问和知识的目的，有的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有的是为了好玩；有的是装饰门面，争取名誉；有的是为了同人进行争辩；而大部分人则是为了从中取利和自己的职业。很少有人肯为了人类的利益和应用去运用他的天赋的理智。大部分人好像把知识看做是一张卧床，用来休养自己的研究精神……或者把它看做是一个商店，为了发财致富而并不是把知识看做是一个增进人类幸福和发扬上帝荣耀的仓库”。培根批判了人们的崇古思想，他指出，这实在是根据一种错误观念。古人既然生在我们之前，当然不能希望他们在知识和经验上和我们一样。培根要求当时在大学里的人们不要再去崇拜亚里士多德和他的注解者，不要去在他们自己的形而上学思想里面翻来复去；而是要去研究周围世界的实在东西。要研究这种东西的目的在于希望增进人类的幸福。培根同摩尔一样，也写这一部《乌托邦》，书名《新大西岛》。在他那个乌托邦里，有个中心的机关，那就是一个国立的科学院，在科学院里面进行种种的实验，目的在于用科学发明来增进人类的幸福。后来有人批评培根，说他自己对于科学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贡献。这种批评也许是公正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他自己是把自己看作一个宣传员。他是一个吹鼓手，宣布我们时代的开始。

培根所著的《论学术进展》出版于1615年。我们可以说：人类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求进步的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这个学说从少数思想家心中明白地产生的时候，到现在不过三百年。把这个伟大的观念普及于社会，培根的功劳最大。这是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它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无穷的远景。

人类可以有意识地推动进步这个观念，不但是很新，而且只能在一种动的社会环境里面才能发展起来，而且是和历史发展的眼光同时发展的。希腊的思想家就没有这种观念。希罗多德虽然知道希腊的文化渊源于埃及，柏拉图常常提到埃及，但是他们始终并不明白我们所说的进步。亚里士多德虽然知道希腊哲学是从爱俄尼亚哲学发展起来的，但是他始终没有表示他曾想到人类能够无限地去发现真理，而且他也并没有培根的那种兴趣，把自然科学的结果应用起来以增进人类的幸福。鲁克里喜阿斯是西塞罗时代的一个伊壁鸠鲁派哲学家，虽然他曾猜想人类经历过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但是他的哲学思想中并没有进步的概念。他认为：假使人类看出宇宙是一种原子偶然结合的结果，有一定的种类，服从一定的规律，他们当然就可以认识宇宙。但是鲁克里喜阿斯认为认识宇宙的目的无非是不再怕神和怕死。他始终在他的机械的宇宙观里面，并没有发现人类进步这个东西。他反而有一种退化观念，认为宇宙的将来必有一天完全瓦解。总而言之，希腊罗马的哲学家和中世纪时代的神学家一样，都认为文化是一种停滞不变的东西。

---

见所著《论学术进展》第1卷，第5章，第1—11节。——译者

德拉波所著《欧洲思想发达史》中，即有此种论调。——译者

罗马诗人（公元前95—31年）。——译者



奥古斯丁和他的弟子阿罗修斯给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背景，他们认为从伊甸园起一直到阿拉利克攻陷罗马城止，所有的历史无非说明上帝和人类的关系。但是他们不但明了人类有悠久的历史和过去的进化，而且对于将来的进步，他们也绝对没有看到。因为在当时这些热忱的基督徒的心目之中，没有一件世俗间的改良是可以和死后那件事比起来更加重要。他们认为，到那时候无论何人总要永登天堂，或者永入地狱。因此，在十七世纪初年以前，欧洲人所努力追求的，就是竭力去达到过去所规定的标准。无论什么制度和信仰，只要经过长久的时期，就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现在的东西如能同过去一样好，那就幸运极了。自从布鲁诺和培根等人出世以后，权威和习惯势力才开始衰落，虽然还有那些自以为是拥护上帝的安排的人们出来反对他们，把他们看作不信宗教者、自由思想家和唯理主义者。

打破权威的思想，发展得非常快。这种思想是一种新思潮，而且是具有根本性的。到了十八世纪，发展得更快。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当他提倡修改残酷的刑律的时候，就预料到有一班守旧人士一定要说他所要废除的是古代传下来习惯。他请他们注意过去这样东西，始终是一个谬误的大海洋，它偶然露出一一点真理来。在法国大革命初年，在一种最不利的情况下，康多塞曾经有一篇有名的文章，说明人类的进步是无穷尽的。他想将人类走向真理和幸福的步骤说得非常明白。他说：“这种关于过去人类和现代人类的观察，可以引出确定新进步和调和进步的方法。这种进步仍旧可以希望继续前进，这就是我工作的目的。他的结果是要根据理想和事实来证明人类能力的完成是无止境的，人类的完成是真正无穷的。这种完成的进步，既然离开所有有限力而独立，除地球不能永续以外，是永无止境的。”

把人类的眼光从过去转向未来的学说，在十九世纪由于科学发明，它的力量更加壮大。这些发明证明了：第一，科学的发现使人类关于世界和自己地位的知识，比从前大大增加了。第二，人类应用他的知识来改进生产方法，使得古代的制造、运输和交通的方法，显得粗笨陈旧。第三，达尔文、莱尔、柏泰斯、赫胥里、摩提莱、赫克尔同其余的一班人，主张在未有文字记载以前，人类已经证明自己具有惊人进步的能力。他们认为人类不但可以由野蛮进入文明，而且能够从动物的地位变为人类。人类的祖先不但是用四足走路，和动物共同野处，而且根据达尔文的推测，人类的祖先或者是住在水中的一种还没有脊骨的蝌蚪。罗哲尔·培根、法朗西斯·培根、笛卡儿、贝卡利亚、康多塞这班人都竭力主张人类的知识是可以无限地增加，而且可以利用他们的知识来扫除旧日的偏见和习惯，来增进人类的幸福。十九世纪的人们已经证明了人类的知识是千万年来学习的结果，人类的生活状况是千万年来改良的结果。但是以前的人类进步都是不自觉的。到了现在，进步这个东西才第一次变为一种有意识的努力和追求。所以在人类历史的十二小时中，无论有了哪些进步，只是到了十一点五十九分的时候，人类才来自觉希望进步。到了现在，人类才知道他是能够自由地进步的，而且是正在进步的过程

---

著有《论犯罪与刑罚》一书。——译者

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1743—1794年），著有《人类精神的进步》一书。——译者

法国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1788—1868年）。——译者

德国生物学家（1834—1919年），著有《宇宙之谜》、《人类发展史》等书。宣传达尔文主义。——译者

之中。这件事，照我看来，是历史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也是对我们的行动最重要的指针。

## 二

假使我们前边所说的社会改良已经被大部分思想家看作是人生中一件最有关系的事情，那么，历史的最高价值，岂不是就在于能提供给我们一种进步的技术么？我们对于历史岂不是应该特别注重那些与社会改良有关的事实么？历史这个东西，自古以来就经常被一班守旧的人们利用来证实他们的主张；至于激烈派则往往不注意历史，他们或者认为这是守旧的人的武器，就加以抛弃。就是到了现在，急进派人士们还没有看出对历史的真实理解对于他们是有何等价值。实在说起来，历史应该是他们的武器，他们应该从守旧派的手里把它夺取过来。历史的锋芒，在过去一百年中，磨厉得更加锐利了。我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如何去利用历史这个锐利的武器去击退守旧派。

据我所知道的，普通人对于守旧和急进两种性格，并没有加以满意的分析。人们普遍认为：所有男女一生下来就有保守的和急进的区别，而且就我们的动物性看来，我们的勇气、精力和自信力都大不相同。但是据我看起来，即是最极端的人物和今天最野蛮的人的区别，完全是因为教育的缘故。即是近日已经绝种的塔斯美尼亚地方的土人，虽然还处在旧石器时代，他们的文化也是经过多年的发展的结果。现在那些真正没有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甚至建造句的能力和用贝壳削木棍的能力也都没有。照这样看起来，大部分所谓守旧派和急进派可以说是广义的教育的结果，包括他们自小和文明人接近所得的一切东西。我认为近世的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都会同意这一点的，即至少凡是自由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们一定会承认所谓天性这样东西，大部分实在是教育、直接的和间接的教育、有意的或者大部分无意的教育。

现在，那些保守的人们常常反对一切改良措施，他们认为改良就是对人类天性的改变。他们自翊懂得人类天性的特点，认为人类天性既然不能改变，那么，一切改良的措施显然就不能实行。蒙坦曾经对这论点加以驳斥。他说：我们假使看看那宏伟光明的自然界，就可以看出它的复杂的现象是如此普遍地、长久地存在着；所以某一个人或甚至他的王国同自然界比较起来，不过是一个针头而已。但是现在我们有一种新的理由可以引用了。无论现在动物学家对于特性遗传的学说赞成与否，我们没有理由可以断定文化的分子可以一点一点地进入我们的血液里来。文化这样东西，或者是由模仿而来，或是由教育而来；假如没有模仿和教育，文化就要消灭。这一点塔德已经证明了。我们虽然将我们父母、祖父母、同远祖的能力继承下来，但是除了通过模仿或竞赛以外，那种能力在他们的身体机能上，断不会生出什么影响来。可见急进派要想改革的，和守旧派要想卫护的东西，并不是人类天性的那些特点，而是人类教育的人为的结果。因此，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于保守派的人类天性这种说法可以将它根本推翻。只要同他们说：人类的习惯、制度和感情始终是复杂的，而且研究胚胎学的人可以证明保守派误以为永久不变的天性，实在是人为地得来的，是不能遗传的东西。而且我们假使能够证明像蝌蚪的无脊椎的水虫可以演变成卧在树上的类人猿的动物，类人猿的动物可以演变成削石的工匠，能够在洞穴上画牛鹿的像，从削石匠可以发展成为一个

能够说明石洞中充满了保守派那段动人的故事的柏拉图；那么，人类天性是固定的说法，是否能成立呢？

从科学和历史看来，把某个时代人类的行动和思想看成是体现人类天性是正常的和不变的原理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不过历史和人类学都可以证明后代的一切都由前代继承而来。就是在进步最快的社会里也是如此，而且我们有理由断定，假使一个社会的环境没有什么变化，而且没有外来的扰乱，这群人的文化也就会永不变动。我们上面曾经说过，进化思想最近已为少数思想家所接受。最近五十年来，人类的思想制度和知识的性质和范围所发生的变化，若同数千万年积累的遗产比较起来，当然是很少的。为了将我们对古人的依赖的性质和范围弄明白，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的语言、文字、法律、以及政治、社会制度、知识和教育，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和未来世界的看法、我们的嗜好和满足嗜好的方法等等就够了。原来在各方面都有一种过去的势力在统制着我们，我们自己并不觉得，而且也并不加以反对。大体说来，我们依靠着过去。

即使是最急进的人们的思想，也往往不能超出他们所接受的过去的思想和习惯之上。我们一旦领会了这个真理，我们就可以庆幸自己，我们虽然是一些可怜智力低劣的矮人，但因能够站在巨人的属上，能够高瞻远瞩，看到我们立在地上所不能看见的东西。或者我们可以磨断自己的锁链，而且像普洛米修士一样，要摆脱那块过去的巨石，以挽救自己在困难中的子孙。

他将法律和权利传给自己，好像一种永远继续的疾病。

无论我们是赞美过去，或是咒骂过去，我们总是过去的子孙；而过去把我们培养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处境。无论我们怎样急进，只能沿着过去那条路走去，我们好像是在笼中跳窜的松鼠。

至于历史究竟同进步的原因和技术有什么关系，我们这里不去讨论。但是我们可以说一说我们的现代眼光对于保守思想有什么影响。约翰·摩利曾经将保守派的嘴脸加以如下勾画：“他对于在别人看来绝不能容忍的现象，他却具有无限的耐心；他对于不十分可信的东西和十分无用的制度却力加卫护。他抽象地赞成进步和改良。但对于每个进步的建议却很冷淡而且加以反对。他的渺小希望是生活能够有一天好起来，但是他的大主见却是生活要一天坏一天！”这类人不但现在为数甚多，还受到尊敬。其中包括教士、律师、教师、新闻记者以及政界和工商界人士。其中有些人对于改良事业惶惶不安，但又不敢直言反对。他们一定想出许多理由来加以表白，或者把别人所作的改良说成是他们自己的功劳，或者挖空心思作一些无关重要的改革。他们对于一般青年发表演说时，先加以警告，称赞过去，对他们进步的斗争却加以劝阻。保守派是数千年来的产物，当时还不知道人类有可能进行有意识的改良。他们用过去的标准，为现代的状况和思想进行辩护，而不拿现在同将来作标准。他们并不明白过去曾经有过许多重大的进步，也想不到假使没有人把他们所代表的保守精神故意培养起来，社会可以迅速地得到改善。

我们假使将保守派所借以为自己辩护的那句“人类天性”的话推翻之后，他们一定会被我们激怒起来，反过来质问我，“究竟进步是什么意思？”但是无论什么人，假使他知道我们现在文化仍是处在比较幼稚的状态，除了

---

据古代希腊神话，宙斯神取去人类之火。普洛密修士乃用茴香杆向日取火。天神怒，以链条缚之于巨石之下，并命巨鹰一日咬其肝以苦之，卒感动天神之心，而获释放云。——译者

希望将来以外，可以安慰我们的地方实在很少，而我们四周围可以改良的机会如此之多，恐怕再没有心思去给“进步”下一个定义。我们要问问保守派，现在究竟哪件事情不需要改良？

保守派还有一个自慰的东西，这也是他们最后引以自慰的东西了。他们可以极力赞成地说：我们已经有了许多改良，而且竭力说，他们对于我们的各种合适的进步异常满意，不过怕进步太快了，容易向前跌倒，所以自愿来做一个车闸。但是问题是，这种车闸有存在的必要么？难道急进的人们曾经有过掌握大权的机会么？恐怕保守派不见得能够在历史里举出几个例子。但是他们一定要说法国革命的恐怖时代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这个果然是历史上最好的例子，但是，不料那个时代的牺牲者卡米叶·德莫林将法国革命那个恐怖时代的罪过很有理由地完全归到当时的保守派身上去。我也以为所有学者都要同意恐怖时代种种激烈的举动完全是被那个无能的、欺诈的路易十六世和他那班受普、奥两国君主帮助的逃亡贵族所激起来的。无论如何，德莫林曾经说过：为自由而流的血同为难持君主或教士的领土和满足他们的野心而流的血比较起来，真是微乎其微了。

照这样看起来，就是保守派最喜欢举的这个变化最快的例子也经不起我们平心的仔细研究。而且我们可以说，进步的战车好像攀登险峻的山坡一样，保守派那种车闸不但无用，而且误事。马特林克曾经说过：我们切不可走得太过远或者太快；照过去同现在看起来，实在没有理由可以使我们生畏。不但如此，他还说：“我们的周围已经有足够的人们，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要扑灭我们所点的火。所有十字街头那几条通向将来的道路上，总有千人站在那里保护过去来反对进步的精神。我们可以不必去怕古代的好处没有充分的保障。我们中间最胆小的人所能做得到的，至少不要再把许多重量加到过去的上面就好了。”

历史，人类的和有机世界的全部历史，实在可以使保守派羞愧得无地自容。马特林克所著的《我们的社会责任》一书里，对将来充满了神秘的希望。他认为过度的急进精神，或者是生活平衡上的一种必要的东西。他说：“我们切不可对自己说：最好的真理常常在温和主义或者平均主义里面。假使大多数人的思想水平并不比实际需要更低，这句话或者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其他的人的思想和希望应该比普通人高一点的理由。今天所谓平均，所谓温和，到了明天就可以变为不人道的东西。当年西班牙的异端裁判所存在的时候，一班好心肠的和公道的人都说异端不可烧得太多。那时极端、无理的主张，就是连一个也不应该烧死”。

此地我们又可以从历史里面举出几个实例来，在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看来，没有奴隶的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亚理士多德认为奴隶这样东西是人类社会里必要的附属品。照教皇英诺森三世的眼光看来，要使教会里面没有贪污的恶习，这是一种不现实的理想。照黎赛留的想法，外交上没有贿赂是一种神话。照贝卡利亚看来，审案时不用刑讯和没有腐败的法官，这是一种梦想。在富兰克林时代，假使有人说在费拉德尔非亚地方的人可以和密士失必河西的人说话，或者花费极少的钱，就连极贫困的人也不觉得太贵，就可以将一封信送去世界各地，人家一定会说他是一个疯子。但是这些没有希望的、

---

法国路易十三世时代的宰相（1585—1642年）。——译者

美国科学家和政治家（1706—1790年）。——译者

奇怪的幻想居然在一百年间都实现了。

对于这些进步，保守派一向是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或者因为他们的性格是如此，或者因为他们的无知，或者由于他们的绝望。但是我们应该原谅他们，因为他们实在是懂什么。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自己就是过去数千年的遗迹。但是，历史这样东西，现在好像表示我们原谅他们的时期已终止了。因为他们所主张的人类天性不能改变的想法已经破产，并且他们以车闸自居的信仰，现在都被推翻了。

总而言之，保守派实在对过去没有正确的理解。从前急进派往往求援于将来，到了现在，他们可以用过去的成就和现在的成功来为自己辩护。他们可以指出：哪些事情是曾经做过的；哪些事情是正在做的；什么事情是应该做而尚未做的；而且最后，他们将开始明白事情应该怎样去做。我这篇文章的目的，就在于说明那些曾经做过的事情。假使我有工夫，我很可以说一说，知识的进步和应用知识来增进幸福，在这些方面，现在都比从前快得多。不过这一点，差不多人人都知道，用不着我去证明。几年以前，有一位法国文学家布鲁美提 宣言科学已经破产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正是镭将要发明的的时候，这个元素只要我们能够控制和利用它所含的力源，很可以再在人类变化史上开辟一个新的纪元。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也就是白血球的作用将要发明的的时候，这个发明为医学界开辟了一个无穷的远景。所以会说科学破产的人，只有那一个可怜的气馁的文学家罢了。现在对于科学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我们对于有机的和无机的世界的理解现在不过是刚刚开端。

但丁在他的《神曲·地狱篇》的第四段里，将地狱的内容描写过一番。他听到地狱里各种长嘘短叹的声音，使地狱中永久的空气振动起来。这种声音是从一班吃苦的男女老幼的口里发出来的。他们虽然说是无辜的人，但是因为他们生在正确的宗教 没有出现以前的缘故，因此就被罚入地狱了。他们住在那里都已绝望的了。但是在那黑暗之中，他看见一片征服了黑暗的半球的火光。在火光中，一片开阔、光明的高处的绿色草地上，坐着一班眼光迟缓而严肃，看来形像威严的人们，他们不大说话而且声音很低。这就是古代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们无忧无虑地在那里高谈阔论。不管小孩子悲啼，也不觉得他们下面有可怕的地狱。他们不知道地球的那方面有一块登入净界的高山，有一班人在那里想爬上去，但是天堂是始终走不到的。他们何必多管闲事呢？他们自己岂不是已经安然居住在那个适合于他们的天堂之上么？

至于要用我们集体的力量去实现大改革——如废除贫困、疾病和战争，同增进幸福的、合理的生活——这些事业，假使我们没有明白上面所举的理由，好像是无法想像的。以前人类的领袖往往把过去作为自己的标准和理想。保守派的祖先实在可以追溯到人类最初的时候。至于把将来作为根据的改革家实在是现代的产物。这种人一直到十一点五十九分半以后才出现。这种人是一个新家族，它的成员往往遭受保守派所鄙视。保守派对柯林斯派，伏尔泰派和潘恩派这些人们的名字肆意诬蔑。其实这班人的学说，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平凡得很。现在看来，把希望寄托在将来的那些改革家实在是进步力量最后产物。保守派虽然在那里反对什么在培根时代所谓“可疑的新奇”，

---

法国批评家，曾任《二世界评论》主编。——译者

指基督教。——译者

而且痛骂改革是坏的、不能实行的，但是他们自己也不自觉地走进改良的过程之中。我们虽然不喜欢神秘，但也不能不承认我们自己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不知不党的冲动，好像是一种自然的伴侣。这种冲动好像专门在那里推翻现在的制度，隐隐之中要想推出一种较复杂的去替代现有的东西。这种生命的冲动，柏格森所谓“活力”可以代表自然界内在的维新的倾向。这种产生变化的能力——那就是广义的所谓冒险精神——已经不是诗人的或幻想者的观念了，最严格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也不能不注意它了。我们到如今才了解，尽管遭受人类的熟视无睹，甚至诽谤抗议，但是这个自然的变动力量一直在发生作用。我们可以和这种变动的力量通力合作。

我们如今才找出那个反对圣灵的罪过——那就是不愿和改良的原理通力合作的罪过。总而言之，历史将要宣判保守主义的绝望的和恶毒的罪恶。

假使我们上面所申论的话是不错的，或者大部分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全部的教育岂不是错了么？我们对于青年男女并没有用一种始终一致的方法去培养他们的进步精神，并没有使他们明白他们所负的责任，——那种向前看和要求前进的精神。他们所受的教育大部分还是抽象的、古典的；我们如今还不敢把教育和生活结合起来。他们所读的历史，并没有使过去给他们一种教训。他们从小就养成一种尊重过去，不信将来的心理。照这样看起来，我们的教育岂不是不但不能作为改进的路标，反而成为进步的重大障碍了么？假使那班负责教育青年的人们能够十分明了我这篇文章里面所说的话，岂不是都要不寒而栗么？假使在我们中学校里、高等学校里、神学研究所里、法学院的教师着重说明他们自己所教授的东西只是临时性的，而且要学生们快快去超过他们所讲的东西，你看这会对社会发生什么影响呢？上面的建议好像是讲笑话，但是可以看出，我们距离认识和接受历史的伟大教训还很远。

我再引几句马特林克的话：

“我们应该想一想那只大而看不见的船，它将我们人类载到无穷的目的地去。它像我们普通海洋中的大船一样；也有它的帆和压舱石。我们不能因为它离开了碇泊的地方，就怕它波荡不定，离开航线，就将好的白的船帆收下，把它装在黑暗的船底，急忙增加压舱石的重量。帆这样东西，并不是织来为了使它和黑暗中的圆石放在一起的。压舱石到处都有；所有海港里的圆石、海岸上的黄沙都可以作压舱之用。但是帆却是稀有之物，是价值很贵的。它们的地位并不应该在黑暗的船底，而是在高大的船桅之上，面临无限光明。在这里它可以乘风破浪，推动船只前进。”

